HISTORY Students

中国读本

清前期史话

夏家餕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历史特级教师鼎力推荐

《中国读本（史话分卷）》丛书是目前所见学生历史读物中最好的。一是丛书的各单本作者都是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这保证了内容的专业性；二是丛书的内容深浅适中，既体现了大纲要求，又有所拓展，可以作为课内知识的有效补充，很适合学生阅读。同时，本书也适合老师们作为资源来储备。

——白幼蒂（北师大附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市高级中学实验课本编委）

本套丛书是按照新课标要求进行编辑的，扣住了教学大纲，既体现了教学重点，又有适当的延伸，对拓展学生知识面很有必要，是一套质量很高的学生课外读物。

——李明赞（北京四中历史特级教师，国家新课标高中历史教材编撰者之一）

此书最大特点就是将知识、学术融为一体，既有严谨治学态度、科学辩证唯物史观，又能够栩栩如生描述再现一个过去，语言表达通俗易懂，人生哲理深入浅出，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层面要求，更有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和知识的拓展。对于青少年学习、探究历史，《中国读本（史话分卷）》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范桂英（北京十五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




ISBN 978-7-5078-3076-7

9 787507 830767 >

定价：20.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前期史话 / 夏家餕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
出版社，2009.10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076-7

I. 清… II. 夏… III. 中国—古代史—清前
期—通俗读物 IV. 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4335号

清前期史话

著　　者	夏家餕
责任编辑	凭　林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190千字
印　　张	13.25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7-5078-3076-7 / G · 1284
定　　价	20.00 元

出 版 说 明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这是半个世纪前我们祭祀轩辕始祖——黄帝时留下的华美篇章。

我国是有着6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不懈的考古挖掘，还在不断延伸着她的历史源头。放眼全球，我泱泱中华，江山多娇；检点历史，我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周易》到《诗经》，自《天问》而《警世钟》，六七千年，流淌不息。这里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浩然博大，也有“何必马革裹尸还”的坦荡豪壮；既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贞刚烈，也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忠奸判定。曾经长时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的进步无私贡献出了自己无数的珍藏。

曾几何时，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打倒孔家店”的激愤一度让很多人盯上了西方的月亮。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让媚外的思潮重新暗流涌动。但与之同时，过度物质化了的西方国家，却把他们的目光重新投向东方文明的古邦，试图从中找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方。为此，我们曾一度犹豫彷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

说不清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曾经徘徊在一些人心头的迷茫逐渐扫去，重视传统，回归本源，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持续进步的动力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她的真实面貌，发扬她的优秀传统，规划她的锦绣前程，是当代中国人既严肃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脉络者，我们的历史是最应珍视的一笔遗产。但中国历史博大精深，古籍文献、文书档案浩如烟海，一部中国史，真不知从何处说起！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社约请、组织在史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一辈历史学家，精心编撰了这套《中国读本》丛书（中国历史史话分卷）。本分卷共16分册，分别是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上、下）、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上、下）、五代、宋朝、元朝、明朝、清前期和晚清。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作者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以大手笔撰写小文章，在各分册中，对该断代的重大事件、经济发展、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社会生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发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既有专业的厚度，又不乏诙谐和幽默，文笔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历史是一个辉煌的存在，历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启迪之学，我们衷心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能从这套丛书中寻到灵感，从6000年历史积淀中汲得智慧，熔铸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崭新的智慧王国。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年6月1日

开 头 语

——略说清朝

1644年，腐朽的朱明王朝，被淹没在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的浪涛中；偏居一隅的清朝，在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明朝遗臣之一吴三桂的勾引之下，入主中原，成为了全国性的封建王朝。

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专制主义王朝的历史。从清朝入关，由一个地方政权变成全国政权后，经历了267年；而从清太宗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到清末帝溥仪时宣布“逊位”，则经历了276年。倘从努尔哈赤建立“大清”政权的前身——“大金”政权算起，则一共经历了295年。

二百多年的清史，大抵可以分成两个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前期和1840年以后的后期。

清朝前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644年前的关外阶段，1796年前的鼎盛阶段，和自此以后直到1840年以前的由盛转衰阶段。关外阶段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虽然只能算作明代史的一部分，但却是清朝的兴起阶段，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影响。鼎盛阶段中，三藩之乱的平息和摊丁入亩的试行，标志了政治上的统一、稳定和经济上的恢复、发展。由盛转衰的阶段，则以川、陕、楚五省白莲教起义的爆发为起点。

清朝后期，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天朝”幻梦破灭阶段、顽固派跟帝国主义既勾结又争斗阶段和整个朝廷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宰割阶段。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朝统治者一向唯我独尊的

幻梦开始破灭；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前，以慈禧太后那拉氏为首的清朝顽固派，虽然也允许部分官僚办洋务，但是却反对作任何稍带实质性的改革，百日维新之后，竟一度妄图利用义和团运动来达到自己独尊的目的；庚子之役与《辛丑和约》之后，清朝统治者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榨取的驯服工具了。

清朝政权，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各族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汉族地主阶级在清朝政权的建立、发展和巩固的斗争中，一直起着骨干的作用。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她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其祖先很早以来就和汉族人民以及中央政权发生过密切的联系。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朝政权，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民族压迫的色彩，入关初期还曾一度实行了残酷的民族屠杀政策，但是，它的基本政策的实质，还是保护全国各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它的政治制度，也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政治制度。

从后金算起，整个清朝共 12 君。

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满族正处在自己的上升阶段，生产发展，实力增强。而明朝日益腐朽的统治，使汉族、蒙古等族的代表人物，日益积聚在后金和大清的旗帜之下。加上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勇武睿智、创业开国”的非凡才能，都使得清朝入主全国的可能性由偶然变成必然。吴三桂勾引清军入关，则大大加速了这种偶然变成必然的进程。

清世祖福临亲政时才 14 岁，总共也只在位 18 年，亲政以前更不过是个小毛孩，所以，谈不上有什么治绩。摄了 8 年大政的多尔衮，倒是为清朝平定江山卖了不少力气。

清圣祖玄烨除掉权臣鳌拜时，虽然只有 16 岁，但是，这不仅显露出了他的超人才华，而且为他进一步施展自己的才智，加强对全国的中央集权，恢复、发展清初的社会经济，铺平了道路、创造了条件。清世宗胤禛峻法明察、严惩贪墨、令行必果，也并非平庸之辈。清高宗弘历，虽然好大喜功、挥霍浪费，然而仍不失为较有政绩的一个。玄烨、胤禛、弘历三个皇帝，在中国封建帝王中，算

是较好的皇帝；在清朝历史中，他们更是“盛世”的开创者和维持者。他们一系列的活动，有助于“盛世”的出现和保持，但“盛世”的真正开拓者还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广大劳动人民。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斗争，才使得这一时期国土空前辽阔，政治空前统一，边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空前加强，各民族间的联系空前紧密，沙俄对中国边疆侵略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粉碎。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斗争，才使得当时的中国，无论在文化、科学（包括建筑）方面，还是在军事等方面，较之相继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一些西方先进国家落后尚不甚远，甚至不少方面仍居世界先进的行列；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尤其在东洋、南洋诸国中，有着巨大的影响。

然而，18 世纪末叶到 19 世纪初叶，中国的封建制度终究走向了自己的尽头，世界上先进国家已经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成熟阶段，因此，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人民起义的打击下，不得不转入长期积弱的阶段；西方列强的鸦片烟枪和军舰大炮，也就随之而轰开了“天朝”的大门。清仁宗颙琰和清宣宗旻宁以及后来的清文宗奕詝，不仅根本不可能改变这一必然规律，而且，由于他们的昏庸无能，整个朝廷武备不修、吏治日偷，竟加速了使中国暴露在西方列强的馋吻之下的历史行程。

清穆宗载淳、德宗载湉和末帝溥仪，均皆年幼登极，而且载淳 6 岁即位，19 岁而死；载湉 4 岁即位，38 岁而死，均是未获永年。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叶的半个多世纪里，实权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后那拉氏手中。那拉氏才能敏捷、意志刚强，但方向不对，结果揽权竞势、顽固骄虚，内阻自强之机，外结“与国”欢心，大大加速了中国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进程。如果说，载淳、载湉和溥仪是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的儿皇帝，那末，慈禧太后（尤其是辛丑以后）也只不过是各宰割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儿皇媳罢了！在慈禧太后以及后来的隆裕太后专权的阶段里，外争是不败而败，内治是“中兴”不兴、“自强”不强、“求富”不富，总

之是内外交困、每况愈下了。若无中国人民的连续不断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实在有被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的危险和可能！

1840年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和知识界中，也颇出现一些灿若晨星的爱国官吏、爱国将领和先进分子，他们的事迹、思想当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史册。然而，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洪秀全、朱红灯、孙中山等人领导的接连不断的斗争，最后终于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民主主义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从这一点说，的确是一件掀天揭地的伟业。

目　　录

第三章　明朝的灭亡与清朝的入关

第四章　清朝在全国统治的巩固与稳定

第五章　清初的经济和文化

第二编　清朝的鼎盛（1723—1806）

第六章　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内空前的统一

第七章　清朝鼎盛时期的经济和文化

第八章　清朝的转衰和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

第三编　江河日下的天朝（1806—1840）

第九章　嘉庆、道光时期的政局

第十章　嘉庆、道光时期的经济和文化

第一编　清朝的建立和在全国统治的巩固

(1636—1722)

第一章　满族的兴起

一、悠久历史的回顾

——肃慎与女真



清宫廷画满洲创始女神《佛库伦像》

明代时，女真分为海西、建州和野人三大部。海西女真大部居住在吉林扶余（伯都讷）以北的松花江大屈折后的江南，以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边的阿什河流域。建州女真分布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绥芬河流域。野人女真则遍居于从精奇里江下游直到库页岛的整个黑龙江南北广大地域。明太祖朱元璋很注意经营东北，洪武初年就设立了辽东都司；二十年（1387）6月大破元军于金山（吉林农安县附近）之后，更奠定了对松花江以北女真诸部

的统治基础。明成祖朱棣一即位，便根据女真各部“相率来归”、“悉境来附”的情况，于永乐七年（1409）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进行管辖。在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祖孙三代之时，酋长们拿着政府颁发的“印信”，定期纳贡，并为政府保守疆界；中央有所征调，他们也是闻命即从，决不违期。就是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仍基本上是相安无事的，汉族人民和女真族人民间的贸易往来，不仅频繁，而且热闹、融洽。成化年间的进士李贡曾经描写过那时的贸易情况，诗中写道：

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
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眴。
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
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

然而，随着明朝统治的渐趋腐朽，随着女真各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部间的掠杀、动乱多了起来。明初所设的建州卫，原在牡丹江与松花江合流处的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地方①。宣宗时，继任卫指挥的李满住，被野人所逼，从三姓迁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后迁到婆猪江（佟家江），最后英宗时，移居到苏子河（今辽宁新宾）上游。建州左卫指挥猛哥帖木耳（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宣宗时被“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童仓逃跑，童仓弟董山继掌左卫，因旧印“丢失”，明朝给了新印；但不久，凡察归来，手持旧印和侄儿争位，不可开交，明朝政府只好另铸右卫印给凡察，分左卫之地三土河（今吉林省辉南与柳河县境的三屯河）安置之。成化三年（1467）后，建州三卫都逐渐南迁到浑河、苏子河上游地区定居下来。

今辽宁省抚顺城郊东南20多里处，丘岗起伏、层峦叠障。过

① 一说原在朝鲜的会宁府，后“徙于开原路”，即乌苏里江东的双城子。

了南扎木，翻过玛尔墩岭，便是清澈透明的苏子河。苏子河畔，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山岗北坡，背靠鸡鸣山，西贴烟囱山（呼兰哈达），东接连绵的丘岗，正北平地，数里之外是启运山。历史上有名的赫图阿拉城，便坐落在这群山环抱的谷地之中。这谷地，方圆不过二三十里，然而，它却是建州女真逐渐强盛，最终开创了有清一代276年天下的基地！

二、明朝对女真人的压迫

嘉靖三十八年（1559），女真各部中汉化最深、实力最强的一部——建州女真里，一个“凤眼大耳、面如冠玉”的小孩诞生了，这孩子便是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十岁的时候，亲妈死了，后娘纳喇氏对他很不好，在他19岁那年，只给他很薄一份财产，便叫他出门单过。因为生活困难，努尔哈赤不得不上山采些松子之类去抚顺卖给汉族商人。由于经常和从关里来的商人接触，兼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汉文图书，他的汉化程度因而更深了，对朝廷内部情况的了解也更多了。

建州女真在正统五年（1440）搬到赫图阿拉，朝廷从正统七年（1442）起，就构筑了1 700里的辽东边墙，挡住女真、蒙古兀良哈的来路。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也先捉了英宗皇帝，女真也曾入塞“侵辽东、西”。朝廷奸贼和边将便以此为借口，屡开边隙，“出塞捕杀”，甚至“以掩杀降虏为功”。另外，女真各部酋长逝世，朝廷也不再“赐敕”致哀，子孙入贡，还大减赏宴以示轻蔑。因而，女真酋长怨忿思叛。成化二年（1466），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造了反，朝廷发兵五万讨伐，杀了董山不算，还将其弟褚安发配到福建，使他死在戍所。随后，又筑了抚顺、清河、叆阳等寨堡，对女真严加镇慑。这是政治上的压迫。

经济上：虽说建州女真生产较为发达，早在猛哥帖木耳时已用

牛耕，移居赫图阿拉以后，更是无野不耕，连山上也种了庄稼，后来，从事银、铁、革、木制作的人逐渐增多，而且大量引进汉人的先进生产技术，耕作多用汉人，织锦刺绣等更全是“唐（汉）人所为”。但是，总的说来，女真人的生产水平还不高，吃、穿、用方面，很大一部分还是靠明朝方面的贸易供给。女真人、蒙古人需要汉人的粮、种、盐、绢、缎、布、蜜、蜡、锅、铧、铲、剪、针等。需要是大量的。有时，蒙古人一次就售马千匹，买粮三百车；女真人一次交易，就换铧千件之多！因此，永乐四年（1406）开设的三个“马市”贸易市场远不够用。宪宗时，女真屡请开市，不许；神宗许了，增开抚顺、清河、叆阳、宽甸、义州等堡，但却障碍重重，控制非常紧：

第一，卡货物：神宗以前，就常不许汉人卖出铧、铲、剪、针；神宗时，甚至严格控制了盐、米、布匹的上市，逼得女真酋长“愿以儿子为质”，请求出售。

第二，榨油水：官吏通过所谓验收、征税，大加盘剥，甚至还纵令仆从逼着女真人“减价贱市，十偿三、四”，大发逼财。

第三，不讲信用，时开时闭，造成女真人经济上的损失。万历三十七、三十八两年（1609、1610），努尔哈赤部的人参，因朝廷关闭马市而卖不掉，一次就烂掉了十几万斤！

第四，绝人之路：只许女真人跟明朝“贸易”，不许他们去朝鲜做生意，叫他们“禁绝外交”。

为了削弱女真人的势力，朝廷还采用拉一部、打一部、“分而治之”的政策。朝廷武将李成梁就极力加深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矛盾。他利用海西女真哈达部的酋长王台捆了原建州右卫的都督王杲。杀了王杲之后，李成梁又极力拉拢王杲的亲戚、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失，以便最后消灭王杲之子阿台，来个斩草除根、各个击破。

万历十年（1582），李成梁派兵帮助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打阿台。阿台之妻是努尔哈赤的堂妹，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失

岂能见死不救？二人急赴阿台所在的古埒城外，叫尼堪外兰先别攻打，让他俩先去劝降。他俩第二次进城劝说之后，阿台还是不降，而且亲自督战守城。明军斥责尼堪外兰为何不战，尼堪外兰便宣言：

“谁杀阿台，谁就当古埒城主!”

城中一些贪心的人，听得喊声，便杀了阿台向明军投降，没想到明兵却来了个大屠杀，乱兵把入城劝降救亲的塔失和叫场也砍死。

这一冤案，成了努尔哈赤起兵造反的导火索。

三、龙虎将军怀愤恨

——女真各部的统一

努尔哈赤闻父、祖死，大恸，质问明朝边吏。朝廷自知理亏，给了他30道敕书、30匹马表示歉意，又授给他建州左卫都督、都督佥事加龙虎将军的衔名（爵至正二品）。



清太祖努尔哈赤

但是，明朝统治者并没有改变它分化、压迫女真人的整个政策。努尔哈赤也就一面接受封赏，一面用“但执此人(尼堪外兰）与我，我即心甘焉”的话来转移明朝的注意力。

万历十一年（1583）5月，25岁的努尔哈赤，终于以父亲遗留下来的13副铠甲起兵了。他首先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逃跑了，努尔哈赤旗开得胜，得兵百人、甲13副。随后，他又领兵追到嘉班城、抚顺所，尼堪外兰则又投奔鄂勒珲城去了。鄂勒珲城位于托漠河城

西北、甲板城正北[1]，诸部中隔，竟为努尔哈赤统一其间各部提供了借口。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女真族统一之战，便从 1584 年开始了。

历史赋予了努尔哈赤统一的任务。努尔哈赤也正好具有统一各部的条件（建州部生产发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才能。

“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努尔哈赤时刻不忘这两手。他用平等的方式跟各寨主大搞联盟，又用优待俘虏、下人的办法瓦解敌军、团结内部，同时，还注意以苦战血战为基础。

万历十二年（1584）6 月，努尔哈赤攻打董鄂部的翁鄂洛城。他正在房顶上向城里射箭，城里有个叫鄂尔果的敌人，一箭发来，射穿了他的头盔、入肉一指来深，血流至足，他拔出这枝箭刚射死一个敌人，不料洛科又对他暗射一箭，射中了他的脖子根，拔出箭看，箭头都像铁钩一样卷曲了，还带出了两块肉。部下要搀他下房，他恐乱了军心，坚持自下，结果，一下来就晕倒过去。养好伤，努尔哈赤再次攻城，抓到了鄂尔果和洛科，部下主张杀掉，他却坚持说：“这样的人，死于战阵还可惜哩，为什么要杀?”吩咐赏给牛录之官，统率 300 人。努尔哈赤这种招数，在征服人心上，奏了良效。

万历十三年（1585）2 月的太兰岗战役，充分地表现出努尔哈赤的苦战、巧战精神。战前，努尔哈赤率甲士 25 名、步兵 50 名，攻打界藩寨，不胜而归。归途中，没想到界藩寨长巴穆尼、城破逃亡的玛尔墩寨主纳申等领兵四百，追到了太兰岗之野。阵式刚刚摆开，纳申、巴穆尼便同时向他冲来。努尔哈赤单骑还击纳申，纳申一刀就砍断了他的马鞭。但他毫不畏缩，挥刀一击，砍断了纳申的胳膊，纳申坠马而死。努尔哈赤又射死巴穆尼，才压住了阵脚。甲士问他：“马疲了，怎么办?”他说：“你们下马，假装以弓弰拂雪，像拾箭的样子，从容翻过岭去休息。”自己则只率七人露了甲胄而立，形同设

① 不少史书、志书还说鄂勒珲城在齐齐哈尔西南几十里处。

有伏兵，吓得敌人连纳申的尸首也不敢收拾，一边喊着“有埋伏，咱知道”，一边退了下去，努尔哈赤这才安全脱险。

努尔哈赤就这样一仗一仗地打下来，到万历十七年（1589）以前，不但早已杀了仇人尼堪外兰，而且统一了建州各部，定了“国政”，1589年还称了王。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更粉碎了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珠舍里、讷殷等九部联军三万人的进攻，完全统一了长白山部。

努尔哈赤又花了20来年的时间，用征战和招抚的办法，统一了叶赫以外的扈伦各部，以及东海女真的许多部属。将士出征，他每每告诫要“秋毫无犯”、“不使（其）父子兄弟拆散，不使（其）亲戚分离”。有个叫浑岱的人，从锡伯率众来投，努尔哈赤下令“子孙世代，勿算其赋”，即永远免除他的赋税。

蒙古、朝鲜、明朝，对努尔哈赤构成了三角包围之势，因此，努尔哈赤很重视避免自己腹背受敌。他决定先联合蒙古。为了联合蒙古，他不念旧仇，主动搞好关系。蒙古科尔沁部曾参加过“九国（部）联军”，后来又帮助布占泰（乌拉部台吉）攻打过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竟主动遣使与科尔沁部的莽古斯、明安、翁果岱通好，对归附而来的人，一律优待以礼。万历四十二年（1613），努尔哈赤的儿子莽古尔泰娶扎鲁特部贝勒明安的女儿为妻。天启元年（1621），喀尔喀部台吉古尔布什率六百人来附，努尔哈赤把女儿嫁给他做妻，把侄女、族弟济白里的女儿嫁给了同来的莽果尔台吉，还把亲侄女嫁给仅有一百个人丁的小台吉恩格德尔。女真部落和蒙古部落得到良好的接待，纷纷来投。天启元年，光蒙古的归附者，就被编了76个牛录。

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基础上，建立了八旗制度。原来，女真人的生产和军事行动，各依族和寨而行进，每十人为一基本单位，头目称为“牛录（箭）额真（主）”①。

① 汉译为“佐领”。

实力壮大后，努尔哈赤便规定每300人为一牛录，牛录额真下设"代子"[1] 二人为副头目。五个牛录置一"甲喇额真"[2]，五个甲喇额真就组编成一个"固山（旗）"。万历二十九年（1601），只有黄、红、蓝、白四旗，万历四十三年，增设了镶黄、镶蓝、镶白、镶红四旗，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旗。八旗制度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它有力地加强了努尔哈赤的权力。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他的子侄则是各旗的统帅（称"和硕贝勒"或"固山贝勒"。后，贝勒下又设"固山额真"，即"都统"，作为贝勒以下的每旗最高管理人）。在八旗之外，每牛录又选出精壮17人组成亲军"巴牙喇"，加强王权。

此外，努尔哈赤还设立了大臣八人[3]、判官40人，规定了自己五日一临朝的制度。

他的势力，越来越大了！

这个雄心勃勃、把明朝看透了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开始与明朝分庭抗礼了！

四、分庭抗礼

——后金政权的建立与活动

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苏子河畔巍峨的烟囱山上筑起了内外三层、楼台高耸的佛阿拉城[4]；万历二十七年（1599），又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了老满文。从那时起，努尔哈赤就有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打算。随着对女真各部统一的进展，他当然不能满足这点规模。于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

① 佐领之副，汉名"骁骑校"。
② 汉译为"参领"。
③ 有的古籍说是"五大臣"。
④ 有的书上也写作"费阿拉城"。

间，努尔哈赤又修筑了赫图阿拉老城，外城的周长就有九里，城里有正白旗衙门等，还有“尊号台”（金銮殿）。努尔哈赤住进此城不久，便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停止了向明朝进贡；万历四十四年大年初一（1616年2月17日），58岁的努尔哈赤终于宣布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政权，即后金可汗之位！那一天，群臣分八旗按一定序列肃立尊号台前，努尔哈赤升殿，登御座，诸贝勒大臣率群臣跪拜，八旗大臣出班跪进表章，额尔德尼跪在最前面宣读表文，尊努尔哈赤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建元“天命”。

这个后金政权，就是后来的“大清”政权的前身。

后金政权建立后的两年，努尔哈赤趁着明神宗已30来年没临朝，政治腐败，有的大臣辞职挂印而去，各处缺官不能提补，矿监税使横征全国，边备废弛，兵马羸弱的时机，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天命三年），以“七大恨”誓师，向朝廷正式揭开了战幕。

“七大恨”指责朝廷不尊重汉区与建州边界的划分（即不尊重努尔哈赤），并且支持叶赫部抗拒努尔哈赤的统一。具体内容是：

（一）明无故生事，杀其父、祖；

（二）明支持与保卫叶赫；

（三）后金遵照跟明的协定捕杀越界明人，明却要求偿命；

（四）叶赫因有明助，才敢将许嫁努尔哈赤的女子，转嫁给蒙古；

（五）后金人耕垦柴河、三岔儿、抚安三堡之地，却遭到明的破坏；

（六）、（七）偏袒叶赫，压制后金。

“七大恨”控诉了朝廷“欺凌实甚，情所难忍”的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女真人反抗明朝统治的民族情绪。

“七大恨”誓师前三个月，努尔哈赤已作了充分的舆论与战争的准备；“七大恨”誓师时，有诸贝勒大臣统步、骑兵二万人参加；誓师完毕，这支兵马，便立即鼓行而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拿下了东州、马根单两城。随后，努尔哈赤乘夜雨刚晴，派“商队”50人先发，以重兵跟着潜进，突至抚顺城下，致书抚顺守将游击李永芳劝降，书中大意说：

> 明发兵保卫叶赫，我才发兵前来。
>
> 你多才智，识时务，我正需人才，稍微有点用的人还将举而用之，与为婚媾；何况像你这样的人，能够不叫你跟我一等大臣一样享受同等的宠荣么？……

李永芳在六年前就曾见过努尔哈赤，接受过他的赠书，如今看了这信，一面站在城南门上请降，一面叫人准备守城的东西如灰瓶、挡牌、盾车之类。努尔哈赤见李既无抵抗的决心，又无抵抗的准备，就命令架云梯攻城，杀了抚顺城的守备王命印，李永芳于是冠带整齐乘马出降了。努尔哈赤也真说话算话，授李永芳为三等副将，依旧率领原来人马，还把亲孙女赏给李永芳做老婆。努尔哈赤更命令将“七大恨”的表文和一些银钱赏给关里来的商人，叫他们带回去扩大影响。

总之，努尔哈赤这第一次夺取明朝“边城”，第一次招降明朝“边将”的战役，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全部地胜利了。

东州、马根单和抚顺一下，周围五百多个台、堡全归了后金，明广宁总兵张承荫、辽阳副将颇相廷、海州参将蒲世芳闻警立即率兵一万来追。努尔哈赤一个回马枪，歼灭了这支队伍，杀死了张、颇、蒲，缴获马匹九千匹、铠甲七千副。5月，他再次出兵，攻下抚安、花豹冲、三岔儿等十一堡，7月入鸦鹘关，攻清河城。清河副将邹储贤，以兵一万固守，后金军架云梯冒矢石而上，守兵不支，城破，储贤被杀。努尔哈赤拿下抚顺、清河等城，一下子就俘获人、畜30万，从此，更不以明朝为然了。他要求朝廷正式承认他为王，向他输彩币、纳金银。朝廷没有答复，他于是下令筑城界藩山，作为进取退守的处所，摆开了与明军大战的架势。

五、“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萨尔浒之战

抚顺、清河之役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征讨叶赫，克其大、小屯寨二十多个。叶赫一向最得明廷支持，如今立即报告。明廷原来听说抚、清皆陷，已叫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起用前山海关总兵杜松、废将李如柏等大举讨伐努尔哈赤。如今，接到叶赫报告，日夜发红旗催杨镐等进兵；还调了福建、浙江、陕西、四川、甘肃等省主、客兵驰辽，“期灭此奴（指努尔哈赤），以雪败亡之耻”。

杨镐住沈阳，命众将分四路进攻，务必拿下赫图阿拉城：左翼北路，总兵马林，自开原出靖安堡攻其北；左翼中路，总兵杜松，出抚顺关攻其西；右翼中路，总兵李如柏，从清河、鸦鹘关攻其南；右翼南路，总兵刘綎，从宽甸出凉马佃攻其东南。四路军兵88 000余人（号称47万），长驱直进，大有“扫庭犁穴”之概，十分轻敌。尤其那杜松，更是个“酗酒使令，不听文臣节制”、平生总以身多刀瘢自夸于人的莽夫，他带了三万人马，2月29日[①]出抚顺关，3月1日结大营于萨尔浒山[②]之上，自率10 000人去攻打界藩山。

界藩山上，早有后金骑兵四百、筑城夫役15 000人，据吉林崖拒战，明军四面围攻，不能得手。而努尔哈赤亲率的大军却直奔杜松一路明军而来。

原来，当努尔哈赤闻知明军四路进击之时，立即采用了李永芳“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建议，将八旗兵的全部主力60 000

---

① 本书所写月（正月除外）、日，全采公历。

② 在浑河、苏子河汇流处，今大伙房水库附近，山下战场已被湖水淹没。

余人，倾注到了杜松一支明军的方向。努尔哈赤到了界藩山之东，命代善、皇太极二旗兵马增援界藩守军，自率其余六旗45 000余人猛攻萨尔浒大营。大营中，只有监军张铨和一些偏俾末将，全靠着枪、炮等火器御守。刚一接战，天气突变，昏暗得几乎咫尺不见，明军只好点着火炬守山，金兵从暗处仰攻，借柳林以避火器，因而，很快战胜了明军，拿下了萨尔浒山的大营，迅速合兵回救吉林崖。在吉林崖山腰与后金骑兵、夫役相持的杜松军，先是遭到渡过浑河上山杀来的代善和皇太极的夹攻，现在不仅接到大营的败报，而且又见努尔哈赤六旗大军统统杀来，不禁锐气大挫，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杜松和王宣、赵梦麟等将官，全部阵亡；部卒更是尸横山野，"血流成渠"，剩下不多的余众，狂奔了20里，到舒钦山天色已黑，方才止住。

解决了明军左翼中路的第二天，即3月2日，努尔哈赤立即向开原马林一路发起攻击。马林闻杜松败，便布守于尚间崖，环营掘壕，壕外前列火器、后布骑兵，分派潘宗颜一军守斐芬山，派龚念遂一军守斡珲鄂谟，各距数里，皆列大车拒骑突。努尔哈赤先集中全力破龚念遂军，又前后夹击攻破尚间崖，拒者尽死，叶赫兵尽逃，马林仅以身免。尚间崖破后，后金军下马仰攻斐芬山，潘军尽覆。明朝的左翼北路大军，也在一天之内被全歼了。

南路明军，由刘綎领着，出宽甸口、进栋鄂路，一路稳扎稳打，打到离赫图阿拉只有五十里的腹地，只候朝鲜援兵会合齐进了。努尔哈赤一面急调兵回守，一面巧派后金兵持杜松令箭，乔装入刘营，说杜松已胜，杜军已逼赫城，催刘速进。路窄，刘乃分兵为四，自率前军进入阿布达里岗，皇太极居高击下，代善兵假冒杜松军旗帜衣甲诈入刘营夹攻。刘綎力战而死，余军随被瓦解。

杨镐闻三路皆败，急令右翼中路李如柏军归。

这样，五六日之内，明军三路惨败，文武将吏死了300多人，军士被歼45 000余人。萨尔浒一战，极大地削弱了明朝"边兵"的实力，充分地暴露了明朝"上下隔阂、皂白多混，所养非所用，

所用非所养”的致命弱点，奠定了后金渐强渐胜的基础。从此，后金眼里更无明朝，6 月攻下开原，7 月拿下铁岭，8 月统一了叶赫。明廷渐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

萨尔浒战后，朝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廷弼赴任后，斩逃将、收流民、缮守具、简士马、肃军令，不浪战，分兵把守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诸口，又画三方布置之策：以广宁巡抚统陆军，以天津、登莱两巡抚统海军，使后金不敢轻动者年余。

然而不久，熊被章劾罢官，袁应泰代为辽东经略。努尔哈赤乘机于天启元年（1621 年，天命六年）进攻沈阳。总兵贺世贤、尤世功等扼守沈阳城，环城掘壕数重，列有巨炮，绕有墙栅，守备十分有利。无奈贺世贤有勇无谋，又好酗酒、好冲动。努尔哈赤抓住他的弱点，派侦骑挑战，佯败诱而伏击。贺世贤回退，壕梁已被后金军砍断，不得入城，身中十四箭死；尤世功引兵救援，也被杀死，沈阳遂告失陷。

努尔哈赤攻克沈阳之后五天，率全部人马南攻辽东首府辽阳。袁应泰闻警，集中各军死守，并决太子河引水灌壕护城，环城还列枪炮三层，连发不已。努尔哈赤先令掘闸口，后令夺桥进击东门外明兵，而后挥军冒枪炮、火箭、火罐登城，突入西城。袁应泰督战于城东北镇远楼，见城破，举火自焚而死。于是，辽阳及河东三河堡等五十寨、古城、新甸、宽甸、永甸、长甸、海州等七十余地皆失。后金占了辽河以东全部地区，便进一步向辽西地区进攻了。

袁应泰死后，熹宗以薛国用代经略，薛病不任事，复起用熊廷弼。熊廷弼主张集中兵力防守，跟好吹牛的广宁巡抚王化贞意见不合，兵部尚书张鸣鹤、首辅叶向高等奏请撤熊，议还未决，后金兵已进攻辽西了。

天启二年（1622 年，天命七年）初，后金军攻西平堡，王化贞派孙得功迎战，孙早与李永芳谋降，战时高喊“败、败”，遂使士兵大溃，后金轻而易举地得了广宁、义州等地。王化贞仅以二仆跟从西走，到大凌河遇见熊廷弼，痛哭流涕，而后，不得不退入山海关。

六、宁远之挫与努尔哈赤之死

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天命五年）7 月 17 日，努尔哈赤的宫门外，竖起了两根大木竿，接着，他传出了命令："凡是下情不得上达的，可以写材料挂到竿子上，我一定根据材料的详情，亲自受理。"这样，他的臣下，就更加"不敢欺隐，民情皆得上达"了，结果形成了"满洲大治"的兴隆局面。

明朝呢？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世宗嘉靖时，有个叫王鏊的说过：皇帝"常朝罕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秘，鲜或窥焉，以致上下之情郁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此日积。"而到神宗万历以后，岂止君臣隔阂，就连人妖也颠倒透了。有谋略、有战功的臣子，往往遭到谗谤；无功败军之将，则只要靠上"义父"、"干爹"魏忠贤的宦党，便反倒大受其禄。广宁之役的败军之将王化贞，只获了个末等的轻罪；抗战有功的熊廷弼，却被弃市而"传首九边"！

在这种环境里，出现一两个不惜身家、奋勇把关的官吏，却也真像雨后的晨星，光亮一时。

曾做过福建延平县知县的袁崇焕，喜欢谈兵，每每遇见退役将卒，总要打听关塞军事，弄清控卫关塞的情形，以把守关塞之才自许。广宁之败时，他正值"北觐"之中，不久，便单独出山海关，遍视关外详情，夜行荆棘蒙茸、虎豹潜伏之地，往往四鼓之时才返回住处。他曾说："我不惜身命"，"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御史侯洵也算是个伯乐，建议重用他，他于是被破格录用为兵部佥事，监军关外，临行还拜访了熊廷弼，两人谈了一天。

王在晋下台之后，新任蓟辽经略孙承宗非常支持袁的主张，同意他筑宁远①城，任命他为宁前②兵备道。因他修城迅速，爱护士

① 今辽宁兴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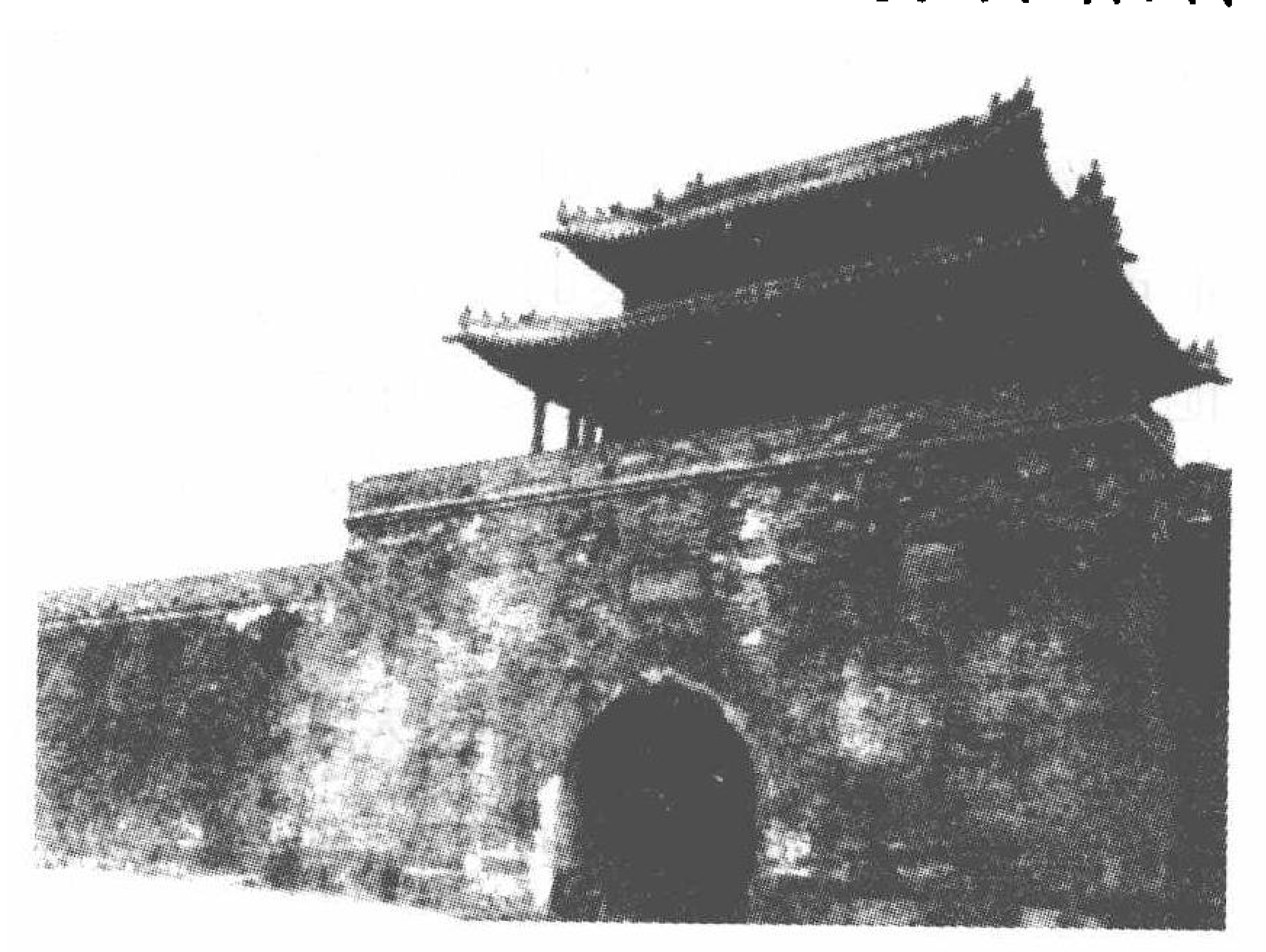
② 前，指前屯卫城，在宁远西南百余里。

卒，招徕流民，繁荣商业，又升他做了山东右参政①。孙承宗、袁崇焕同心协力，又筑起了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等数十处寨堡，恢复了四百多里的弃地；在"辽人守辽土，辽土养辽人"的方针下，训练了士兵十余万，还加强了水师，驻扎在宁远西南海中的觉华岛；又招民四百多万，屯田五千多顷。这些有为之举，确保了关外四年的平安。

孙承宗对袁崇焕非常赏识和信任，他曾写过下面的诗称赞勉励道：

与尔筹边再阅年，东西烽火尚依然。
知君定发黄公略，自昔王师贵万全。

然而，不久，孙承宗被魏忠贤解了职，蓟辽经略换成了高第。高第是个宦党，一上任就下令撤了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诸堡，委弃辎重米粟十余万。人民在迫迁中相死于道，哭声震野。袁崇焕拒不从命，上疏说："闭关而守"，是"示弱"；自己的任务，不但是"谨守宁、前而已"，还要"练兵马"恢复失地、"抚循屯种，以天下复辽东"。他对高第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不必去！"这是天启五年（1625 年，天命十年）的事情。



宁远城东门

第二年二月，努尔哈赤乘此乱机率八旗精锐长驱直西，"至海

① 明时，辽东地区属山东管辖。

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如流，首尾不见，旌旗剑戟如林”，一鼓而拿下了锦州、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诸堡，19日直至宁远城下。努尔哈赤遣人劝降，对袁说：“我以兵三十万兵来攻，此城破之必矣！”袁崇焕断然答复：“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且称来兵三十万，予亦岂少之哉？”

其实，袁崇焕的兵，才二万人！

但是，他毫不畏惧。他命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等分守四门，烧掉城外民房，迁民入城来坚壁清野，又刺血作书、拜将士以励军心，并信用居民战守。居民、商人、民伕队伍送饭送水，官生则把守巷口盘查奸细，可谓来了个军民总动员。

2月20日，努尔哈赤命八旗精锐以裹铁车牌、勾梯等攻城武器蜂拥而上。袁崇焕命家丁罗立施发红夷大炮击敌。后金兵[1]抵城下，在铁皮车的掩护下掘起城来。袁崇焕一面命扔下棉油火把以焚烧敌人战具，一面又组织敢死队缒城出击，杀退了敌人。

21日，后金军又乘夜出击，仍不成，26日只好解围而去。

努尔哈赤自25岁用兵以来，历43年，自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料在袁崇焕的手下，竟损兵折将，“大怀忿恨而回！”[2]他从此闷闷不乐，背上长了毒瘤，不到八个月，在从清河温泉沐养返回沈阳的途中，就死在离沈阳40里的叆鸡堡[3]了。

七、皇太极称帝和改革

——清朝的建立

努尔哈赤死后，按照汉族封建统治者的习惯，应该是他的二儿

---

① 实际上只有十三万。

② 一说努尔哈赤此役曾中炮负伤。

③ 《清史稿》又作“爱鸡堡”。

子、大贝勒代善继位[1]，可是，代善的儿子岳托和萨哈连，劝他让给有才能的皇太极。代善接受了儿子们的意见，撺掇老五、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的长子、二贝勒阿敏，共同拥立皇太极。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四贝勒，因此固辞不受，大家一再劝说，才在天启六年（1626年，天命十一年）10月20日即了汗位，时年34岁。代善比他大9岁，阿敏比他大8岁，莽古尔泰比他大6岁，都是旗主，都有相当的势力，皇太极只好根据父亲临终前的旨意，决定哥几个一块"南面坐受"朝拜、共同执政。结果，事事受到"掣肘"，自己"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正黄旗一贝勒"。有个汉族诸生叫胡贡名的，形容当时的情形是"十羊九牧"，确实不算夸张。又加上努尔哈赤时期遗留下来一些问题（如满汉矛盾，制度不健全，生产不景气、物价飞涨——一匹马涨价到三百两银子，牛一头二百两，米一斗八两，人也"有相食者"，所以，"盗贼蜂起，乘马劫杀"），这一切，都使得皇太极的事情，一开始并不好办。



皇太极

然而，皇太极到底不是等闲之辈，他不但在父亲生前就表现出过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此时更施展了非凡的政治手段。

上台后的第八天，皇太极便重新编庄，叫一些汉民"分屯别居，编为民户，选汉官之清正者统之"，使庄园中40%的壮丁恢复了民户的地位，赢得了后金统治区里汉官的好感，称赞他是"圣明之主"，愿意"实心齐力报答皇恩"，给他提出了不少治"国"良方。

---

① 老大褚英，1615年死了。

他于是注意发展生产：以农为本，减少工役，分给贫民一些瘠地，允许新附的汉民单独屯种，不必编入八旗，又规定以农考课官吏；他注意改进纺织、造船、冶铁等工业生产的办法；还限制满洲贵族扩大奴隶和虐待奴仆。

在军事组织上：崇祯八年（1635年，天聪九年），皇太极将蒙古军队扩充成为八旗；崇祯四年（1631年，天聪五年）组织了汉军，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德七年）也扩充为八旗。皇太极继续执行了努尔哈赤的联合、笼络蒙古诸部的政策，跟他们各部的头目歃血誓盟，对他们封官赏赐、联姻结亲。崇祯元年（1628年，天聪二年），还曾把自己抚养的、贝勒岳托的女儿，嫁给了蒙古科尔沁台吉满朱习礼。因而每有大的战斗，蒙古科尔沁部都派兵前来参加。天启六年到崇祯九年（1626到1636年，天命十一年到崇德元年）间，皇太极进一步统一了黑龙江下游（包括乌苏里江以东直至日本海）地区；崇祯九年到十五年（1636到1642年，崇德元年到崇德七年）间，他更统一了黑龙江中、上游（直至贝加尔湖）地区。对于新附之人，一部分留住盛京（沈阳）给以“牛录章京”[①]的官衔，一部分（如都勒古尔、达大密、阿济布等）则封回原地。崇祯七年（1634年，天聪八年），世居精奇里江多科屯的达斡尔族首领巴尔达奇来附，还被招为“额驸”（驸马），妻以宗室之女。崇祯九年（1636）夏，清军在鄂嫩河以西地区[②]，招抚了使鹿部头人，赏了十七套官服。崇祯十二年（1639年，崇德三年）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崇德五年）间，皇太极指挥满、蒙八旗兵，平定了黑龙江中游之北的叛乱，并在赤塔河谷追俘了叛军头目博木博果尔。黑龙江下游各族，被编为了民户；中、上游各族，被“审户比丁、列于军伍，”并“设佐领、骁骑校等分驻”。

皇太极的这些活动，巩固了后方，团结了内部，为全力对付明

① 即“佐领”，原叫“牛录额真”。

② 明代斡难河卫地。

朝提供了条件，保证了兵源。但他饱尝了明军大炮的苦头，因此，崇祯四年（1631 年，天聪五年）也铸造了红衣大炮①，名曰“天祐助威将军。”

在政治上：皇太极注意选拔人才、改革机构。崇祯二年（1629 年，天聪三年）、崇祯七年（1634 年，天聪八年）和崇祯八年（1635 年，天聪九年），他多次考拔和荐举汉族、蒙古族和满族生员，“量才录用”。贝勒萨哈连的一个奴隶、汉人宁完我，后来竟当了参将。崇祯四年（1631 年，天聪五年），他仿照明朝制度，设立了户、吏、礼、兵、刑、工六部，下置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由满、蒙、汉各族之人任职，分散满族贵族的权力，调动各族人物的积极性。这时，汉人中，有个做礼部参政的，叫李佰龙，奏请按班次排列入朝，皇太极马上同意，废了兄弟同受朝拜的格局，南面独坐受拜。后又规定：六部贝勒不得在家办公，必须到衙门上班，以便受到监督。第二年，还规定了服制、名分：护军以上的官才能穿缎子衣服，其余的人只准穿布衣；黑狐帽、五爪龙、明黄、杏黄、金黄、紫色，非汗赐不得用。还规定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主、格格、额驸等的等级和公文款式。

崇祯三年（1630 年，天聪四年），皇太极以屠杀永平、迁安两地官、民等的罪名，幽禁了二贝勒阿敏。第二年，又以持刀“上前”（皇太极面前）罪，将三贝勒莽古尔泰降为普通贝勒；后又以莽古尔泰与其妹妹、妹夫、弟弟等焚香誓、谋不轨的“罪行”，惩治了莽的势力，亲自取得了正蓝旗的领导权。大贝勒代善因拥立皇太极有功，本人只挨批评，没受处分，但其属下也被惩罚过。

崇祯五年（1632 年，天聪六年），皇太极叫达海圈点了老满文，改进成了新满文。皇太极还命令诸大臣之家 8 岁到 15 岁的子弟入学，对他们“讲明义理”，使他们“忠君亲上”。

---

① “红夷”，明朝对最早来中国的葡萄牙人的称呼；“红夷大炮”，最初是葡萄牙人献给明朝政府的大炮，后来明朝自己也能制造，不过仍沿称旧名。后金讳“夷”字，故改称为“红衣大炮”。

取得满族实际军政大权后，皇太极就进一步大造推翻和取代明朝皇帝的舆论。他说：天下，只有有德者才能统治，“惟有德者乃可称为天子”；“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从来帝王，有一姓相传、永不易位之理乎！”

崇祯八年（1635 年，天聪九年），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的称号而定族名为“满洲”。第二年 5 月 13 日，又改“大金”为“大清”，正式建立清朝，当上了皇帝。这一天，满洲、蒙古、汉族文武各官全都齐集沈阳故宫，多尔衮捧着满字表文，土谢图济农捧着蒙字表文，孔有德捧着汉字表文，率领各官跪着劝进。从这一天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正式诞生。

皇太极即位后，国势日昌，地广粮裕，又令各地互市，真是“文绣锦绮，无不备具”，腐朽的明王朝，就更不是他的对手了。

第二章　明代东北防御的崩溃

一、“自坏长城”

——袁崇焕的冤死

宁远大捷后，袁崇焕一面遣人吊努尔哈赤之丧以探听虚实动静，一面跟皇太极谈判，借以争取时间重修宁、前各城，以备持久之战。不料锦州城刚刚修缮完毕，皇太极便率两黄旗、两白旗进攻了。



袁崇焕像

天启七年（1627年，天聪元年）5月，皇太极率领的十五万大军来到了锦州城下，诱降不成，开始猛攻西城。大、二、三贝勒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亲自督战。城上的守将是赵率教，守兵只有三万人。赵率教也是个硬骨头，指挥坚决，击败了后金军，迫之撤退五里而营。皇太极又调了沈阳的兵马，攻打了一个月。一月之中，“大战三次，小战二十五次，无日不战”，到底还是拿不下锦州城。皇太极乃移攻宁远，在宁远城南和城外展开了激战，从早晨三四点钟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济尔哈朗、萨哈连、瓦克达等将领负了伤，兵士更是死伤无数。袁崇焕亲自指挥守城，最后更“凭堞大呼”，组织反击。号称“万人敌”的祖大弼，一马当先，差一点砍伤皇太

极的坐骑。皇太极损兵折将、险些丧命，不由得“大放悲声”，回攻锦州去了。而当皇太极重返锦州时，锦州的护城壕却更加宽、防守也更严密了，皇太极又损失了不少士卒。

袁崇焕指挥的这场宁、锦保卫战，史称“宁、锦大捷”。

然而，魏忠贤却使人弹劾袁崇焕，说他不率军救锦州，袁崇焕被迫辞职。不久，天启皇帝死了。崇祯皇帝上台前，听说魏忠贤谋迎福王继位，所以上台后，罢、诛了魏党，袁崇焕才得重新上任。

袁崇焕此次上任后，决定更好地整顿前方。他知道：辽宁南部海中的皮岛，北可攻击后金，东可联络朝鲜，西南则拱卫登、莱；驻守该岛的总兵官毛文龙，早先也曾从该岛袭扰过后金的后方，但后来堕落成魏忠贤的干儿子不说，还虚报兵额、广招商贾、贩运禁物，大发国难财。而且传说他甚至与后金暗通声气，崇祯元年（1628 年，天聪二年）写信给皇太极称：“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我虽为此地之官，而归顺之心常有也！……上（指皇太极）诚有意于我，如用我时，遣人来告。”①

崇祯二年（1629 年，天聪三年）7 月，袁崇焕来到皮岛，24 日，便以观将士校射之名，邀来毛文龙，宣布他有 12 罪，问其部下：“毛文龙这样罪恶，你们说该杀不？若本院屈杀了他，你们就上来杀我。”毛的部下都说杀他不屈。袁又转身对文龙道：“若不杀了你，这一块土非皇上所有！”遂西向叩请尚方宝剑，叫旗牌官张国柄执尚方剑斩之于帐前，消除了抗金前线的一个隐患。

与此同时，袁又建议朝廷加宿重兵于蓟门，严防后金绕道入犯。朝廷却未接受。皇太极于是在 11 月率兵绕道喀喇沁部，破大安口，从龙井入关，克遵化城，由蓟州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而逼进北京，驻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复移营南海子，距城关厢只有两里了！明朝总兵满桂等，拒敌于德胜门、安定门外；城上明军发炮助战，竟误伤了满桂军，满桂本人也受了伤，只好率残兵

---

① 此据《满洲老档秘录》下编《毛文龙来书·七》。也有人认为有些书信是后金编造的。

躲入城中，遗弃辎重、士卒无算。

袁崇焕得知皇太极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入战。总兵赵率教牺牲在遵化附近，袁仍追击不止。12 月 19 日，袁追到蓟州后，更以两昼夜三百余里的速度追到了北京城外，招抚了满桂的散兵，又与后金兵在广渠门外激战六小时，两肋中箭多处，只因穿着重甲，敌箭才未穿透入肉。崇祯三年（1630 年，天聪四年）1 月中旬，皇太极率兵到袁阵前，见阵坚难破，便施展起反间计来。

原来皇太极毁边入关，曾俘获太监二人，这回在撤退途中，便密令副将高鸿中、鲍承先等坐近这两个太监，故作耳语道："此时撤退，是皇上（汗皇太极）的计策呵！不久前，见皇上单骑到袁巡抚阵前，跟袁巡抚派出的两人谈了很长时间。袁巡抚跟咱有密约，事情马上就可以办成的。"事后，又故意让一个姓杨的太监逃脱。杨太监逃进北京，立时报告了崇祯皇帝。崇祯皇帝一向师心自用，独断多疑，恰巧又听得漏网宦党分子王永光等造谣："袁崇焕引敌长驱直入，想要挟皇上（崇祯）定城下之盟。"于是，马上把袁崇焕拿下，关进了诏狱。

袁被下狱后，将士放声大哭，众兵也大骂不止。半年之中，官吏有诣阙抗疏的，有申辩得罪的，还有请以身代的。孙承宗也写诗鸣不平："东江千古英雄手，泪洒皇龙半不平。"但朝廷却不予答理。而身陷囹圄的袁崇焕，还亲笔写信劝部下安心抗敌。夏天，孙、袁旧部将后金军赶出了长城。崇祯皇帝也不得不说："守辽非袁蛮子不可。"然而，那个"阳托严正之名，阴行媢嫉之私"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温体仁，却收买了袁的部将谢尚文造了伪证，诬证袁确通敌，使袁被凌迟处死了！

袁崇焕，出生于离广州不远的东莞县[1]，自幼受到"尚武"的乡人影响，"三载深心，二十年僻学"，立志有所作为。当邵武县知县时，廉洁奉公，"一钱不入"，穷到父死奔丧都"不能为行

---

① 一说袁崇焕是广西梧州滕县人，因其祖籍在广西。

李”。统兵以后，还是“第宅萧然，衣食如故”，而且“恤贫扶弱”，因而是“所至有声”。在那“君子尽去”、“小人独存”的当儿，他明知“任劳则必招怨”，却仍旧忠愤而行。第一次被罢官，他在《边中送别》一诗中，就倾吐过自己的耿耿忠心：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他不顾父母、妻子、手足，历年奋斗，自谓“大明国里一亡命徒”，真是一个奋不顾身家的志士。然而，这样一个人才，竟被凌迟处死了！袁死后，宦党分子还动辄以“袁党”为借口来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关防岂有不“日坏”之理！

二、众叛亲离

——大凌河之战与明将的纷纷降清

崇祯皇帝虽有锐志，却遇事多疑而且躁急苛细。他在位17年，竟换了50多个宰相，真是“朝无久任之士，官有传舍之情，主无信倚之诚，臣有脂韦之习”！

当初大学士孙承宗等打退后金军进攻后，开始修筑关外防线。按孙承宗的意思，是集中全力先筑大凌河城。巡抚邱禾嘉却分兵修筑右屯。而此刻，朝廷又罢了经略梁廷栋的官，代之者更决定撤军赴蓟，只留工兵万余兼筑关外两城，结果是大凌河雉堞工程仅成其半，皇太极便率军前来了。

崇祯四年（1631年，天聪五年）8月底，后金军渡过辽河，兵分两路西进。贝勒德格类、岳托等率军2万，经义州，前屯锦、凌之间；皇太极亲率的军队，有新铸大炮60门，由白土场趋广宁大道而来。9月1日，两路大军汇合于大凌河城下，一部分环城掘

壕围困，一部分伏于凌锦间的隘道准备“围敌打援”。13 日，皇太极又令一支军马在锦州方向拖土翻尘、鸣炮呐喊，引诱守军出城受歼。

大凌河的守将祖大寿，做游击时，曾受到过孙承宗的奖拔，袁崇焕督师时，又升他为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他是颇有战功的。不过这时，他的大凌河守军只有骑兵七千、步兵七千，加上工役三千、商贾二千，还不到两万人①。祖大寿料想锦州必援，因此，听见炮声，以为援兵已到，便出城冲杀，被后金兵打得大败。而援兵真到时，祖大寿却不敢相信、没有出城。

率领援兵的，是总兵宋伟、吴襄和监军张春。援兵一共 4 万人，列阵于离大凌河城 15 里的长山口。皇太极亲率 2 万人马攻击，宋伟坚阵击之；皇太极令两翼骑兵闯营，宋伟命火器齐发，无论后金军如何冲锋，宋伟的营盘仍是岿然不动。皇太极命令炮队全力轰击吴襄营，也受到猛烈的反击。吴襄为了焚毁后金的炮队阵地，下令火攻，不料风向突变，西风变成了东风，大火竟反烧了自己的大营，被迫撤退。吴襄先败，宋伟终于也抵挡不住。明军归途又遇伏，张春等 33 名军官被俘，士卒死伤无算；只有副总兵、祖大寿之弟、“万人敌”祖大弼，组织了百余人，化装成后金军，夜袭了皇太极宿营的白云山，算是援军发动的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的反攻。

援军退去，祖大寿孤军自守，又过了一个来月，后金军开始大攻。他们首先攻打拱卫城垣的台堡。那些台堡，一个个高几丈，内有兵舍、粮库、炮眼、雉堞、瞭望台和上下马道，都是砖石砌成。丢了台堡，城垣便直接暴露在后金军的火力之下。皇太极于是下令炮兵集中轰击最坚固的鱼子嶂台，轰了三天，台垛毁坏，参将王景投降。鱼子嶂一下，其余各台守军，走的走，降的降，大凌河城便失去了羽翼。加之城中粮草已尽，人且相食，兵员锐减，皇太极又

① 《清史稿》说是三万余人。

反复诱降，祖大寿便杀了副将何可刚，率领副将14员，参将、游击24员，出城降清了。

与崇祯皇帝的性急多疑、任察尚气相反，皇太极非常注意优容汉族降人，瓦解明朝的军心。那位沈阳诸生范文程①，在努尔哈赤时期权力并不太大，到皇太极时，入内秘书院奏事，竟“必漏数十刻始出”，皇太极对于他，真是言听计从。范文程也就特别为皇太极卖力，迫使明朝冤杀袁崇焕的反间计，就是范文程首先提出的。佟养性，是个被明朝关进监狱的汉人，越狱降金后，皇太极也叫他统领汉军，成为后金最早的一支炮兵部队的头领。佟养性率领的后金炮队，在大凌河之战中，立下了巨大的功劳。被俘不屈、绝食而死的明朝官吏，只有大凌河之战中的监军张春一个人。

鉴于明朝政治、军事的腐败无能，又由于天启七年（1627年，天聪元年）、崇祯九年（1636年，崇德元年）皇太极先后两次攻打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也就投向了清朝。天启七年、崇祯五年（1632年，天聪六年），皇太极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招抚与征服了察哈尔蒙古。依附明朝的察哈尔林丹汗被清军追击得穷蹙潦倒，出痘死在离青海十日程的大草滩，其妻窦土门福晋只好投降。崇祯七年（1634年，天聪八年），林丹汗之叔茂奇塔特亦降。第二年，林丹汗的另一妻子苏泰福晋，也叫其子额哲捧了元代的传国玉玺“制诰之宝”降了。

皇太极的这种剿抚并用、威恩兼施的手段，实在是高明极了。

三、洪承畴

——松山之战与明朝防御的瓦解

皇太极即位以来，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德六年），十五

① 其先世于明初自江西贬沈阳。

六年内，虽曾三次骚扰关里，但却总因没有拿下山海关和锦州而行动不便。第一次入关里，在崇祯二年（1629 年，天聪三年），是绕道大安口、龙井关毁长城才入的；第二次入关里，在崇祯八年（1635 年，天聪九年），是从平虏卫入翔州抵长城，毁城墙才入的；第三次入关里，在崇祯十一年（1638 年，崇德三年）到第二年，也是分别由密云东北的墙子口、董家口和青山关之间才入的。尽管第三次，一共克、降了一百多个城镇，逼死了待在高阳家里的孙承宗，杀掉了英勇抵抗的卢象升，掳到了济南的德王朱由枢，但是，始终未能大量歼灭明朝军队的有生力量。明朝军队的抗清主力，仍横亘在皇太极夺取关里、立足关里的要隘——山海关和锦州一带。

皇太极极力要拿下锦州和山海关。

崇祯皇帝也极力想加强锦州和山海关的防守。但是，他的兵部尚书和蓟辽总督，却像走马灯一样被他随换随撤，并且瞎指挥。



洪承畴

崇祯十二年（1639 年，崇德四年），蓟辽总督换上了洪承畴。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天命元年）进士，曾任陕西三边总督，是个屠杀农民起义军的大刽子手。他俘杀过“闯王”高迎祥，又屡次打败过李自成。李自成由四川返临潼，他设了伏兵，打散了起义军，迫使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走入商洛。一时可谓战功赫赫。

崇祯十四年（1641 年，崇德六年），清军围困了锦州。七月里，洪承畴亲率吴三桂等八个总兵、十三万人马驰援。大军云集宁远，接到锦州守将祖大寿的建议，洪承畴便向杏山、松山缓缓而行，准备步步为营、稳攻稳救。新上台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竟以持久费粮为由，派了张若麒前来监军促战。洪承畴本来也并非有识之

将，如今听得催促，便轻意地将粮草留在宁远、杏山和塔山外的笔架岗，只率了六万兵马贸然前行，叫其余的兵马随后跟进。洪到达松山、杏山一带，将骑兵布置在松山东、南、西三面驻扎，将步兵布置在离锦州只有六七里地的乳峰岗，并不立即与围困锦州的清军接仗。

皇太极得报明朝援兵大至，便于8月亲率增兵从盛京赶来，驻于松山、杏山之间，截断松、杏间明军的联系，横绝了洪承畴等的归路。随后，皇太极又派兵夺了塔山之粮。

战机已失，洪承畴才决定背松山列阵，派兵冲击清营，冲不破，就决定撤退。总兵王朴临战先逃，已自坏了军心；总兵吴三桂等逃往杏山，前被清军伏击，后有清军追赶，狼狈得不成样子。逃到杏山不久，王、吴二人又令撤奔宁远，再次遇伏，部卒伤亡十分惨重，王、吴二人仅以身免。

洪承畴事前没有决战之心，使自己的军士一下子就死掉了五万余名，溃散了六万余人，身边只有总兵二人（一人①还受了伤）、残兵万余人，被清军团团围困在松山城中。

10月，洪承畴听说皇太极回了沈阳，便悉众突围，但被清军顶了回去。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德七年）1月，洪承畴听说朝廷援军且至，又派六千兵出城夜袭，也被清军战败。败兵要退入城，洪承畴见追兵欲至，竟下令关了城门，因而大部被歼，余走杏山，道遇伏击全死。洪承畴自此不敢再战，而朝廷援军也害怕清军，逗留不敢前来。松山城一直被围困了半年之久。监军张若麒，钻进渔船从海上逃了命；兵部侍郎沈廷扬奉命从天津运粮，却好几个月迁延不来。城中粮食殆尽，副将夏承德又叩款清军，愿以儿子夏舒为质约降。3月，清军应约夜攻，一下子把洪承畴抓到了手！

松山之战，清军歼灭了明朝“边兵”的主力，锦州城中的明

---

① 曹变蛟。

军更加孤立。被围困了整整一年的锦州守将祖大寿，本来不是彻底的抗战派；他弟弟“万人敌”大弼又病不能军；加之清军期在必克，在外城的每面都分立八营围着，绕城还挖了深壕，因此，锦州城是危在旦夕的了。有个叫做武巴什的蒙古贝勒，原是守卫锦州外城的，祖大寿风闻他要降清，便匆匆决定派了副将一个、游击一员，率兵前去伏杀他。武巴什发现，双方便混战起来。这样，清军乘机攻占了外城，祖大寿最后还是走出内城，彻底向清军投降了。

锦州沦陷，使明朝经营了20来年的宁锦防线全部崩溃，这不仅使山海关变成了一座孤城，而且也大大加深了北京的危机。皇太极曾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仆；现在，明朝精兵已尽，我再四周纵掠，北京一定可得。”10月里，他便发兵大扰河北、山东，攻破了3府、18州、67县，共88个城镇。当时，老百姓砸锅献铁做炮弹支援明军，还编出歌谣说：

望见贼（指清军），莫急躁，
照定苗头才放炮。
若是一炮打不准，
空费钱粮惹他笑！

但明朝的地方官，却依旧只知与幕客饮酒作乐，且虚奏捷音来欺蒙朝廷。

第三章　明朝的灭亡与清朝的入关

一、“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福王小朝廷内幕

清军进驻北京的消息传来，江南的和从北京逃来的地主、官僚，便在南京开始了建立政权的倾轧。以史可法、姜曰广为首的一派，主张选立比较贤德的潞王、神宗皇帝的儿子朱常涝；但是，以马士英等为首的宦党官僚和军阀，则主张拥立世系较近但却昏淫的福王朱由崧。折腾一气，宦党和军阀取得了胜利。

顺治元年（1644）5 月 20 日，朱由崧即帝位于南京，建元“弘光”，以明年为弘光元年，这便是第一个南明小朝廷。结党营私的马士英掌了实权，力主抗战的史可法被排斥到江北督师去了。

马士英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面外结江北四镇，一面内引魏忠贤的党棍阮大铖，说他善谈兵，给他授衔兵部右侍郎，转过年，更擢他为兵部尚书。马士英的倒行逆施，使得刘宗周等一些比较正派的官员先后辞职罢去，小朝廷里就更无“善类”了。

那江北四镇，是指驻军淮安的刘泽清，驻军泗水的高杰，待在临淮的刘良佐，和驻扎庐州的黄得功。黄、高过去就有矛盾，刘泽清则娱心土木声色，刘良佐也无心抗战。四镇中，除了高杰后来积极抗战外，其余三人，始终各揣心腹事。

因此，小朝廷建立之后不久，7 月里，便派了兵部侍郎左懋

功、太仆寺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拿了10万两白银、1 000两黄金、一万匹绢缎，到北京去和清朝通款议和，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答应割山海关以外之地给清朝、每年向清朝输银10万两，乞求清军退出关外。清朝把他们训了一顿，把左懋功、马绍愉关进古庙，只放回陈洪范传话。清廷还致函史可法，叫南明政权削去帝号，称藩臣服，否则，清军就要投鞭断流、飞渡天堑。

小朝廷求和不成，却不积极备战，而是继续大修土木工程、遍盖衙门官署。

1645年5月23日，多铎率领的清军，攻下扬州之后，乘胜南来。6月1日，抵达长江北岸，编了许多大木筏，点了灯火，放在江中，迷惑南明守将。京口守将杨文聪、郑鸿逵，发炮轰了一阵，就连声奏捷。那知清军却乘雾用小船偷袭过江，占领了北固山。杨、郑列阵甘露寺，被清军骑兵冲破。值酒夜宴的由崧闻知，率宫妾逃走芜湖；马士英领了自己的黔军，撤向浙江。6月8日，清军开进南京城，钱谦益等一班文武官员，于是乎敛手投降。

二、“头可断，身不可屈！”

——史可法的抗清事迹

史可法，河南祥符（属今开封）人，历仕明朝西安府推官、户部主事、郎中、武英殿大学士、佥都御史和兵部尚书。早先，他也曾镇压过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但是，清军入关、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后，他便参加了朱由崧的南明政权。由于马士英、阮大铖的排斥，他未能入阁办事，只在扬州督师。他积极主张抗清，而且以“恢复神京（北京）”为宗旨，因而，被人们比作南宋的



史可法

李纲，清朝也对他特别注意。早在福王派左懋功等赍银求和、尚未抵达北京的时候，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便写来劝他投降的书信，信中说：

“我国家（指清朝）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指镇压农民起义），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雄踞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得为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

“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指由崧），宜劝令削号（指帝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盛其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侯王上。……南州诸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位，有平西王（指吴三桂）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

面对清朝的威吓利诱，史可法毫不动摇，回书答道：

“贵国（指清朝）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若乘我国运（指明朝的祚运）中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元凶为先导，义利兼收、恩怨倏忽……此不独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负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

“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谬，罪该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励三军，长驱渡河……光复神州……贵国即有他命（指劝降），勿敢与闻！”

史可法的复书，连后来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语多不屈”。

为了抗清，他主张宿重兵于盱泗、临淮、凤阳、寿州，据淮为守。江北四镇内讧，他总是从中调解，大讲团结。他“行不张伞盖，食不晋二味，睡不宽衣带”，夏天不用扇，冬日不穿裘，一心扑向攻守。泗水镇将高杰，原是李自成的部将，北进到徐州，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他亲自进抵清江浦，遣官屯田开封，并亲自担任

王家营以北至宿迁的保卫工作，指挥刘肇基部粉碎了清军对宿迁的进攻，还派高杰去联络河南总兵许定国一起抗清。在高杰被暗降清军的许定国谋杀后，他又急驰徐州招抚了高杰的部众。

顺治二年（1645）4月，多铎大举来攻，清河、淮安沦陷，淮北防线瓦解；多铎又攻淮安，渡淮趋泗，朱由崧却叫史可法撤兵回去打内战，史可法请留诸镇军兵迎击清军，不许。内战的结果，左良玉病死，儿子梦庚带了几万人马降了清朝。等史可法重返前线时，清军已迫盱眙守军和泗州守将李遇春投降，进入了亳州，史可法只好日夜兼程赶回扬州。

5月10日，清军在许定国的引导下进抵扬州城下。史可法召防河诸镇将领入城守卫，谁也不来，只有刘肇基领四千兵赶到。清军叫泗州降将李遇春劝降，史可法命人将他射跑；清军又写了五次劝降书信，史可法看也不看就付之一炬。多铎率军猛攻，史可法就坚决反击。5月20日，他又指挥炮兵击伤清军数千人。城西北角被清军攻破后，守军仍不退却，“发矢如雨”，使清军在“城下尸积如山”，直到清军踩着死尸爬上城来，刘肇基还率军进行了英勇的巷战。

事先，史可法曾对庄子固说：“城一破，请你杀了我！”现在，他引颈向子固，子固不忍，他便拔刀自刎。子固和参将许瑾连忙将他抱住，而鲜血已洒满了他的衣服。大家簇拥着他，准备突出小东门，不幸碰上了清军，他于是大喊：“我就是史可法！”清军把他押往城楼见多铎。多铎说：“先生为我收拾江南，一定不惜封你高官。”他竟断然答道：“我，头可断，身不可屈！”多铎又劝：“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可法轻蔑地说：“我岂能仿效他的所为！我的决心早已下定：城亡我亡！”

史可法被关押了3天，清将宜尔顿也劝降3天，但劝降者仍旧毫无所得。

5月23日，这位坚贞不屈的抗清豪杰，终于被清军杀害了。由于天气暴热，死尸太多（十天之内，清军竟杀了几十万人），因此，家人来收敛时，已辨不出史可法的遗体，只将他生前的袍笏，埋葬在扬州的梅花岭上。

后来，张煌言的抗清队伍来到墓前，无不“涕泗交下”；其他许多抗清武装，还打了他的旗号抗清，甚至传说：“史公没死，有人曾在闽粤一带见到过他！”这梅花岭上的衣冠墓，更是后世人们争相凭吊的处所。“碧血自封心更赤，梅花人拜土俱香。”乾隆时的诗人蒋士铨是这样称颂他的。

三、“头可断，发不可薙！”

——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

顺治元年（1644）5月28日，吴三桂和多尔衮的军队击败李自成军。多尔衮进入山海关的当天，就曾下令关内外兵民薙发。当时因南方未定，出于策略考虑，又暂时收回成命，答应“照旧束发，悉听自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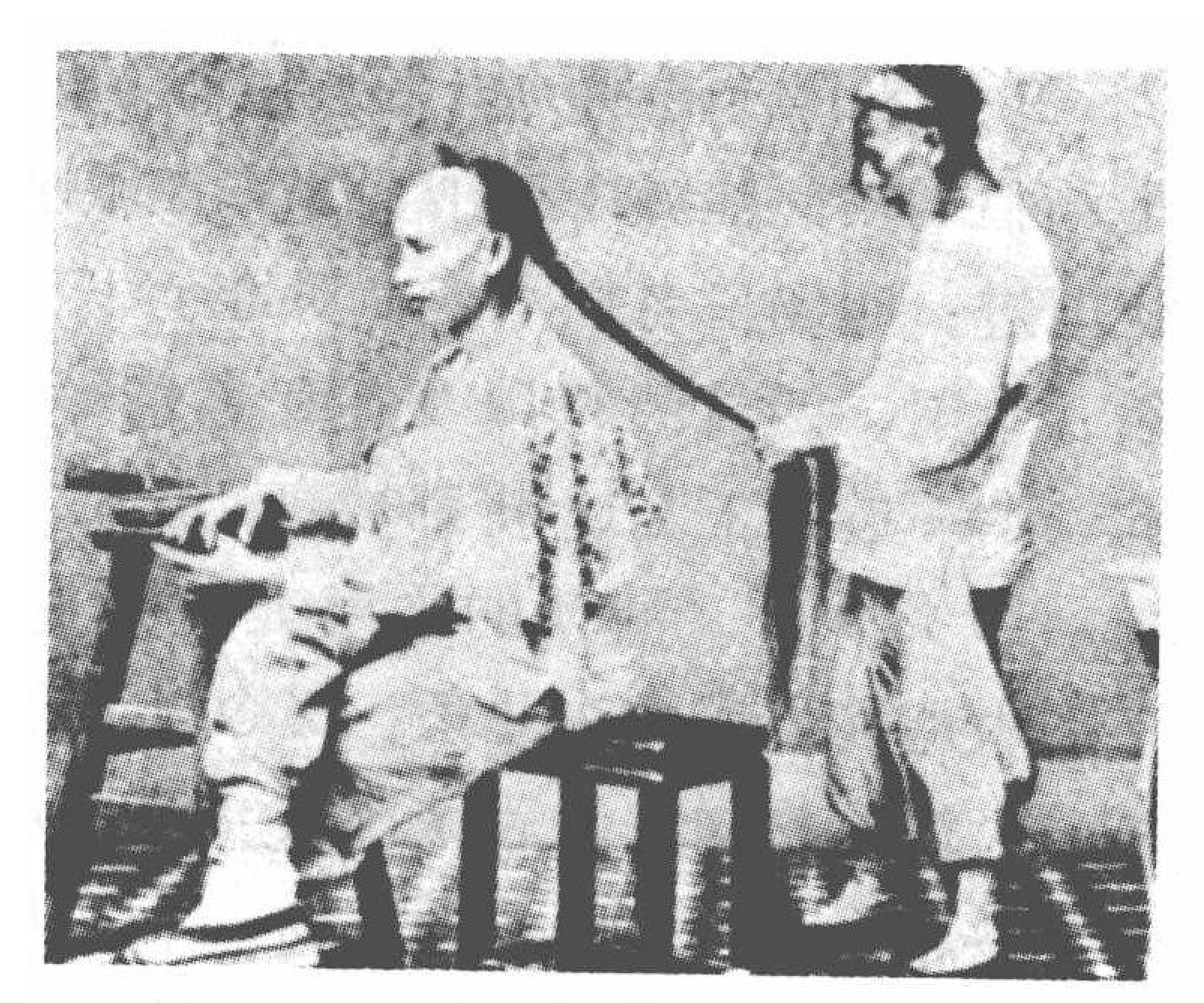
顺治二年（1645）六七月间，形势已经大变：清朝政府不仅击败农民军，占领了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等省，而且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控制了从武汉、浙江甚至直到东海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八旗兵也驻进了顺德、济南、德州、临清、徐州、潞安、平阳、蒲州诸城。因此，清政府重新下令，厉行薙发，宣布“今限旬日，尽使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行重典”，甚至上章为此事进谏者，也通通“杀勿赦”。陕西河西道孔文骠为衍圣公一门敬请蓄发，只被革职，算是唯一的例外。

清廷下达的命令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又派了不少剃头匠，挑了剃头担，逡巡于大街小巷，见没薙发的，拉来便剃，稍一反抗，就砍了头，挂在特设在剃头担的竿子上。总之，是非叫人把额角以上的头发剃了，把剩下的发编成辫盘在头顶或夯在背上不可[①]。这种强迫各族同化的政策，使人民感到人身的侮辱，加之

---

① 清之薙发，即金之“髡发”，在额角两端取一直线，剃去直线外之发，这是女真、满族独有的风俗。

清朝的其他压迫和降官的暴虐，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抗清斗争。



辫发像

江阴，“三江之雄镇，五湖之腴膏”，城垣周长九里，是南明福王政权的直隶府——常州府的属县。清政府拿下南京，传檄江阴时，知县林之骥、参将张宿早就逃了。7月，清政府派来方亨。方亨下令三日之内必须薙发，人民回答“头可断，发不可薙”。方亨叫骂不已，人民乃于23日将他捉了，共推典史陈明遇为城主，宣布抗清。商人尽献资财（共献了14万两），五六十里以外的乡民也荷戈负粮入城备战，靖江的夏起隆、泰兴的张九达也立刻响应，一时“清兵不得安处，相对多楚容”。

8月21日，多铎命七、八、十王率步、骑10余万，分16营围城。江阴人民激战三天，打死清将五人，撤入城中防守。25日夜，陈明遇派人缒城请前典史阎应元入城主守。阎，河北通州人，武秀才出身，调任广东英德县主簿，因母病缓行，后因道不通，侨居城东砂山。29日，阎入城，积极巡防。阎身材高大，双眉卓竖，目细而长曲，面赤有须，巡城时，一人持大刀相随，特像关羽，清军望见，莫不以为天神。阎、陈命令：一人守一堞，战时二人守一堞；十人一小旗，一火铳；百人一大旗，一红夷大炮；每堞夜里悬灯一盏。由于人民据城固守，所以，清军李成栋、刘良佐部屡吃败仗。

30日，清军大攻，被打死打伤九个将领。七王大怒，亲自登城，守卫者刘耐用枪刺之，他竟咬住扎枪继续上，被另一守城者刺中咽喉坠下城去。进攻不成，清军又叫刘良佐跪了劝降。阎应元大声斥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命令用箭把刘射跑。后来，阎应元右臂中了铁丸，但还是用左手持矛参战。

9 月 8 日，清朝的十王，在十方庵垒了高台，亲坐台上指挥大炮和狼烟喷筒往城中射击，守军连眼睛也睁不开了。阎应元于是匍伏前进，叫汤三老扛了炮，对准十王，亲自点燃引线。一声巨响之后，十王、四员清将以及 240 名清军，立时从高空摔下地来。至此，清军的 3 王、18 将都被打死了。

10 月 9 日，清朝的平南大将军克勒德浑亲自赶来，指挥 200 多门大炮猛轰城的东北角，又令士兵借助烟雾潜渡护城河。10 日，城破，清军从祥符寺后城攻入。阎应元乃题城楼东门道："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随后，率千人上马格斗，背中三箭，回头对从者说："替我向老乡们道歉，我不能继续报国了！"言毕拔刀刺胸投湖；未死，被俘后，骂敌不屈，夜遇害于栖霞庵内。陈明遇下马搏敌，身负重伤，最后手持大刀靠着墙壁，死而不仆。

江阴人民抗清 81 日，杀死清军三王 18 将、75 000 多人（城下 68 000，巷间 7 000）。清军攻入后，大肆屠杀，江阴人民战死、投井自尽以及被杀者共 172 000 余人，但是无一人投降。有个女子自尽前，题诗壁上说："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表达了大家视死如归、蔑视降将的英雄气概。

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得到了东南许多城镇人民的响应。嘉定，薙发令一到的 8 月 3 日，人民当时就造反：举人王某，组织了"王家庄兵"七百；史可法的部将史益，组织了"石冈兵"千人；大姓李允文，组织了"南翔兵"二千，先后响应者也有十余万人之多。8 月 5 日，南翔、石冈、王家庄诸军，轮番攻打清军。李成栋叫他弟弟李成林等去太仓告急，乡军就将李成林截住杀死。8 月 21 日，清军十多万，汇集攻城。城中百姓，在侯峒曾率领下，冒雨忍饥，大战了三天三宿。24 日黎明，清军登城而入，侯峒曾的次子问父亲"怎么办"，侯峒曾说："死就是了！"于是，父子双双投河而死。守军投河自尽者，也有数千人。

清军进了嘉定，逢人便砍。但这，还只不过是"嘉定三屠"中的第一次。

9 月 14 日，清军镇压了嘉定人民的又一次反抗，再次屠城。被杀者的血，一直没到脚踝深。

9 月 16 日，清军镇压了嘉定人民第三次反抗，又进行了第三次屠杀。这一次，儿童也未能幸免。

嘉定人民前后共牺牲了两万多人，但却坚持了 43 天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用自己的鲜血，记录了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历史。

反压迫、反薙发的斗争，还席卷了松江、吴江、崇明、昆山、嘉兴、宜兴、长兴、新城、常熟、太仓、太湖、绩溪、徽州、宁口、余姚、泰和、会稽、漳州等地。

四、异军突起

——李定国等农民军的抗清活动

明朝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牺牲后，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冯双礼、艾能奇等，各拥军数万，推可望为长，袭重庆、陷遵义，进入贵州、云南。刘文秀守四川，三战三捷，把吴三桂赶回到汉中。

走投无路的桂王，决定投靠这支强大的力量；农民军为了反抗民族压迫，也同意与桂王政权联合。因此，顺治八年（1651），农民军首领接受了桂王的封号：孙可望被封为秦王、李定国被封为西宁王、刘文秀被封为南康王。第二年，农民军扈卫桂王居于安隆所（贵州安隆县），一年供他八千两银子、一百石大米；同时，决定出讨清军。这样，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反清高潮。

第二次反清高潮中，李定国表现得极为突出。

李定国，陕西延安人，很小就参加了张献忠的起义军，由于战斗英勇，因而，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一样，被张献忠提拔为将军。与南明联合后，他奉命去收复桂林。他很快拿下沅州、靖州、武冈，而后偃旗卷甲、倍道疾进，在全州再败清军，夺取了全州西南、通向桂林的必经之地——严关。占领桂林的孔有德闻讯来

截，定国命象军为先导冲清营。孔有德死力相拒，射退战象，定国再督大象返冲，并严鼓进军。时雷电交加、大雨如注，定国抓住战机，战士一以当十，乘象势猛突，清军大溃，孔有德逃回桂林。定国乘胜追击，直逼桂林城下。

桂林大捷后，定国乘胜进军，攻下梧州、柳州、辰州，并挥军北上。衡州守将沈永忠连夜逃走，长沙守将金廷献也望风遁去，定国又连取衡州、长沙，在长沙驻军半年。四川方面：刘文秀打败吴三桂，攻克叙州；再败吴军，夺回重庆，生擒清朝都统白广生；随又进军成都，围吴三桂于保宁。吴三桂说："平生没见到过这样厉害的军队！"然后便虚晃一刀，退回汉中去了。

李定国等农民军，收复了广西、湘南、川东、川南、川西，给了清朝一个沉重的打击。清朝大吃一惊，立派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洪承畴办粮饷，率三路大军、好几十万人马进行反扑。定国在毫无后援的情况下，12 月 3 日，又与清军大战于衡州城下，不利，就伏兵于衡州以南。清军不知高低，乘势南追，果然中伏，锐气大挫，主帅尼堪也当场毙命。

定国一连串的胜利，引起了孙可望的嫉妒，不仅不提供后援，而且还总在定国背后图谋不轨。定国只得退屯武冈，梧州、桂林于是复陷。顺治十年（1653），定国从柳州出发，进军广东，围攻肇庆，攻下了平乐、高州、廉州、雷州诸府。顺治十一年（1654），定国攻下高明，围了新会。次年四月，清军猛扑过来时，他又杀到南宁去了。刘文秀出川峡，攻岳州、武昌、常德之后，也于 7 月杀回贵阳。总之，李定国和刘文秀，像两条钢绳一样，牵了清军的牛鼻子，在广大的地域里周旋。然而，顺治十三年（1656）春，当李定国在南宁战败，想撤入云南时，孙可望却再次想袭击定国军、劫持桂王。定国与文秀汇合后，共奉桂王入滇，孙可望更加恼火。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孙可望亲率十万大军进攻定国，不料将士们一致反对内战，在交河解甲大呼迎晋王①。可望见大势

① 1652 年 10 月，桂王封李定国为晋王。

已去，就领走千把人，跑到长沙，向洪承畴投了降，向清朝献了农民军根据地的地图，密报了军中虚实情况。清朝于是命多铎之子谭尼为安远大将军，领兵三路杀来。

顺治十六年（1659）1 月 23 日，清军攻陷昆明。定国主张突围去湖广，但是，桂王和臣子马吉翔却力主西逃，先逃到永昌（云南保山县），再逃到腾越（云南腾冲县西），定国也只得西撤扈卫。

云南马龙县西北的磨盘山，是横断山脉的西支，西离怒江二十里，鸟道羊肠、曲折崎岖、林密草茂，是由永昌进入腾越的必经之路。李定国料定清军骄纵、来必无备，便设栅数重、伏兵三道，每伏二千，约定：清军进入三伏，鸣炮伏击。清军果然中计。但刚进入二伏时，有个叫卢桂生的人（明大理寺卿）却告了密。清军立即分八队冲锋，同时以炮猛轰。定国挥军击杀，杀死清将都统以下军官十多个、清军好几千。这一仗，虽未如愿尽歼清朝追兵的主力，但仍不失为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最后一场漂亮仗，以致定国夜里撤军时，敌人竟不敢穷追。

2 月，桂王听了沐天波的话，出铁臂关逃入缅甸，他的臣子僚属蔑视、骚扰缅甸人民，所以，李定国和白文选赶来后，始终未能汇合。吴三桂又极力劝说清朝进兵，上了所谓“三患二难”之疏，鼓吹“以净根株”、“一劳永逸”。于是，缅甸政府迫于吴三桂十万大军的压力，在康熙元年（1662）1 月 20 日，将桂王及其家属献给了吴三桂的前锋高得捷。定国获悉桂王被俘，率军邀击清军，不遇，呕血病重；6 月底，听说桂王已死，便回军云南的猛腊（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属），8 月 10 日逝世于军中。临终，还告诫儿子和部将：“宁可死于荒徼之地，也千万别降！”

李定国联明抗清 11 年，不但在军事上显示出了非凡的能力，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也施展了超人的才干。他发扬光大了农民军的“掌家”制度，金帛米粟，俱上掌家，人人不私蓄一点；他设立了“管庄”制度，一定程度地限制了地主、商人的剥削，田地、

盐井，“官四民六”地分配，或抽一定的税收；他严明军纪、从宽理民，不但使管辖区“军民相安”，而且使罗倮、傜、佬等少数民族也乐于参战。他驻军长沙半年，长沙人民几乎“不知有兵”！这样，定国死后，部下竟聚居不散，自称为“桂家”，他们开矿、务农，为开发边疆，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另一支——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在李锦（过）、高一功（李自成妻弟）的率领下，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联合，曾经北伐清军，后来，转战于广西浔、梧之间。顺治七年（1650）夏天，遭到南明将领陈邦付的袭击，在向贵州转移的途中，又遭到了野心家孙可望的袭击。在高一功牺牲、李锦病死后，这支部队，便由李锦的义子李来亨率领，向川、鄂一带挺进，顺治八年（1651），到达巴东一带，与郝摇旗（永忠）等起义军和荆襄一带当地谭诣等人率领的抗清队伍联合，组成了夔东十三家军，积极打击清军。

李来亨在巴东县群山中的“九莲坪”扎下营盘，注意发展生产、保护过往客商，并与南明抗清势力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势力发展很大。顺治十一年、十三年（1654、1656），对清军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攻击，并把势力发展到了四川的达州。顺治十五年（1658），李来亨又乘清军分三路追攻桂王之机，和夔东诸军一起攻打重庆。战斗方酣，谭诣叛变，才没把重庆拿下来。

清朝发现李来亨不好惹，便四处贴布告招降，李来亨不予理睬，继续斗争。康熙元年（1662），清朝川、陕、湖广三路大军“会剿”，李来亨率部进行了英勇的反击。第二年，他表面上将大本营撤入九莲坪的山寨，暗地里却派人化装成小贩混入清营，然后大举反击。混入清营的战士放火，里外夹攻，伤亡清军万余，清军的三省“会剿”彻底失败。但清军仍不死心，随即又实行封锁、围困之策。

康熙三年（1664），郝摇旗牺牲，李来亨退入茅麓山据险固守。清军派他的在清朝做官的表舅写信劝降，遭到了李来亨的拒

绝；清朝又派官员李有实来说劝，李来亨下令将他斩首。8 月，清军加强了围攻，李来亨便决定突围。不料图海率领的清军三路兵马，死死地将山麓围住，他们不能从峭如斧削的正面进攻上来，便在王士品的引导下从后壁偷爬上来，打破了山寨。三万起义军英勇奋搏，只因应战仓促，150 人被俘，其余全部牺牲。9 月 24 日，李来亨战斗到最后一息，全家投火牺牲①。

起义军的苦斗精神，与南明官僚们的苟且偷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五、父子同仇与父子异道

——夏完淳、郑成功的抗清斗争

农民军纷纷抗清之时，祖国东南部也出现了一些抗清志士。

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下南京，进抵苏杭时，松江府华亭县（江苏松江县）的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以及完淳的老师陈子龙，也举兵反抗，投入了滚滚的抗清洪流。

夏允彝，字彝仲，号瑗公，曾事明朝，“独处一室，志常在天下”。夏完淳，初名复，字存古，清军入关后改名完淳，别号小隐。完淳自幼受到父亲、老师、母亲、姐姐等的良好教育，不但有着投身正义事业的好思想，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好诗词。父亲起兵时，刚刚十五岁的他，便投笔从戎了。父亲死后，他又投到太湖义师首领吴易的麾下，当了一名参谋。吴易是个文武全才，曾经攻下吴江、光复海盐，分湖一役就歼敌三千余人，逼得清军龟缩在苏州城内不敢出来。完淳到得吴易军中，就参加了光复海盐的战役。吴易兵败之后，他写诗道：“缟素酬家国，戈船决死生”、“战苦难酬国，仇深敢忆家！”足见他早已立志战死疆场、不顾身家了。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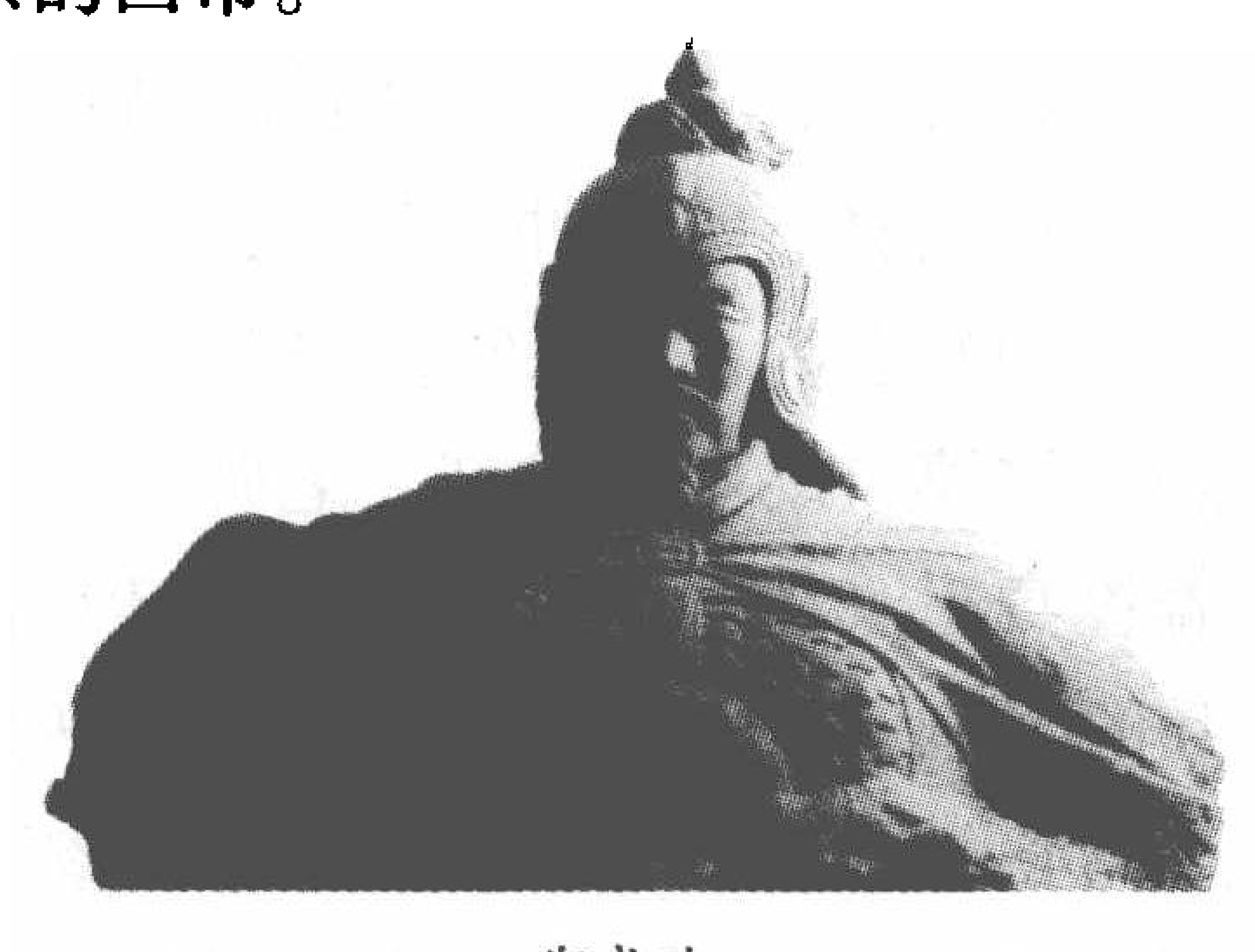
① 有的史书说是全家自缢而死。

的老师不幸被捕，不屈投水而死，更为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又作了《细林野哭》的诗来歌颂，并再次表示自己不惜牺牲的决心。他写道："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老师死后的两个月，清军小头目顾咸正、刘曙便捉到了完淳。完淳被捕后，骂得洪承畴手足无措，同时又在狱中豪放如常，挥笔写下了血泪交融的《南冠草》！其《别云间》云：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完淳又有诗说："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更见他的视死如归了。顺治四年（1647）9月19日，这位年只十七的英雄，和他的岳父钱旃一起，就义于南京的西市。

和夏完淳父子同仇相反，郑成功父子却走着相反的道路。


郑成功

郑成功（1624—1662），原名森、字大木[①]，福建泉州南安石井乡人。父亲芝龙，原是海盗颜思齐部下，后降于明朝福建巡抚沈犹龙[②]，明崇祯六年（1633）荷兰舰队侵扰厦门时，福建巡抚邹维琏派军反击，芝龙为先锋，奋勇作战，击沉荷舰五艘，俘获一艘，立过战功，积

① 后被唐王赐姓朱，改名成功。
② 有的书说是熊文灿。

官至都督同知。成功的生母，是日本平户田川氏[1]之女。成功7岁归国后，居住在福建晋江的安海，他读书刻苦，考试总是名列前茅。

清军入关后，21岁的郑成功去到南京，在福王的太学里念书，师事过钱谦益。福王失败，谦益投降，父亲和叔父（郑鸿逵）等拥立唐王，叫成功入侍以监视唐王的行动。唐王的思想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成功。一天，成功见唐王闷闷不乐，便说："陛下闷闷不乐，莫非是我父亲（挟持）的缘故？但我受了国家的厚恩，义无反顾，一定会以死报答的！"并条陈了许多复兴之计。此前，唐王见成功忠诚可嘉，便赐姓朱，令统禁旅；此时，唐王更被成功的忠诚所深深感动，说："真是将门出虎子呵！"封他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

顺治十二年（1655），成功改中左所（厦门）为思明州，设六官，分所部为72镇。顺治十四年（1657），桂王晋封他为延平王、招讨大将军。

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三路入云南攻桂王，成功便与张煌言再次北伐，由崇明入长江，克瓜州，尽歼清援军于杨篷山，攻下镇江，镇江属邑望风而下。煌言部也由芜湖进取宁徽诸路，安徽列镇，望风反正。凡得4郡3州24县，东南大震，吓得顺治皇帝竟想逃回关外（被太后训了一阵，才算安定下来）。但是，成功没听部将甘烨的话（先取扬州，北断山东之师、南绝江浙之粮，然后再取南京），而是鼓行而西，直薄南京城下。结果，先败于城北门外，随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清总督郎廷佐使人哀求成功："我朝军律：守城过30日，罪不及妻孥。请宽30日之限。"甘烨等又力谏，煌言也写信忠告，成功还是不听，执意缓攻。结果，敌崇明总兵梁化凤赶到，以兵卒数千，夜自神策门的地道里杀出，又以骑兵数万前后夹击。成功大败，战船损失500只，许多部将（包括甘烨

---

① 一说为日本平户"翁氏"之女。

在内）战死。遭此失败，成功退回厦门，煌言也败退入山并最后入海了。

顺治十七年（1660）清廷命将军达素等进攻厦门，成功扼海门拒战，亲自持旗指挥，风吼涛立，军士踏浪如飞，杀得清军大败、死伤无数，连满族精卒数百也投了降，其余的退陷于淖，十死六七，首领哈喇土星被擒，达素回福州自杀。从此以后，终成功之世，清朝方面再也无人敢言进攻。第二年，清朝采纳了方星体、方星焕哥俩[①]的建议，下令禁海，把沿海三十里以内的人民迫着内迁，想把郑氏困死。12月，芝龙家人尹文器诬告芝龙"通海"，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乃于23日下令将芝龙及其家属11人斩于柴市，并派人掘了郑家的祖坟。成功闻讯，北望而哭道："若听儿言，何至杀身！"

郑成功父子走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郑成功击败清军之后，留子郑经守厦门，在顺治十八年（1661）3月23日，率官百余员、兵25 000、船舰900，从金门的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台湾，秦汉时称"岱舆"、"大冤"，三国时称"夷洲"，隋唐时称"流求"，五代时称"北港"，宋元时称"昆舍那"，明初称"鸡笼"，"东番"或"台员"，万历二十七年（1599）才正式称为"台湾"。南宋时，台湾属福建泉州府晋江县管辖；元时属于澎湖巡检司，隶福建泉州路同安县（厦门）；明时仍立巡检司管辖。天启七年（1627）福建受灾，郑芝龙建议福建巡抚熊文灿移民数万去台湾垦种。万历三十一年（1603）、天启二年（1622），明政府曾两次击退荷兰殖民者的侵略。天启四年（1624），荷兰殖民者竟侵占了台南；天启六年（1626），西班牙殖民者又侵占了台北的鸡笼港。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德七年），荷兰人撵走了西班牙人，占领了全台，在安平筑了赤嵌城，在台南建了赤嵌楼。……

---

① 有的书说是黄梧。

郑成功一帆风顺地到了禾察港，登陆后，立攻赤嵌城。4 月 2 日，成功打败了猫难实叮；4 月 3 日，成功又截杀了荷兰总督揆一派来的援军头目拔鬼仔；4 月 4 日，猫难实叮只好请降。但 4 月 5 日，揆一派通事胡兴来说：只愿进贡白银，不想撤走。成功派通事李冲断然答复："台湾者，中国土地也！"，"地当归我！"揆一重又开战。成功于是困之，并击败了卡尤从爪哇率领前来的援军。揆一被围 9 个月，殖民者死伤 1 600 人，水源也被截断，被迫答应了成功提出的 8 个条件，于康熙元年（1662）2 月 1 日献城投降。成功终于光复了台湾，荷兰殖民者 38 年的统治终于宣告结束！

光复台湾后，郑成功写过一首题为《复台》的诗，诗云：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①。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这首诗，强烈地表达了这位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思想，也表明了他誓死不降清朝的斗志。

六、"满、汉官民，俱为一家"
——满、汉地主的进一步合作

清朝迁入关内，在短短的十七八年里，基本上在全国范围稳定了清朝的统治，其中的主要奥妙便是满汉剥削阶级的合作，是清朝争取到了汉族地主对它的支持。

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族贵族和以范文程为首的汉族降臣，首先采用了攻心战术。进关前夕，多尔衮对范文程、洪承畴等，言听计从。范文程告诉他：清朝不是在跟明朝争天下，而是跟农民军争天

① 顺治九年（1652）郑芝龙的部将郭怀一曾举行过抗荷起义。

下。于是，清朝便提出了“灭流寇以安天下”的口号，来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同时，清朝又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掠杀政策，不准杀无辜，不准抢财物，不准烧房子，宣布：“有抢汉人一物者，即行处斩”；迎降者“官仍其职，民复其业”；首倡内应者，城破后破格提升。

打到北京后，多尔衮又接受范文程等的建议，为崇祯皇帝、皇后发丧，派人保护明陵，宣布“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朱师鍙（yíng）来归，还任以保定知府。范文程对多尔衮说：“治天下在得民心。知识分子是最优秀的民，得了他们的心，所有民的心也就得到了。”多尔衮于是马上跑到孔庙去行礼，还规定：每年三月、九月，必须派官致祭。顺治九年（1652），顺治皇帝也亲自到孔庙去祭奠，并拨了三万两银子修庙。他们还组织明朝文人修《明史》、编儒书，通过《顺治大训》、《资政要览》之类，大力提倡忠、孝。

在攻心的同时，清朝政府又给汉族地主一定的政治、经济上的甜头。一进关，它就宣布：取消明朝的加派，将什么辽饷、练饷、新饷、召买等等，通通免除；官员、退休官员、举人、贡监生员，都减免一些赋税、徭役。清朝政府还帮汉族地主恢复旧业。山东诸城有个地主叫丁耀元，农民起义时，逃到海上，顺治二年归来，清朝政府便帮他查明了原产。政治上：清朝政府不仅规定降附者升级、殉死者立庙、隐逸者征辟录用，而且，使汉族官员表面上做到能与满族官员平起平坐、有职有权。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命令：内、外衙门的公章，一律要铸有满、汉文字。顺治十六年（1659），政府更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管印，“不必分别满、汉”。至于奏事，也要求满、汉官员“公同来奏”，不许“只有满臣，不见汉臣”。内阁大学士，起初，满人是一品，汉人只二品，顺治十五年（1658）改为全是一品。六部尚书，起初，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1659）也全改为正二品了。顺治帝喜欢画画，还不时画了水牛或大臣们的像，赐给满、汉

官员，鼓励他们同心卖命。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多尔衮和顺治帝任用汉人，颇有这种特点。他们都“邪正兼收”，不管是东林还是宦党。对于他们的毛病，袒护得也较彻底，有时甚至斥弹劾者为“陷害忠良”。宦党骨干冯铨，清朝一入关就被录用，官至礼部尚书。第二年，御史吴达告他的状，说他是魏忠贤的干儿，揽权受贿，多尔衮压而不发。顺治十年（1653），顺治帝也说：“国家用人，着眼于叫他立功，而不是叫他再犯错误。……（冯铨）本来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且博通典故、熟悉政事，因此特地召用，以使他自新。”任命他做了宏文院的大学士，第三年加了“少师”衔，顺治十六年（1659），还以太保、中和殿大学士衔养老。

为了联络满、汉地主的阶级感情，顺治五年（1648），多尔衮还决定：自后允许满、汉官民通婚。顺治帝亲政后，还将皇太极的第十四女，嫁给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

汉族地主、官僚，受到清朝的重视，一个个当然乐于效命。顺天巡抚宋双，杀了农民军首领黄锭降清后，上了“治平三策”（上崇祯庙号、禁革加派、广罗人才）；工科给事中朱鼎蒨提出“轻徭薄赋”；曹溶和龚鼎孳则建议开科取士，以收“民”望。

果然，顺治二年（1645），清朝开科取士了！官荫利禄，进一步冲淡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的故国之思，吸引他们加入了维护清朝统治的营垒。这一年，乡试的结果，取了士子 1 534 人。正常开科（三年一次）之外，朝廷还决定加科，加科之外，又举博学鸿儒，为汉族知识分子大开仕进之门、大张利禄之网。于是，大多数士大夫，都扑进了清朝的怀抱：那个崇祯四年（1631）的状元、曾经讽刺过吴三桂的著名诗人吴伟业，入京供了职；那个曾经怀着孤臣孽子深痛的万斯同，也以私人身份襄赞了清朝的史馆。至于起初还告病徬徨的秀才们，现在却已悉数报名应考了。这情形，恰似一首讽刺诗所说：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雀顶，腹中打点旧文章。
当年深知惭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
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不过，拒绝征辟、誓死不仕清朝的，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类人，也还有一些。其社会影响和活动能量，亦确乎不小。顺治十八年（1661），江苏吴县知县任维初滥施刑法、贪贿浮征，诸生金圣叹、倪用宾等十八人，一下子就煽动了千数人，借顺治帝死耗传到苏州，便聚集在文庙大哭大闹，并向府堂进呈揭帖。巡抚朱国治报告朝廷，朝廷立派叶尼访纠，将士子们凌迟处死。可怜那才子金圣叹，临死前还口赋一绝道：

天公丧母地丁忧，万里江山尽白头[①]。
明日太阳来作吊，家家檐下泪珠流。

在他看来，他死后，士子们一定会含泪反抗。但他哪能想到：在清朝上述笼络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下，满、汉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早已开始了进一步合作，使清朝的统治迅速稳定下来。

① 据说刑前下雪。

第四章　清朝在全国统治的巩固与稳定

一、康熙平定三藩之乱

顺治十八年（1661）2月5日，顺治皇帝福临死，继位的是他的第三子玄烨，这便是有名的康熙皇帝。



康熙像

康熙皇帝即位时，还差三个月才满八周岁，因此，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共同辅政。四人中，鳌拜武功最多，本人又是“巴图鲁”（勇士）出身，所以，结权内外，意气凌轹。他叫自己的儿子那摩佛做领侍卫内大臣；矫诏杀了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和户部尚书苏纳海后，还强逼着康熙皇帝表态，处死了苏克萨哈，独揽了“辅政”大权。大臣议事，稍有不顺，他便当面呵斥；科道人员条奏，他即阻止；文武官员，非亲他而不任；凡事更是在他家议定了才施行。他还支持三藩，鼓励吴三桂铸钱、圈地，甚至叫云贵总督、巡抚听吴指挥。

苏克萨哈死后，他常常称病不朝，要康熙皇帝亲去问疾。一次，康熙皇帝去看他，侍卫和托见他神色不对，揭开卧席，竟发现一把刀子。总之，鳌拜是没把娃娃康熙皇帝看在眼里！

康熙六年（1667），玄烨亲政。亲政不久，便以下棋的名义，召索额图入宫商定，日选小内监之强有力者以练习布库戏[①]为名，准备除掉鳌拜这个权臣。康熙八年（1669）6月14日，鳌拜奉诏入宫，刚满16岁不久的康熙皇帝，便指挥一帮“娃娃兵”将他拿了，斩了他的党羽，牢牢地掌握了朝政大权。

康熙皇帝亲政数年，习知了中央与地方的利弊与前代方镇的得失。而久握重兵，世镇云南、广东、福建的三个藩王（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已经势成尾大，甚非国家之利了。他们握有独立的军队（吴有53佐领计12 000兵，耿、尚各有15佐领，计六七千兵），享有独立的财权（用财不受户部的稽核，而且朝廷每年尚需拨给他们军费2 000余万两，占去全部收入的88%，而其本省的收入，朝廷不得征收），甚至还有独立的任免权（吴三桂用人就不受吏、兵二部掣肘，自行任选，号为“西选”，甚至还有权将西选官派向藩外各地，督抚们必须格外礼遇）。

三藩中，以吴藩实力最强、野心最大。三桂手下有个福王的遗臣叫查如龙的，曾写血书叫他造反，被朝廷破获后，三桂又听了吕忝子的建议，表面上大修园庭、广罗歌童舞女，装成心无大志的样子，暗地却加紧派兵守关、操练军马、修造战舰器械、“储将帅之选”、购买战马、潜积硝石琉磺、广殖财货，待机欲动。

耿精忠袭爵[②]后，也怀异志，又有不肖之徒告诉他：纤纬中有“天不分身火耳”之言，将来“耿”必当位，于是，其野心也就更

---

① “布库”，满语“相斗赌力”意，又谓之“撩脚”。壮士二人，伺机蹈瑕、专赌脚力。戏者穿窄袖白布短衫，衣领很长，用七八层布密密缝好，结实耐扭。戏始，两两作势，各欲乘隙取胜，继则互相扭结，以脚相掠，仆地者为败。这本是皇帝巡幸、筵宴中合欢的四事之一。

② 其祖仲明，顺治六年（1649）死于江西古安的行军途中，其父继茂袭爵，继茂死后，精忠袭爵。

大起来。

尚可喜年老多病，长子之信总理藩事。尚之信嗜酒嗜杀，纵狗食人不说，连老子的话也不听。一天，可喜派宫监传他有事，他竟指着这个宫监的大肚皮说："此中必有奇货"，说着说着，就用刀戳开了这个宫监的肚子。尚可喜不甘受制于其子之信，不得已听了幕客金光的话，于康熙十二年（1673）4月上书乞归辽东、留子镇藩。朝廷遂令其尽撤藩兵归籍。吴三桂和耿精忠闻知，各不自安。为探朝旨，七月，耿精忠"仰恳皇仁，撤回安插"；吴三桂也听了幕客刘玄初的劝告，"冒干天听，请撤安插"。议政王贝勒大臣议，仍持两端，20岁的康熙皇帝却竟"特诏：从其所请"，并派了傅达礼去云南、梁清标去广东、陈一炳去福建催促。

吴三桂弄巧成拙，只好阳为恭顺，阴事迁延。他一方面派人与耿、尚密谋，一面封闭所有要隘：只准进人，不准出人。他原是主动绞死桂王的逆子，现在又装成忠臣的样子，提出撤行之前要谒永历皇帝的陵墓，并指着头上的冠冕对部下说："先朝曾有这样的帽子么?"又指着身上的衣服对部下说："先朝曾有这样的衣服么?"然后说：辞行当以故臣的衣冠相见。于是，他戴了方巾，穿了素服，伏陵痛哭，哭得竟站不起来了！傅达礼见他赖着不走，就要回朝报告，但只走了一百多里，就被把关人员截了回来。康熙十二年（1673）12月28日，吴三桂捆了巡抚朱国治，杀了他；又拷打了傅达礼等，置之"瘴地"；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声称要"伐暴救民，顺天应人"，还诡称遇到了"先王之三太子"，要"恭奉太子"为明朝复仇，总之是扯



吴三桂斗鹑图

起白旗首先发难了！

康熙十三年（1674）4月，耿精忠反；康熙十五年（1676）3月，尚之信接受了吴三桂的“招讨大将军”的封号，也反了。先后反的，还有贵州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深，云南提督张国柱，镇守广西等处将军孙延龄、提督马雄，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洪等。襄阳总兵杨来嘉、河北总兵蔡禄、陕西提督王辅臣、察哈尔蒙古旗的上层分子等，也在北边响应。

三藩乱起，举朝震骇。京中一些官僚“未知所归”，有的甚至“即遣妻子回原籍”。而原来反对撤藩的大学士索额图，则请杀主张撤藩的明珠（兵部尚书）等以谢三桂。康熙皇帝深辟其说，宣谕撤藩是自己的主意，不准委罪他人，并决定以打击吴三桂为重点：命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遣将驰荆州、守常德，赴武昌、守岳州，防三桂东犯湖广；又叫西安将军瓦尔喀进驻四川以绝三桂自滇入蜀之望；同时，还以莫洛为经略，率精兵驻扎西安节制西北诸军，并加强了安庆、南昌等地的防守。

然而，吴三桂起兵之后，立即分两路北进：马宝率领的一路，由贵州攻湖南，很快就攻下沅州、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四州一府；王屏藩率领的一路，进入四川，在川北几次截断清军的饷道，迫使瓦尔喀部退回广元。三桂本人，亲自督战于常德、澧州，并派西藏的喇嘛致书康熙皇帝，要求“裂土罢兵”、划给他长江以南。而清军将领贪生怕死、不敢进击，勒尔锦驻在荆州，听说吴三桂要来，竟吓得埋了传教士南怀仁新铸的大炮首先逃跑，有的官僚也主张把襄阳以北让给吴三桂。但是，康熙皇帝毫不动摇。他斥退了喇嘛的斡旋，提出要御驾亲征，并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协助勒尔锦攻取岳州。

裂土议和不成，吴三桂就派兵由长沙进攻江西，与耿精忠的叛军合作，攻陷了三十余城；同时，叫王屏藩等由四川进攻陕、甘，威胁清军后方。康熙毫不示弱，派岳乐出兵江西，再由袁州直取长沙；派洞鄂与莫洛由陕攻川；派杰书等由浙攻闽；派金光祖等由粤

攻桂。

康熙十四年（1675）1月，吴三桂的义子、顺治五年曾反清起事的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宁羌发动叛乱，打死经略莫洛，迫使洞鄂退守西安。吴三桂闻报，立送犒银二十万两，封他做“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还派王屏藩前去接应，不久就攻陷了秦州、兰州、巩昌、定边等地。三桂也亲往西边赶来，扬言要决江坝灌取荆州、拿下北京等等。康熙皇帝先是派了王辅臣之子王继贞抚谕王辅臣，不成，即派大学士图海为定远大将军进击，迫使王辅臣投降、王屏藩退守关中。康熙十五年（1676）清军光复陕西。与此同时，杰书等也用剿抚结合的办法，克复了江西、浙江，迫使耿精忠投降。

侧击吴三桂东、西两翼成功之后，康熙皇帝命令岳乐等专攻湖南。康熙十七年（1678），清军收复了浏阳、平江以及湘、赣许多城池，因而，屯兵进入衡州的门户——永兴城，还招降了驻在湘潭的吴三桂的水师将军林兴珠。

吴三桂见大势不好，终于撕下“复明”的假面具，3月23日，冒着大风雨，登上衡山新筑之坛，草草祭天成礼，即位当了皇帝，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无奈此时他已67岁，又得了“病噎”（大概是食道癌一类的病），所以并不舒服。他叫马宝去攻永兴，没攻下，八月里，就一命呜呼了。

吴三桂一死，马宝便撤回衡州。十月里，大家把三桂的孙子吴世璠从云南接来继位，改元“洪化”，还想挣扎挣扎。早先，吴三桂曾置地图，祈祷过衡州岳神庙里的小灵龟在图上指示自己的前程。小灵龟蹒跚循走，不出长沙、常德，返至南边而止；再拜再祷，龟复如是，三桂与其党相顾失色。如今，世璠即了位，也恰好只得退回贵阳。

清军解了永兴之围，加强了水陆攻势，康熙十八年（1679），收复了岳州、常德、夷陵、澧州、长沙、辰州、沅州，拿下了衡州，剿平了湖南。广西方面，清军取得了进展；四川方面，清军大

败了王屏藩，年底，屏藩被迫自杀。清军随后收复成都、重庆，平定了四川。

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皇帝命清军三路进攻云、贵。彰泰一路由湖南攻贵州、云南；赖塔一路由南宁攻云南；赵良栋一路由四川攻云南。康熙二十年（1681）2月，彰泰军大破夏国相象阵于盘江西坡，尽复贵州，吴世璠逃往昆明。3月，彰泰与赖塔两军汇合于曲靖，进至昆明附近。吴世璠迎战于30里外，用大象拒战。清军猛攻，自晨至午，终于击溃象阵，大象狂奔而返，反践了吴军的队伍，吴军大溃，清军进扎归化寺。吴世璠忙召先前派往四川阻敌的藩兵回救，被清军狙击在城外；吴世璠又向西藏喇嘛乞师，也不果。十月，赵良栋军也齐集城下了。不久，昆明南门守将开门迎降，吴世璠只得服毒自杀。那个陈圆圆也上吊而死①。吴世璠被函首送京，吴三桂被掘坟折骨。而尚之信则早在康熙十九年（1680）8月，康熙胜算在握之时被赐死。九月，耿精忠亦被囚系待罪，云南平定后的1681年11月也被寸磔而死。吴三桂等发动的三藩之乱，乱了八年，折腾了十余省，终于以自己的粉身碎骨而告终。

年轻的康熙皇帝，顺应人民的统一要求，坚定不移地平叛，先后曾两次要亲征（第二次在吴三桂称帝时），采取了擒贼擒王的方针（重点打击吴三桂，而对耿、尚则以先不撤徙、后加抚谕、最后收拾的策略处之），剿抚结合、起用大批汉族将领（如赵良栋等），终于力挽危局，结束了南方分裂混乱的局面，巩固了南部大陆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逐渐把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向了一个新高峰。

二、台湾的回归

康熙元年（1662）6月16日，郑成功感了风寒，还天天强上

① 有人说陈“先死”、“不食而死”，也有人说她早已因色衰失宠而出家。

登将台遥望澎湖列岛。23日，登台望过，回到书房，恭阅太祖祖训，到第三帙，叹道："吾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两手攀面而逝，时年才39岁。


康熙便服像

成功死后，长子郑经嗣立。康熙三年（1664），清军进攻，郑经弃厦门而去台湾。

三藩之乱起，耿精忠向郑经乞援，许以割让漳、泉二州。郑经于是派人来，跟耿军合攻广东。后来，耿精忠食言，郑、耿间又以兵戎相见。精忠听说朝廷不再强迫自己撤藩，又恐受到清军和郑军的夹击，康熙十四年（1675），便派儿子显祚向清军献出吴三桂给他的"总统"印，投了降。但是，郑经却仍占驻厦门，并在汀州、邵武及沿海一带，纠集旧部，反对清朝。郑经此时所为，客观上配合了三藩之乱，已不符合人民要求安定的愿望了。

康熙十八年（1679），正当清朝集中全力对付湖南、广西的叛军时，郑经却叫刘国轩围攻海澄，消灭了都统穆赫林等率领的三万清军，乘势攻下漳平、长泰、同安等地，进围漳州、泉州。只是在清军破了岳州，调来水师，并招降了他的大批官兵，攻取厦门之后，郑经才于康熙十九年（1680）


巡台御使巡视台湾图卷

退回台湾，但仍派刘国轩守着澎湖。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死，一些臣小袭杀了他的长子郑克壂，把12岁的郑克塽扶上台，侍卫冯锡范专权，人心不服。这一情况，使已经平定了三藩之乱的清朝下定了统一台湾的决心，复了施琅福建水师提督之职，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叫他率领水师。

施琅是福建晋江县人、初为郑芝龙部的左冲锋。顺治三年（1646）与芝龙同降清朝，为清朝打过广东的南明肇庆政权。后被郑成功所俘，为成功打过漳浦、云霄、诏安等地，是清军的一个劲敌。顺治八年（1651），其部一个军校犯了军令，当斩，成功劝阻，他坚决不听，成功很不满意，他于是第二次投降清朝。成功杀了他的父亲，使他更坚决地反郑了。清朝很信任他，起初任命他做知县，后来又叫他当总兵。康熙元年（1662），朝廷还提拔他做福建的水师提督、左都督加级靖海将军、内大臣。他不但熟悉台湾水道，而且作战勇敢、态度坚决。

康熙二十一年（1682）8月，彗星现，户部尚书梁清标吓坏，建议朝廷缓征台湾，施琅力主可征，朝廷才同意。

据守澎湖的刘国轩，眼见台湾政治大不如前，预感前景不佳，乃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6月，派黄学上书康熙皇帝，请求像朝鲜那样入贡。玄烨说："你们是中国人，不得跟朝鲜比，赶快悔罪归诚才是出路！"刘国轩不听，继续坚持分裂。7月，施琅请得战舰三百、水师二万，决定进攻澎湖，然后直捣台湾。朝廷对他表示极大的信任，允许他独自率兵出发。

施琅挥军直捣澎湖，攻克了花屿、猫屿和草屿，乘南风进泊八罩。刘国轩早在澎湖沿岸构筑了坚固的土垒、土墙，还设置了大炮，亲率军兵二万泊于牛心湾，又别屯军兵一万于鸡笼屿以为犄角之势。施琅初战不胜，就派蓝理为前锋又战。刘国轩命曾遂率军大战蓝理，自晨至午，胜负未分，曾遂发炮击中蓝理，蓝理腹破肠出，倒而复立，大吼："蓝理在，曾遂死矣！"军威大振，曾遂战舰被击沉两艘，溃败回岸。夜里，海风大作，清舰被刮飘散，刘国

轩挥兵围攻，施琅亲督大舰冲围，不料敌箭射中了他的眼睛，有个叫曹伤的大个子军士上前扶救包扎，鲜血还是从手帕外渗出。但施琅仍是坚持指挥，冲破敌围，斩杀敌兵三千，拿下了虎井等屿。



施　琅

接着，施琅决定分三路进兵：50舰进攻西边的牛心湾，50舰攻击东边的鸡笼屿、四角山，自督战舰八队56艘，并以战舰80艘继后，直冲敌军中路。每路又各分三队，各自为战，从太阳出来的时候激战到夕阳西下时分，终于焚、毁敌舰100百来艘，攻下澎湖。刘国轩逃回台湾。

施琅乘胜麾军直入鹿儿岛。12天后，海潮大涨，施琅又麾军登岸。冯锡范、刘国轩挟郑克塽薙发迎降，缴上了“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这一天，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10月8日。

康熙皇帝闻捷，赋诗贺功，并封施琅为靖海侯。施琅上书辞爵，只要求赏给花翎顶戴。康熙破例地同意了。

施琅攻下台湾，并不报成功的杀父之仇，却上疏求封克塽等人。康熙皇帝封郑克塽为公，刘国轩、冯锡范为伯，均隶上三旗。施琅还含恤茹痛，捐弃杀父之仇，严禁杀人。他说：“我这样做，是以国事为重，不敢私顾呵！”

台湾回归后，有人主张迁其人、弃其地，施琅坚决反对，上书说：台湾关乎四省要害，不加强管理，不仅不利于统一安定，而且还可能导致外国侵略者乘隙复踞。康熙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置台湾府，设诸罗、台湾、凤山三县（后将诸罗南部分为彰化县），属福建布政使管辖，澎湖则设了厅。

台湾的收复，使清朝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加强了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间的联系。台湾及其所属的澎湖列岛、钓鱼岛等一百多个大小岛屿，和舟山群岛以及海南岛所属的南沙、西沙等群岛，构成了守卫祖国海疆的海上长城，也成为祖国和太平洋地区各国、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各国经济、文化友好往来的桥梁。

三、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

康熙皇帝亲政后，就留意于抗俄斗争，三藩乱平、台湾回归后，又怎能不集中全力来驱逐侵略者！

原来，正当清朝全力攻打明朝，中国国内很乱的时候，俄国侵略者却闯进了满族的故乡、清朝的祖宗发祥地之一——黑龙江流域。

不甘屈服的黑龙江各族人民，始终对沙俄侵略者进行着英勇的反抗。清政府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从顺治九年（1652）到康熙皇帝亲政之前，规模较大的也有七次[①]之多。这些战斗，虽曾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并使其渐在黑龙江下游敛迹，但却未能剪除雅克萨和尼布楚的盘踞者，他们的捣乱仍很猖狂。

为了彻底驱逐侵略者，康熙皇帝进行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工作。康熙十年（1671）、康熙二十一年（1682），他两次巡幸东北。第二次东巡后，即派郎谈等以打猎为名，对雅克萨的俄军进行侦察，随后派萨布素等在额苏里和新、旧瑷珲驻兵、屯田，康熙二十二年（1683）10月，又命萨布素为驻守黑龙江等地将军。他还派遣大员到吉林督造战舰和运粮船，开辟由辽河、松花江到黑龙江的水陆联合运输线，开设从吉林到瑷珲、从墨尔根（今嫩江）到雅克萨的驿站，筹措大军需用的军粮和牛羊等。

---

① 1652年的乌扎拉之战，1654年的松花江之战，1655年的呼玛尔之战，1657年的尚坚乌黑之战，1658年的松花江口之战，1659年的古法坛之战和1664年的黑喇苏密之战。



雅克萨战役油画

康熙二十四年（1685）6月20日，郎谈、萨布素等率领的大军，开到雅克萨附近。22日，派俄俘进城晓谕，盘踞雅克萨的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还是不肯撤走，清军才于24日夜里，对雅克萨进行了包围：东南是战船，城南是步兵，城北是红衣大炮，城东城西是神威将军大炮，城上游则埋伏了骑兵和藤牌兵。

盘踞在尼布楚的侵略者，派了100名援军，坐了木筏乘流而下，前来增援，銮仪使侯林兴珠立即率领藤牌兵截击。藤牌兵们一个个脱了衣服，跳入水中，头上举着藤牌，手里拎着砍刀，潜到筏边，见人就砍，俄军顿时就被砍死30多人，还被活捉了十多个。而这藤牌，无论双层或单层的，里面都夹着或贴着丝绵，俄军的火枪打不透，因此，只得惊呼着"大帽鞑子来啦"，逃回尼布楚去。

被围在雅克萨的托尔布津，强迫军役人员、商人、猎人"出击"，也被清军击败。

6月26日黎明，清军的大炮开始轰击了。炮弹，轻的每颗十来斤沉，重的每颗重十六七斤，威力很大，顿时打得敌人塔楼、城堡、教堂、钟楼、店铺和粮库全都起火，头三天就损失了100多人。有两个神父，一个叫叶尔莫根，一个叫伊凡诺夫，最初曾鼓动俄军反击，现在，反倒带头鼓动托尔布津出城投降了。

7月6日，在雅克萨盘踞了40多年的俄国侵略者，终于打着白旗向清军投降！7月14日，托尔布津稽颡而去。中国的第一次

雅克萨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

然而，托尔布津回到尼布楚后的第5天，即7月25日，却又派了70个兵卒来雅克萨侦察。13天后，盘踞尼布楚的俄军头目闻报清军已撤、庄稼无恙，又打发托尔布津和拜顿重来侵占雅克萨。托尔布津和拜顿带了671人（后增至826人），五门铜炮、三门铁炮以及大批枪支弹药，在被清军摧毁的城堡稍下面一点的地方又重筑了一座“设有全套防御工事”的城堡。

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他们强种了粮食，还窜扰了呼玛河及其支流，袭击了清军一支由40人组成的侦察队，打死了其中的30人。

7月17日，清军被迫再次包围雅克萨，晓谕托尔布津撤走。托尔布津不但不撤，反而首先开炮遥击清军，连续四次出城，与清军打了四天四夜。清军把他们杀回城中，炮兵又进行了还击。托尔布津在塔楼指挥，被清军一炮打断左腿，四天后，死掉了。拜顿指挥俄军反冲锋，也被击退。俄军与清军一交手，就死了130多人；而到12月，城中就只剩下150人，而且不少是得了败血症的，能站岗放哨者不过45人了。拜顿本人也受了伤，他向尼布楚报告：“目前，我和哥萨克们生活在恶臭的横尸当中，大人，……即使现在允许安葬，也已无人筹划此事。”

康熙二十六年（1687）5月，拜顿已经只能拄着拐杖蹒跚了，而他手下，也只剩下66个患着马腺疫、败血症的士兵。但是，在清军进行的第二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眼看就要取得全胜的去年11月，沙俄政府就派了信使乞解雅克萨之围，并表示俄国愿意和谈，因此，12月10日，清军就已解围，等候中俄大使谈判。

康熙二十七年（1688）4月，俄国请求在色楞格河附近的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谈判，5月30日，清朝的代表团即出发，途因噶尔丹的叛乱、交通受阻而返回。

康熙二十八年（1689）6月，俄国请求在尼布楚谈判，7月31日，中国使团便已全部到达，而俄使8月18日才姗姗来齐。8月

22 日谈判开始，但由于俄方一再无理纠缠，所以，直到 9 月 7 日下午 6 时，中俄间第一个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才诞生。

条约规定：外兴安岭以南、格尔毕齐河（在东经 119 度处流入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至海的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以后再议；凡一二人越界捕猎或盗窃，立即械系、送回本国处罚，凡数十人结伙，持械越界、杀人劫掠者，捕拿送回本国，处以死刑；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过界往来贸易互市；订约以前的逃人不必遣返，订约以后，两国不收逋逃。

《尼布楚条约》的内容，曾用满文、汉文、蒙文、俄文和拉丁文五种文字，刻成了界碑。两边的界碑，耸立在格尔毕齐河东岸和外兴安岭的南麓；东边的界碑，耸立在乌第河与土古尔河之间的运输线上。在额尔古纳河口的石壁上，也镌刻过五种文字的碑文。

尼布楚谈判，中国让出了尼布楚地区。《尼布楚条约》，保证了中俄东段边境一百六七十年的和平，对中俄两国都有好处。而黑龙江将军之设，加强了中央对黑龙江地区的管辖，初步奠定了后来行省的规模。

四、噶尔丹之死

准噶尔原叫绰罗斯。明末，该部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时强大起来。因此，和硕特部便迁到青海、西藏一带；崇祯三年（1630 年，天聪四年），土尔扈特部移居到伏尔加河流域去了。

浑台吉一死，儿子们就开始争位，在西藏当喇嘛的小儿子噶尔丹，听说哥哥被杀，赶回伊犁，杀了嗣位的索诺木阿拉布坦，于康熙十年（1671）自立为汗。三藩之乱时，他挑动与联合西藏上层集团夹击和硕特部；派兵征服南疆的维吾尔族，每年强征六七万两纹银的贡赋；并多次通使俄国，寻求靠山，以便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漠北蒙古去。三藩之乱被平定后，他在俄国侵略者的指使下，于


噶尔丹

康熙二十七年（1688）居然越过杭爱山脉，突袭了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父子，掠夺了活佛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的财产，使外蒙同胞“死者相枕”、“逃亡死绝”，并堵塞了朝廷赴楚库柏兴谈判的使团的去路。康熙二十八年（1689），他驻兵克鲁伦河，时窥漠南。康熙二十九年（1690）7月，他越过呼伦湖，掠夺内蒙乌珠穆沁部，在乌尔会河还袭击了尚书阿尔尼率领的蒙古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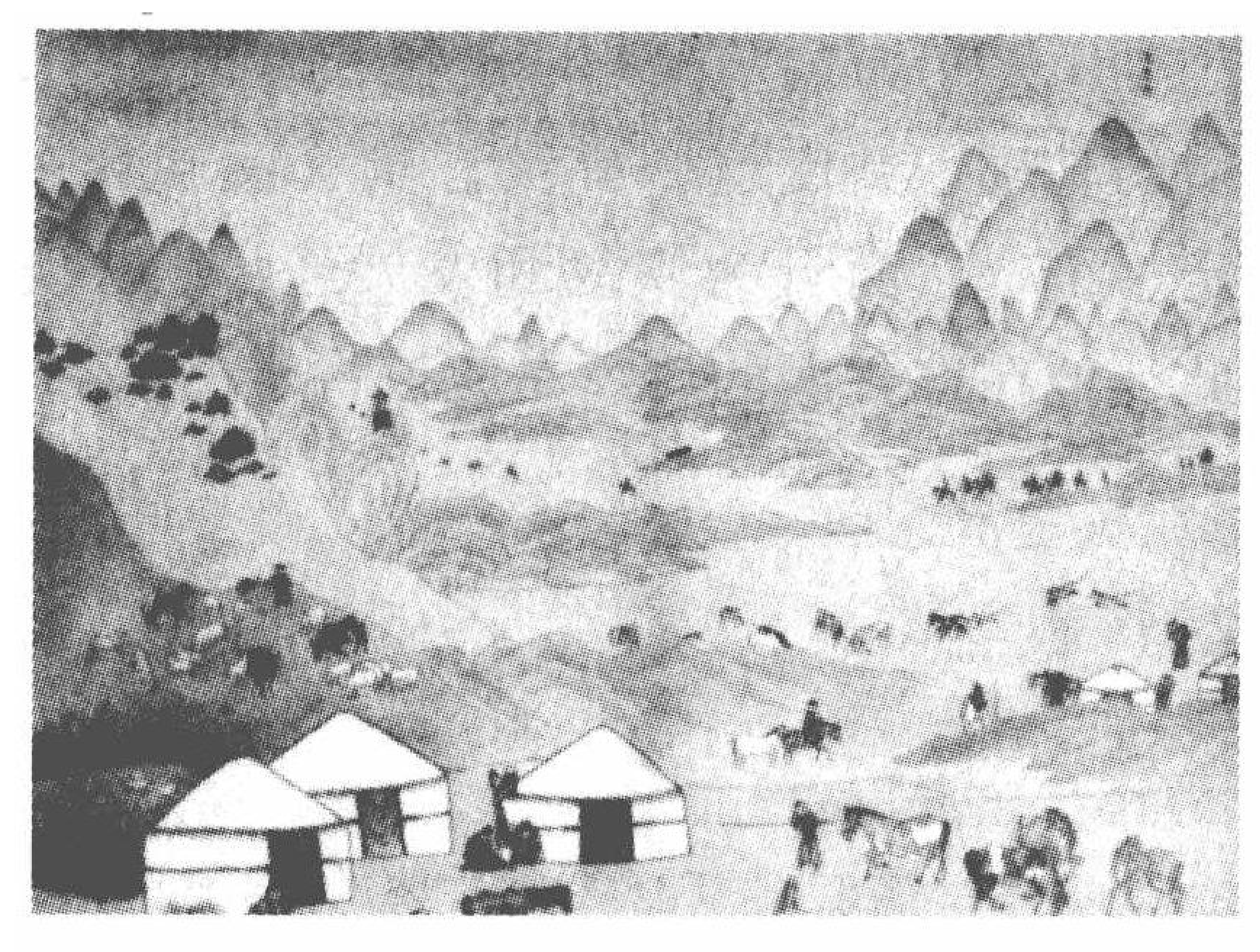
为使喀尔喀同胞返回故土，实现边境地区的安定、统一，康熙皇帝屡谕噶尔丹敛兵，不行，乃于八月举行亲征：福全一路出古北口、常宁一路出喜峰口、亲率一路至博洛河。噶尔丹打败福全，从乌珠穆沁部地渡过西喇木伦河突进至乌兰布通[①]，将兵数万列阵于山下，依林阻水，又把骆驼捆倒在地，驼背放置木箱，箱上蒙了湿毡，环列军外，构成“驼城”，命士卒躲在箱缝后发箭放铳。康熙皇帝一面叫杰书进驻归化一带堵住噶尔丹的归路，一面令大军隔河列阵，与噶尔丹相向而峙。9月3日下午二时许，清军火器猛轰“驼城”。黄昏时，敌阵被截断为二，清军步、骑齐发，争先夺入，那骆驼死的死、伤的伤，不死不伤的又因绑着跑不动，反成了噶尔丹军逃跑的障碍！噶尔丹大败，翻过大碛山，逃到科布多，只剩下几千人。要不是他先叫了一个喇嘛前来假装乞降，缓了追兵，先走六天，恐怕连这几千人也剩不下。

科布多是新疆通往外蒙的咽喉要地，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噶尔丹待在这里养精蓄锐，妄图东山再起。康熙三十年（1691），他

① 有人说是今赤峰，也有人说是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南境离赤峰二百多华里的大红山。

以进贡为名，派两千人南扰；康熙三十三年（1694），他杀害了朝廷派往伊犁的使臣，并煽动内蒙一些部落加入叛乱。康熙三十四年（1695），玄烨密令科尔沁部佯为内应，诱噶尔丹南下。10 月，噶尔丹果然出扰克鲁伦河北域，声言借俄国鸟枪兵六万要大肆南攻。康熙皇帝抓住战机，举行了第二次亲征：命萨布素率黑龙江兵出其东、费扬古调陕甘兵出其西、自率中路军合力进击。

康熙三十五年（1696）4 月，中路军北上，5 月，到达科图。途中，东、西两路大军尚未到达，又风闻俄军援叛，大学士伊桑阿劝康熙皇帝回銮，康熙皇帝却说“捣其巢穴”“方为万年之计”，毅然奋进，终于6 月初进抵克鲁伦河边。噶尔丹起初还想偷渡克鲁伦河伏击清军，后见清军阵势雄壮威严，吓得连夜西逃。康熙皇帝亲率前锋追了三天，到拖诺山而返。噶尔丹狂奔五昼夜，逃到特勒克济。而费扬古率领的西路清军，却提前到达了昭莫多。昭莫多，在土拉河上流东岸，也叫东库伦，北为肯特山、南是土纳岭、西有汗山，林木苍莽，形势险要，素为古战场，明成祖曾在此大败阿鲁台。费扬古在离此三十来里之地布下伏兵：亲率步、骑列阵于小山之东，孙思克率绿营兵列阵于中部的山顶，其余士卒则沿土拉河西岸列阵。噶尔丹西来，费扬古叫前锋统领硕岱领兵四百逆战，佯为败退。噶尔丹不知是计，引了万余骑向西杀来，其妻阿努，身披铜甲、腰挂弓箭亦在军中。他们直扑过来，要夺正面山顶，孙思克部抵死还击。两军从下午一时酣战到七时，费扬古才一声令下，伏兵于是尽起，一部直扑噶尔丹中军，一部沿河直捣其妇幼、驼畜、辎重，顿时使



厄鲁特蒙古图

噶尔丹不能首尾相顾，其妻也中炮身亡。噶尔丹率众北逃，清军又追杀三十多里。噶尔丹身边只剩下几十个骑兵，而其牛羊二十多万头也被清军缴获。

昭莫多战后，噶尔丹还继续作乱。因此，康熙皇帝又进行了第三次亲征。康熙三十六年（1697），他再渡黄河，进抵宁夏，命萨布素会同赞扬古等深入进剿。噶尔丹势单力孤，派儿子到哈密征粮，儿子被回族老百姓逮住；他想逃向伊犁，却听说该地已为其侄策旺阿拉布坦所占，并伏兵于阿尔泰山间，要捉他献功；他想投奔西藏，去路已被清军所截；而早先一直想跟他结成“俄国——厄鲁特联盟”，以利用他来扩大自己侵略的俄国，现在就更怕赔本，不敢跟他勾搭了。5月3日，噶尔丹便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急病死去[①]。

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噶尔丹，粉碎了俄国策反、侵略的阴谋，发展了祖国统一的大好形势，把外蒙三十旗和内蒙四十旗牢固地置于清朝中央的管辖之下，并结束了阿尔泰山以东、恰南图以南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晚年，他还粉碎了策旺阿拉布坦重新发动的叛乱，派兵镇守了西藏和乌鲁木齐，进一步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康熙皇帝内平分裂、外反侵略的斗争，不仅奠定了清代中国疆域的基础，并使这一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安定、统一，而且为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他在这方面的功绩是应该肯定的。

---

① 旧说他服毒自杀，近有人考证他因穷愁潦倒急病而死。

第五章　清初的经济和文化

一、“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清朝的统治，是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因此，清朝一入关，就在支持汉族地主“复业”的同时，特别注重给满洲贵族圈占土地。

朝廷派出的旗官、旗兵，骑在马上，扯了户部发的绳索，把大批“无主荒地”和有主良田圈占起来，作为官田。上自皇帝，下至八旗兵丁，各都领有一片，强招汉人或从关外庄田上迁来的庄丁代种，自己则坐吃租息。

皇室圈占的，叫做“皇庄”或“内务府官庄”；宗室圈占的，叫做“王庄”或“宗室庄田”；驻在京畿各州、县的八旗官兵圈占的，叫做“八旗庄田”，各地驻防八旗官兵圈占的，则叫“驻防庄田”。

清朝入关后，圈占土地的浪潮有三个高峰：

第一个高峰是顺治元年到三年（1644—1646），主要在京城附近三百里以内圈占；

第二个高峰是顺治四年到十年（1647—1653），向外扩圈；

第三个高峰是鳌拜专权时的康熙三年到八年（1664—1669），这期间，已经扩圈到五百里以内了。

三次圈地高潮中，清朝为满洲贵族和八旗兵丁圈占的土地，共有 159 215 顷 46 亩[①]之多。宝坻县的民田，99. 1% 都被圈占了。

---

① 也有人说一共圈占了 166 790 多顷，总之，数量是不小的。

圈地运动，给广大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不是流离失所、饿死在道上，就是被拨到离家乡很远的盐碱不毛之地上耕作。被迫沦为庄客的，压迫和剥削也使他们死去活来。

由于明清之际，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加上清军入关后的烧杀镇压，山东“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湖广地区也是“城无完堞，市遍蓬蒿”；号称膏腴的四川，顺治时期的耕地还不及明朝万历时期的1/13；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地区，在清朝政府“迁海”政策下，也是“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流离四方”。

赋税是供养政府的姆奶。田赋因为农业生产不景气，清初总是入不敷出。

财政的奇绌和各地人民的斗争，使康熙皇帝不得不收敛和改变这些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措施、政策。

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过去下诏停止圈地的基础上，康熙皇帝下令“自后永不许圈”，基本上结束了已绵延40多年的圈地运动。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大批官僚、勋戚、土豪劣绅被镇压，原来被他们霸占的土地，大部分又重新转归农民所有。清朝政府把这种土地改名为“更名田”。有的官僚向康熙皇帝建议：更名田政府应酌价变卖。康熙皇帝不许，叫耕种者继续耕种，他人不得认产。这种更名田，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七省，就有166 600多顷！

康熙十年（1671），康熙皇帝下令再订《劝垦章程》，奖励官、民垦荒。官吏的升迁任免，和垦荒情况有很大关系。朝廷规定：贡监生员，组织垦荒20顷以上的，就授予县丞、百总之官；垦荒100顷以上的，分别授予知县、守备之官。云南总督赵廷臣，督垦了6 000顷以上，即被加了一级，调到中央，升为尚书，还加封为少保。荒地，只要是老百姓开垦了，原主就不得再要，政府就发给

垦荒者印信，永准他为业。起科年限也延长了：原定三年收税，康熙十二年（1673）改为6年，康熙十三年（1674）改为十年，康熙十八年（1679）又改为6年。康熙皇帝自己，除了不断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接见官吏每问年景收成之外，还亲种御稻、亲题耕织图诗。对边疆少数民族地方，他又派出部员，作为督垦大臣，指导耕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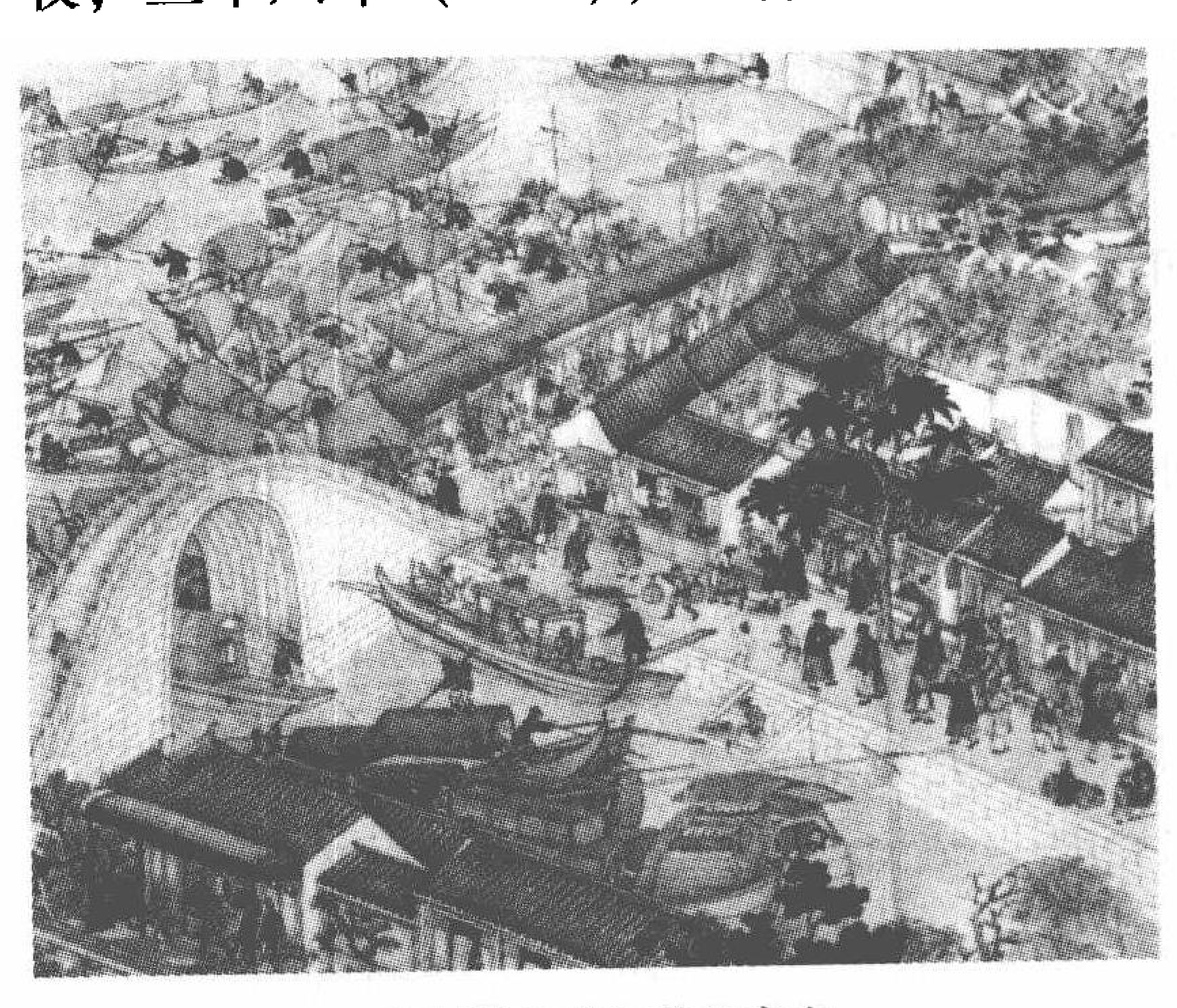
康熙皇帝对兴修水利工程非常重视，即位之后，就把治河等工作写出来，张贴在宫中的柱上。康熙十六年到五十七年（1677—1708），他坚持了对黄河、淮河和运河的修理，减轻了河患、涸出了良田，使"淮、黄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康熙五十二年（1713），浑河（改名"永定河"）的疏浚工程也完成了，旧河两岸的"斥卤变为膏腴"。

康熙皇帝比较注意节约。明朝光禄寺年用银百万两，康熙时年用只10万两，末年时，月用银更不超过4 000两，少的时候，只用六七百两；康熙皇帝还自称：宫中36年总费用，还不及明朝宫中一年所用的数目。明朝工部年用银200万两，康熙时年用也只二三十万两，而且谕令户部、工部，所用钱粮，必须每十天报告一次。

康熙皇帝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注意一定程度地减轻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即位不久，他就革除了明末的饷、派，后来又令重编《赋役全书》，删除田赋尾数，还先后在全国各省共免钱粮545次，康熙五十年（1711）开始，三年内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蠲免，免了地银840多万两，丁银120多万两，并免了历年旧欠54万余两。漕粮的蠲免，前代没有先例，康熙皇帝却也下令将河南、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和山东的，依次各免一年。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民除了向政府交纳田赋之外，还要交纳丁税银（人头税）。明朝万历期间的改革家张居正，曾搞过所谓"一条鞭"法，想把丁税银挪向地亩一并征收，但没能彻底实行。因此，顺治初年以来，还是五年一审人口，照例单收人丁税银。农

民也就照样交了田赋田租，还得另交人丁税。可怜无地的农民，有的只好卖了妻子儿女来偿丁负，自己则沦为乞丐，有的则不得不弃耕而逃，因此，土地又荒芜起来。不逃走的，也只得隐瞒丁数。康熙皇帝为了进一步招徕人民垦荒，并且弄清人口实数，所以，在康熙十一年（1672），将浙江的故钞银（丁税的一种）摊入田赋中征收；三十六年（1697），又将浙江、湖北、山东的匠班银摊入田亩征收。五十一年（1712），康熙皇帝见“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后，便进一步宣布：今后只以去年的 2 462 万人丁、235 万余两丁银为定额，统统摊入田赋中征收，不再多征、另征人头税；凡是去年以来、从今而后增加的人丁，永远不再征收人丁税。这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五年（1716），先在广东试行：将广东全省丁税，统统归入田赋，每田赋一两，带征丁银一钱六厘四毫左右。卖地之人，不交丁银，买地之人，带交丁银。这样，无地的市民、佃民，不交丁银；纳丁银的人，也不再服徭役；而隐匿人口或逃亡的人口数，因此就大大减少了。这种政策，虽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并未免除丁银，但却为最终免除数千年的丁税，打下了基础，不仅促进了原来无地而交不起丁银、被迫逃亡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来，而且还为工商业的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苏州繁忙的怀胥桥商市

康熙皇帝的这些做法，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要求。人民辛勤的劳动，使清初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康熙六十一年（1722），比康熙元年（1662），全国耕地面积，增加了 3 595 000

多顷，许多地主的隐田、官田和一些边疆省分的屯田，还不包括在内。康熙后期，国库存银始终在 5 000 万两以上，国库存粮也始终有数千万石，弄得京城附近仓库装都装不下。通州的西仓、中仓和南仓，共 376 廒，每廒三至六间，每间宽一丈四尺、长五丈三尺、高一丈五尺；京中海运八仓，清河本裕一仓，共 562 廒，都装得满满的，不能再装了，因此，漕粮只好截储在苏杭、镇江、江宁、淮安、安庆等地。而海运、本裕等仓，存有 8 835 800 多石粮食，有的因存放时间过长，都变了质，只能用作肥田的肥料了！

二、"利商便民"

——清初手工业和商业的复苏和发展

清朝入关，战战兢兢，只怕农民再像明末时一样揭竿而起，推翻自己的统治，因此，在军事上实行着残酷镇压的同时，政治上比较保守，对一切可能撼动封建秩序的新事物，都认为"不宜开端"，经济上着重于"以农事为首务"，对明朝中、后期已经逐渐发育起来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不维护，甚至加以严重地摧残。加之明末以来的战乱，清初以来的屠杀，工商业也就变成了一个烂摊子。江阴、昆山、吴江、松江、嘉定、扬州、苏州，人口锐减，工商业一片萧条。17 万人口的江阴，只剩下 53 人；丝织中心的苏州，六门紧闭，城中死者相枕藉；棉织中心的松江等镇，布号纷纷歇业；成都的织锦业"锦坊焚尽"，饶州的制瓷业也"一蹶不振"了。所余一点可怜的工商业，在强索贱卖、关卡林立之下，实在是艰难竭蹶。清初的税收虽不算重（买牲口，银一两才税三分；买田、房，银每两也才收三分税；开当铺的，每年才纳税银五两；京中行、铺，每年最少的只纳二两半），但因关卡林立，工商业者就有输纳之苦、过桥之苦、过所之苦、开江之苦、关津之苦、口岸之苦，而官吏又因有多征受奖的规定，于是任意苛索，因此，商人们更是"不苦于关，而苦于关外之关；不苦于税，而苦于税外之

税"。钱、斗的标准不一，外贸也几乎陷于停顿。

康熙皇帝即位以后，虽然也不断高喊"为君之道，要在安静"、"致治之道，无过法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类的口号，但也认识到"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主张凡事要"因时制宜"。所以，为了保证税收，他又提出了要"恤商"、"利商便民"。他反对官吏任意苛索勒取，禁止关津口岸杂税，取消他们溢额晋级的规定，宣布"不亏行户"是整饬吏治的标准之一，规定扰害商人的首要分子要按光棍例治罪。安徽全椒县知县，克扣杂货铺、布铺、酒铺、猪肉铺五十九两七分银子，被流放到宁古塔；浒墅关（江苏吴县西北）监督桑额私封"便民桥"征税溢额，受到严处。他停止了各州县市镇的房号银，并将主张重征的恭顺侯吴维华下刑部议处。他禁止官吏封借商船运兵作战，却允许漕船携带商人、货物。康熙五十四年（1715），江苏巡抚张伯行，苛刻富商，康熙皇帝把他训斥了一顿，说：他们的家资都是从贸易积聚而来，干嘛要苛刻他们！

为了便"民"利商，康熙皇帝下令统一了制钱的重量（顺治时不断变化：先是一文钱重一钱，后改为一钱二分、一钱二分五厘、一钱四分等），规定每钱约重一钱，一串值银一两。他废除了金石、金斗、关东斗，规定每省一律用底面平准的升斗，并亲自观测校准标准的铁升、铁斛。他还规定标准，秤以十六两为一斤，戥以十三号砝码为准。台湾回归后，他撤销了迁海令，开放了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广州、宁波、漳州、云台山）为口岸进行海外贸易。有的官员曾经反对，他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过去虽然严禁，那些私自出海贸易的又何尝停止过！凡是主张海外贸易不行的，都是总督、巡抚自己想捞油水！"他甚至还允许商人买卖火药，军器。这样，漂洋过海出去贸易的人就很不少，天津的郑尔端、蒋应科就是最有名的外贸大商；而福建的额课，一半竟靠了发洋货船征收而得；康熙二十三年（1684），广东就有了十三行，掌握外销货物之事。有个叫屈大均的清人，曾在一首竹枝词里描写过

广东外贸的盛况：

>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①]开向二洋。
> 五丝八丝[②]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而厦门，竟有一种商人团体，排斥皇商，独占了对外贸易！

清初严禁采矿，康熙十四年（1675）起，放宽了限制。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川一碗水地方，有一万人偷采，地方官要驱逐，康熙皇帝不许。有个叫王纲明的商人也雇人采矿，地方官想取缔，康熙皇帝不但说"姑免禁止"，不许豪强霸占，而且提出"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的口号，来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地方生事。因此，矿业有了发展。康熙元年（1662），全国只有五个厂矿，到康熙最后的20年里，仅云南就有铜矿场、坊18处，工人70万到200万人之多。

纺织业方面，康熙皇帝取消了机户不得拥有织机百张以上的限制，提倡"有力者畅所欲为"。因此，苏州城内外有了踹坊300多家，踹匠不下万余，而广州的丝织水平已堪与苏杭竞秀，苏州、佛山的棉织水平，也足能和松江媲美。广州丝织，有线纱、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等名目，苏州的程益美号则"一年销布百万匹"，"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康熙三十四年（1695），松江府上海县，一次就售出青蓝布三十万匹；而松江的"飞花布"、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也被誉为"天下第一"。康熙年间，南京、苏州的丝织业中，还出现了清代最进步的经营方式——账房：拥有大量资金、织机、原料的账房，把原料、织机分给小机户，机户把原料送染坊染色，交络工络丝，织成绸缎后送账房成批出售，有时账房本身也设机督织，因

---

① 出货口。
② 广东丝缎。

此，它不仅成了组织机户生产的大包买商，而且还是大手工场主。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推动了制糖业的发展。台湾糖厂，不仅有独自单营的“家廍”、蔗农合办的“牛犇廍”，而且还有几家业主合股开办的“公司”。康熙年间，台湾各厂，年产蔗糖二三百万石。

无论在糖厂，还是在纺织厂中，分工都精细起来。糖厂中，有糖师、火工、车工、驭牛工、剥工、看牛工之别；纺织厂中，也有掉工、摇工、刷工、率工、打边工、织工之分。不同工种的人，应雇时还有不同的地点。苏州：缎工立于花桥，纱工立于广化寺桥，摇丝的车匠立于濂溪坊。吴江：以日趁雇的不同工种的工人，则分别在长春、泰安诸桥等候。

陶瓷业，不但在康熙时有了恢复，而且有了较大的发展。景德镇商贩毕集，工匠人佚不下十余万。素三彩是此时的创造，传到同治时（1862—1874）的品种仍有五十余种之多，诸如盖碗、帽筒、笔筒，都是前代所没有的。瓷胎的白度，已达到现代瓷器的技术水平。那柳叶瓶（俗称美人肩），长颈瘦肩、丰胸敛腹，宛如一个个亭亭玉立的美人。用高达摄氏 1 310 度的高温烧成的彩盘中，那桃花片（俗称美人醉），有的泪濛濛粉红中密集深红的斑点；有的一部分深红，周围渐渐晕散为淡红；有的深红之外，又呈黄、绿；有的则深绿、浅绿之中，却泛出不同的红晕。五彩中文以粉彩、珐琅彩为独到：粉彩光泽柔和、画面如生、立体感强；珐琅彩瓷器，壁薄如蛋壳。五彩瓷器上，有缤纷的花卉、蹁跹的飞蝶；布壮丽的山川日月，有耐人寻味的神话故事；也有人马奔腾的战斗姿容，以及耕织渔猎的欢乐场面。……

康熙时期的统一、安定和工商业的恢复、繁荣，不仅涌现出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南京、广州、佛山、厦门、汉口、无锡、镇江、扬州、淮阴等，而且南京、广州、佛山的丝织业已与苏、杭齐名，苏州、佛山的棉织业也与松江媲美。全国许多市镇普遍存在着木作、铜作、铁作、漆作、磨坊、油坊、酒坊、机坊、纸坊、糖

厂等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作坊，仅福建瓯宁一地的制茶作坊就有上千个；苏州的造船业，私营也远胜过官营，官、私造船量，一年即达千余艘。

不过，康熙皇帝毕竟只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不可能跳出封建经济的藩篱，因此康熙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仅远不如封建经济的强大，而且带有强烈的封建特色（大作坊多由官办、官督，产品也多由官销；许多大商人又兼为官僚大地主，如徐乾学在无锡即有田万顷，高士奇在平湖县即有田四千顷，等等），并时时受着把头、白赖和封建行会的勒索、限制，因此，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只算是在一些部门有一些小的复苏和发展。

三、《明夷待访录》

——清初进步学者的活动与思想

黄宗羲（1605—1695）、顾炎武（1613—1682）和王夫之（1619—1692）三人，号称清初三大思想家，代表了清初思想的主流。



黄宗羲

黄宗羲，浙江余姚人，被人们称为“梨洲先生”。《明夷待访录》是他最杰出的代表作，也是清初中国最进步的思想结晶。全书21篇，《原君》开头，《奄官》结尾，其中有《原臣》、《原法》、《学校》等篇。“明夷”是《易经》中的一个卦名，意思是“明入地中”，象征太阳落山的黄昏时刻。太阳是落山了，但西天却红云仍在、光芒犹射，而且明天太阳还会升起。他用“明夷”暗示明朝虽亡，其政尚在，其史长存，其兴可待。“明夷”也代表

个人的不幸，但又暗示他的学说还有用，等着人们来采访。

《明夷待访录》中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君权，透彻地发挥了民主思想。《原君》篇说："上古时代人民为主、君为客，君是人民的公仆；后世君却为主、人民反倒为客，于是，天下就不得安宁了！君夺天下之时，屠戮生民，离散夫妇，毫不动心，只求一人产业的获得，公然说，我替子孙创万世帝王的大业；得了天下之后，更敲剥天下人民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家庭，供一己的淫乐，又公然讲，这是我产业的花息。这样看来：天下唯一的大害就是君，如果没有君，人民就会各得其安居乐业了。因此，天下人怨恨君是应该的，把君看作寇仇、称为独夫，是合理的！"君是大害，只为自己一姓，臣子们怎么办？《原臣》篇接着说："臣子们应该为天下人民，不要为君；为亿万姓，而不要为一姓！"因为"天下的治乱，不在一姓的兴亡，而在万民的忧乐。"为了限制君权，黄宗羲又主张立法。《原法》篇说："如今所谓法者，不过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应该废一家之法、立天下之法，天下之法非常重要，"有治法而后才能有治人"。《学校》篇更公开提出：君认为的"是"，未必真"是"；君认为"非"的，未必真"非"；"是"、"非"应该由人民公议，首先应由学校公议，学校应成为舆论和监督的机关。这一整套反君权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是很大胆、很了不起的。

《明夷待访录》，还对社会经济问题，提出了进步的主张。《田制·二》里主张均田（全国田地先按每户五十亩的原则，优先分给农民，剩下的再让地主任意占有）。《财计·一、二》里，则主张废金银、行制钱，并一反世儒"重本抑末"的理论，发出了"工、商都是民生之本"的时代新声，代表了进步工商业者的要求。

黄宗羲的著作很多，一共有好几十种。《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中国学术史专著的开端，《明儒学案》还是中国第一部哲学史。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时人称之为“亭林先生”。他一心朴实做学问，两袖清风度年华，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写出了《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书。他不轻信古人，总是博采异说相互比证而求出比较真实可信的说法，这种严谨的学风，使他成为后来的“乾嘉考据学派”的开山大师。他的《音学五书》，一共写了30年，五易其稿，三次手抄，更是清代音韵学的开端。在《日知录》里，他尖锐地反对明儒的夸夸其谈，说他们“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导致了“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因此，他主张学问要“经世致用”，文章要“明道、纪政事、察民隐”，“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那些关于怪力乱神的无稽之谈，多写一篇，就是多贻一害！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尽括民生利弊、经济、制度、山川形势、物产风俗，实用价值非常大。



顾炎武

最可贵的，还是他的民主思想。他反对君主的专制。他明确地指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不行，而应该实行众治。在《日知录》里，他还强调：“保天下者，匹夫之贱者有责焉耳矣。”他又认为：治乱的关键，不在于君主一人，而只在于广大人民的人心和风俗。

明末清初第三大思想家是王夫之。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也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以惊人的毅力，写了《张子正蒙注》、《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100多种、400多卷的书。王夫之也反对君主专制。《噩梦》开头就说：“土地不是帝王所得而私有。人民生在土


王夫之

地上，用自己的力耕自己的田，土地分明是耕者所有。”《读通鉴论》中还指出：如果不是“以一人疑天下”、“以一人私天下”，明朝就不会亡，汉族的统治地位就一定会巩固无忧。

和黄宗羲、顾炎武一样，他批判了明代王守仁、宋代陆九渊的“心学”。但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他说得比黄、顾更唯物。他批判了陆、王的“心外无物”，也批判了程、朱的“理在气先”，提出“气”（物质）是独立的客观存在，认为“理在气中”，离开了“气”，便谈不上“理”，而且，他还认为：这“气”是在不断变化之中。根据这种观点，他更驳斥了“五行相克”的说法。他说：金克木，然则水就不能将木渍朽，火就不能将木烧毁么？木克土，可是土也可以腐蚀掉树根！土克水，水不也会滔滔而下，冲垮堤坝么？水克火，然而火不但会把水烧干，而且即使把火置入水中，水也会被炙热成汤哩！火克金，不过，火炀金流，金并没遭到损害呀！所以，五行相克，都是“戏论”，“不是穷究物理之人所应相信的”！再说，把世上一切物资都拿来比拟，更是属于“玩戏之至”！“天地并不是一块印板，万物并不是从印板上刷出！”由此可见：五行不能尽释复杂的自然万物。“天下的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故只有随着时间的变化来具体分析，才能使自己的看法不失其正啊！”

王夫之的这种看法，可说是集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大成，而且，还有一些辩证的观点。他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唯物主义思想的高峰。

四、"至人无我"

——清初的文学风貌

清初的学者提倡实践精神，清初的文学家也大抵如此。长洲（江苏吴县）有个徐增，说金圣叹是"至人无我"。这"至人无我"四字，也可以代表清初主要的小说家、戏剧家的思想和创作。

金圣叹（1606？—1661）也是长洲人，是清初杰出的文艺批评家。他评点过《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和《西厢记》，并称赞它们为"六才子书"。尤其是评点《西厢记》和《水浒》，明快如火、辛辣如吏，笔如跃、句如舞，批判僧尼的逃避现实，讥讪士大夫的丧失节气，称赞武松的正直敢为，讴歌施耐庵的分明爱憎。他主张批评小说，首先要弄清作者的写作动机，站在作者的写作高度来检验其客观后果。在小说的写作与欣赏上，他总结出许许多多的技巧和方法，如《西厢记》中有"烘云托月法"、"移堂就树法"、"月渡回廊法"等等，《水浒》中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欲合故纵法"等等。他是个文艺批评家，但他却不高踞于人民大众之外，而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接近各种不同的人，从他们的身上吸取丰富的营养和巨大的力量。徐增说，金圣叹有一种崇高的忘我精神：遇上酒人，他能"曼卿轰饮"；遇上诗人，他能"摩诘沉吟"；遇上剑客，他能"猿公舞跃"；遇上棋手，他能"鸠摩布算"。碰见道士，他"鹤气冲天"；碰见和尚，他"莲花绕座"；碰见辩士，他"珠玉随风"；碰见静人，他又可以"木讷终日"。跟老人一起，他能够"婆娑起舞"；跟小孩一起，他又能"啼笑宛然"！金圣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如果自己能再活 20 年，那么，他就能再批几十本书。批写的时候，手腕似乎都脱臼了。这也可见他的勤奋。顺治十八年（1661）8 月 7 日，他被清朝统治者处死于江宁的三山街，原因是

他也参加了旨在反抗吴县县令任惟初对人民的敲诈勒索而进行的哭庙活动，并写了“哭庙”之文。这更说明：清初的文学家，敢于面对现实，敢于替大众说话。

清初还有一个著名小说家叫蒲松龄（1640—1715），是山东淄川人，著有《聊斋文集》，不仅谈论学术，而且谈论时务。他的小说《聊斋志异》，表面上谈的妖狐鬼怪，文字中也宣扬了一些因果报应、忠孝节义的封建糟粕，但是，却委婉曲折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败，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肯定了纯真的爱情，同情了人民的不幸。《席方平》等篇，把清初官吏的贪婪情况，生动地暴露出来；《林四娘》、《公孙九娘》等篇，则表达了作者对明朝的怀念，对清朝的厌恶。《聊斋志异》一共431篇，每篇文字，长短不拘，《娃曲》一篇最短，才60字。它继承了历代志怪、传奇等文言小说的传统，集了它们的大成，合了唐、宋传奇之详与汉、魏、六朝志怪之简。《聊斋志异》赋予了那些妖狐鬼怪以真实的人情味，甚至使广大读者，几乎忘掉了它们是“异类”。后来的纪昀，写的《阅微草堂笔记》，也是受的《聊斋志异》的影响。蒲松龄71岁才成为贡生，以前一直“屡试不中”，在农村里教书，接触农民。他写《聊斋志异》，不仅源于村中广大农民的流传故事，而且，还向外地的朋友书信求索、往来接听。这也可见，清初作家们不脱离实际、不脱离人民的风格。

清初最活跃的文艺创作，是诗歌和戏曲。戏曲方面，元时的杂剧虽然此时已成了余响，但作者仍相当地多，其中以洪昇（1645—1704）和孔尚任（1648—1718）为最有名。

洪昇是浙江钱塘人，写过不少传奇戏，如《回龙院》、《回文锦》等，但曲、文皆美的，还数《长生殿》。《长生殿》初名《沉香亭》、《舞霓裳》。洪昇写它，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三易其稿。《长生殿》叙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共五十出。开场一出，作者通过《满江红》一词，宣布写的是“真心到底”、“精诚不散，终成连理”、“感金石、回天地、昭日月、垂青史”的爱情

故事。全戏从定情、密誓、埋玉，一直写到月宫团圆，从生写到死，从人间写到天上，从悲写到喜。词曲清丽凄切，人物栩栩如生。《长生殿》一上演，就博得了观众们的热烈赞赏，“酒社歌楼，非此剧不演”、“缠头为之增价”。康熙二十八年，就连顺治皇后的忌日（死日），某家也演此戏，结果，观者、作者，统统得了个“大不敬”的罪名。看戏的赵执信、查慎行等被除籍、罢官。洪昇本人从此终生不遇，康熙四十三年（1704）过乌镇，喝醉了酒，失足落水而死。

与洪昇同时，山东曲阜的孔尚任（孔子六十四代孙），居然敢写“现代戏”。他听自己族人方训说：南明福王时，名妓李香君见国破家亡，以面血溅扇，有个叫杨龙友的，就将此血在扇上点成桃花。于是，他就将此事情节扩大发展，编出剧本《桃花扇》来。《桃花扇》以浓艳哀伤的词、曲，描写了江南名士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暴露了南明福王小朝廷中政治的腐败、官僚间的倾轧、马阮集团的可恶，揭露了他们监禁爱国者、迫害无辜的罪恶，歌颂了史可法的耿耿孤忠。对李香君的姿容、才艺、理想、爱国精神的描写，实质上是对广大下层人民的讴歌。对南明小朝廷腐败情况的揭露，揭示了它失败、灭亡的原因。而剧的末出，作者更借苏昆生之口，唱出了明朝遗子悠悠不尽的亡国之痛和广大人民对于山河残破的无限惋惜之情。那词有：

“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楼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藁。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诗，和南明福王政权的灭亡曲，在作者龙飞凤舞的笔下，融合为一了。

五、洋人也当官

——清初自然科学的发展

16世纪末叶，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向资本主义迈步，而古老的中国，却仍在封建社会里蹒跚。中国自然科学的某些部门，逐渐落在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后面，因此，西方的一些传教士，便开始以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历学、医学等为媒介，力图在中国打入传教的楔子。

带着西方先进科学来传教的第一个人，是明神宗时的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利玛窦为了传教，穿了佛衣，学了汉语，还跟中国官员一起，译述了《几何原本》、《乾坤体义》和《测量法义》等书。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死，第二年，跟他一起受到明神宗皇帝礼遇的庞迪我和熊三拔，被允许参与修历，这是明朝政府第一次允许外国人帮助政府修历。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精于历法的最早国家之一，但是，明朝的《大统历》，是承袭元朝的《授时历》而来的，已用了二百多年没作大的改动，节气误差已经很大。明朝大臣徐光启比较开明，是一贯主张学习西方历法的长处的。这样，许多传教士都想以修历为手段，博得朝廷的好感和传教的方便。有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在天启末年跑到北京，在宣武门内的首善书院，竟开设了历局，制造历具、翻译历书。徐光启知道后，就荐举他到政府的历局编历、造具，崇祯皇帝想请他大干一番，不料明朝垮了台。

清朝一入关，汤若望毛遂自荐，向清廷献上浑天星球、地平、日晷、望远镜等仪器，9月1日，还当着朝臣准确地测验了日食。汤若望的科学知识，博得了朝廷的赏识，他于是第一个当上了中国

钦天监的监正官，不久，又取得了太常寺少卿、通议大夫、通玄教师加通政使以及光禄大夫的封号和官爵。

一个洋教士，在中国当大官、受隆宠，盲目排外、夜郎自大的朝臣当然不舒服。顺治皇帝时期，吴明炫诬告汤若望，顺治皇帝没予理睬；可是，顺治皇帝死后，鳌拜专权时期，思想守旧的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又告汤若望等人编的时宪书上写“依西洋新法”，是叫中国人奉西洋正朔，说：新法有错误、不准确，即使准确，也不容许洋人鼾睡于大清国的卧榻之旁，他们洋人是借历法藏身于金门，刺探朝廷机密；他们挥金是收买人心，挟大清之人尽叛清而从邪教；他们只造二百年历，是想使大清国祚不得无疆；他们仪器精，兵械也精，适足为大清国的隐患；他们在澳门搞了几万兵马，要夺大清朝江山……杨光先还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南怀仁像

杨光先的守旧思想，正好符合鳌拜复旧、打击异己、加强专权的愿望，鳌拜等便对73岁的汤若望等洋人和其他中国钦天监官员，进行了75天的审讯和审查，冤杀了历科、春、秋、冬、中官正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克显、刘有泰等人，多亏康熙皇帝的奶奶孝庄太皇太后的反对，汤若望等洋人，才免于凌迟、流徙，仅仅是被罢了官。

汤若望下台不久，杨光先和吴明烜（吴明炫之弟），分别闹了个监正、监副的官衔。可是，两人以《大统术》治历，错误屡出。

康熙皇帝亲政后，决定通过实际测验，比较新、旧历法的优劣。他多次召集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汤的助手）等洋人，跟杨

光先、吴明烜等讨论和测验，认定了新法的准确。鳌拜集团一倒台，康熙皇帝就给汤若望等人平了反，复用了“时宪历”，恢复了汤若望“通微（避“玄烨”讳）教师”的封号，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监正。从此，钦天监不仅用西洋人，而且累进为监副、监正，直到道光皇帝时，始终络绎不绝。

三藩之乱时，南怀仁为清政府造了大小铁炮120门，轻便神武炮320门，还写了造炮、造铳的技术书《神武图说》，康熙皇帝封他为工部侍郎。

康熙皇帝对于只要不犯法度而又精通科技的西洋人，都积极加以信用。他本人对天算学有一定的造诣，但也向汤若望、南怀仁请教算学，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学习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初等几何学》和《应用几何学》，学习天文、地理、生理解剖等科学。他聘请南怀仁等参与制定《永年历》、编纂《历象考成》等书，聘请白晋等绘制除新疆以外的全国地图《总图和分省地图》《皇舆全览图》，聘请西人教授天文、勾股等学，使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到清朝而中西荟萃、遂集大成。康熙皇帝还多次派人到外国去招聘科学家，也曾授意教士致书罗马教皇，要求派医生到中国来。由于罗马教皇两次派人干涉中国内部生活，康熙皇帝才坚决进行抵制，最后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流传。

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的开明政策，使自然科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自然科学界也闪烁出一批灿烂的群星。

清初最著名的历算学家是王锡阐（1628—1682）和梅文鼎（1633—1721）。王锡阐是江苏吴江人，他兼通中、西之学，对两家异说都能条其原委、考其得失，加之每逢夜色晴霁，总是爬上屋顶仰观星象，经常通宵不寐，因而日积月累、学问愈深，写出《晓庵新法》六卷，第一卷讲勾股割圆理论，后五卷讲推步、七政、交食、凌犯之术，对日食、月食以及金星过日（太白食日）的推算十分精确，对太阳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亮问题的论证方法已接近现代天文学水平，他还第一个提出了日食、月食的初亏和复

圆方位角的科学算法。然而，被人夸为清朝“算学第一”的，却是安徽宣城的梅文鼎。梅文鼎废寝忘餐40年，著书80余种。《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的专著，对西洋历、回回历和我国古代各种历法，都作了系统的考证、研究。梅文鼎治学踏实刻苦，攻书务求明白，求师不怕路远。为了弄清九九加减术，他遍查古籍，又研究西学，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为了搞通历法，从授时历一直溯源到三统历、四分历，并融贯了中、西的历法理论。他对西方新的科学理论，不抱门户偏见，说：“礼可求诸野，官可问诸郯，学问岂可因为是从西方来的就抛弃吗！”他虚怀若谷，又慷慨无私，只要有人发问，他总是把自己的最新见解详告。他说：“只要这门学问能发扬光大，使古人的绝妙之学不致失传，我死且无憾，哪里想到一己的扬名！”他把元代宋世杰《四元宝鉴》中的“垛积术”（高级等差级数）加以科学的整理，创出新解，接近了近代数学水平；他和李锐一起，对汉代赵君卿的勾股弦图，进行了重新深入的研究，创出了新证法，名为“青朱出入图”，完成了中国数学中的“演段法”（圆内接正十边形一边的平方，与圆内按正六边形一边的平方和，等于圆内接正五边形一边的平方）。康熙四十四年（1705）5月11日到13日，康熙皇帝接连三天召见梅文鼎，赐扇、赐食外，还赐了“积学参微”的御书。梅文鼎也确实攀上了清代数学的高峰。

《广群芳谱》的作者汪灏等人和《补农书》的作者张履祥，是清初农业、园艺科学方面的突出代表；我国历史上真正可以连作的最早的双季稻——“御稻种”（即《红楼梦》里的“御田胭脂米”、“红稻米”）的培育者是康熙皇帝。清初最大的水利学家是陈潢和靳辅，由张霭生编成的《陈潢河防述言》，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水利学的发展水平。靳辅曾长期任职河道总督，陈潢则是靳辅的幕客和高参。他们发展了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提出筑堤束水和引河放水要交相使用的理论，还发明了以河水的横断面积乘水的流速来计算流量的科学的测水法，

都大大丰富了我国的水利学。而康熙四十三年、五十六年（1704、1717），康熙皇帝两次派人探测河源的结果，肯定了元朝人的“河出星宿海”之说，澄清了古人的“河出昆仑”说和“潜源重发”说的错误，发现黄河发源于星宿海以西的阿尔坦河，已经接近现在探明的河源地了。

清初还有一位全才的科学家，他不但抱有经世的大略，对象纬、勾股、战阵、河渠之学都有研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他造过运输机械，也造过装有发条的机器人。但是最重要的，他造出了“机关枪”（连珠铳）和“榴弹炮”（冲天炮）。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名叫戴梓。戴梓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总结了旧铳（包括西洋火铳）的利弊而创制的“连珠铳”，状若琵琶，有两个扳机。扳动第一个扳机，火药和子弹自动落入铳腔时，第二个扳机开始动作，如此循环不止，可以连射子弹28粒。“冲天炮”，体长只有二尺一寸，重才三百来斤，炮弹如瓜，每颗重二三十斤，弹中有穴，可装炸药，发射时还可调节射程的远近。此炮被康熙封为“威远将军”，在昭莫多之战中，费扬古大战噶尔丹，只用三炮就轰垮了敌营。然而，由于戴梓在参与修撰《律吕正义》（乐理书）时与南怀仁意见相左，又由于在造“冲天炮”中，南怀仁一年未造出，戴只八天即造成了，因此，深遭南怀仁的嫉恨和诬陷，被康熙皇帝流放到辽东，备受“夜拥败絮冷、晨踏冰腹空”的困苦，被赦时竟死于归途。

第二编　清朝的鼎盛

（1723—1806）

第六章　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内空前的统一

一、改土归流

——西南地区统治的加强

康熙六十一年（1722）12月21日，玄烨死，28日，其第四子、45岁的胤禛即位，这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像

胤禛在藩邸时，走路不踩别人的头影，迈步不踏地上的虫蚁，很是斯文；做了皇帝，做事却大刀阔斧，颇有点利刀斩乱麻的气势。上台不久，他就粉碎了“皇八子党”的篡权野心，将这个宗派的头目、康熙皇帝的第八子允禩和这个宗派的骨干、康熙皇帝的第九子允禟等囚禁起来，并将与他们有关和拥功擅权的大臣年羹尧、隆科多分别治罪，从而牢固地掌握了朝廷大权。为了改正康熙皇帝晚年保守宽怂的缺点，他一上台，还宣布振肃纪纲、修定律

例，从严惩治不法行为。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安定，他还将山西、陕西的“乐户”，浙江绍兴的“惰民”，江南徽州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江苏常熟、昭文的“丐民”，广东的“蜑户”，甚至江西、福建等地的“棚民”，相继开豁为良，宣布改变他们的“贱民”地位，提高他们的社会身份，并把他们编入保甲。为了加强和巩固对于聚居于广西、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少数民族的统治，雍正皇帝更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的政策。

改土归流，就是改土官为流官，废土司为府、州、县。原来，自从上古苗族离开黄河流域，迁往川、桂、滇、黔以后，无论是红苗（衣带红）、黑苗（缠黑布）、青苗（缠青布）、白苗（缠白布），还是花苗（衣褶绣花），都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跟汉族不一样，生产也比汉族落后。因此，虽然秦朝以来，在上述地区已经设置了一些郡县，但却始终采用着官其酋长、随俗而治的办法。总之，在清代以前，各朝政府虽在那里设了一些郡县，还设了流官来佐助土官，同时开通过道路、设置过驿站、立过卫所、兴过屯学、移过汉人。但是，土官（文职）、土司（武职）们，总是世袭其官、世守其土、世长其民、世因其俗的。他们对朝廷，虽也负担一点差徭、贡赋，执行一点安边、守土的任务，然而，朝廷要直接统治当地人民，总是隔着一层障碍。他们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还常劫掠外部、外地或流官地区来的路人、信使，甚至役、卖这些人。他们还借着向朝廷进贡之名，行大刮民财之实。乌蒙地区的土官、土司，进贡一成就刮民百成；他们杀了土民，还叫其亲属向他们缴纳“垫刀费”几十两！因此，明代中叶以后，已有一些地方改任流官，由政府直接统治；清初顺治时，元江也改为流官。康熙初，蒙化也设了流官知府。雍正二年（1724），丽江改“流”，还清查出庄奴、院奴等2 344名。

有个叫鄂尔泰的人把改土归流的工作又推向了高潮。到雍正九年（1731），这项工作初步完成。鄂尔泰一面招抚，一面用兵，缴得土司、土官的无数大印，还缴上来大批的军器。鄂尔泰用兵，一

共杀了四万多人，有的人被“刳肠截脰（dòu，颈）”，有时甚至挂满树上岩巅；一些遭兵之地，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而改土归流以后，上述各省，仍保留了一些土司、土州。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项工作，在客观上有其进步作用：它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完整，加强了中央集权，减少了一些剥削层次，有利于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少数民族区域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除了川、桂、滇、黔的改土归流，雍正还加强了对青海、西藏的控制。

青海，明末以来，为厄鲁特的和硕特部移居。崇祯十六年（1643 年，崇德八年），该部已向清朝朝贡，清朝入关后，又派人到北京进贡；康熙时，还帮助朝廷抗击过噶尔丹和他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对青海、西藏的骚扰，因此，康熙三十七年（1696），朝廷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其余头人，也各封了贝勒、贝子、公等爵。和硕亲王死，子罗卜藏丹津袭爵。罗卜藏丹津很有野心，雍正元年（1723），纠合各部头目会盟察罕陀罗海，煽动他们取消清朝所赐的封号，自称达赖浑台吉，并暗中派人要求策旺阿拉布坦为后援。他以沙拉图为根据地，威胁西宁附近堡驿，一时裹胁 20 多万人，到处抢牛马、杀官军。

雍正皇帝闻讯，立派川陕总督年羹尧、四川提督岳钟琪领兵进剿。年等分兵疏勒河防其内扰，又派兵把守巴塘、里塘一带防其退入西藏，还派兵截断其通准噶尔部的道路，然后猛攻镇南、申中、南川、西川、北川诸堡和郭隆寺、石门寺，叛军溃败，大批走散和投降，但罗卜藏丹津一面放回青海理事大臣、兵部左侍郎常寿，上表请罪，一面却领着十多万人马盘踞在乌兰木和尔（柴达木地区），准备伺机反扑。

雍正二年（1724）2 月，岳钟琪率精兵五千、马队一万，日夜兼程，出其不意地直捣罗卜藏丹津的大本营，大破叛军，歼其八万余人，俘其二万余人（罗卜藏丹津的母亲阿尔泰喀屯及其妹夫克勒克济农藏巴吉查亦被俘）。丹津大困，化装成妇女，乘夜逃奔准

噶尔部去了。四五月间，岳钟琪又率兵二万，歼灭了庄浪卫的叛军，青海平定。

平定了青海，清朝改西宁卫为西宁府，设办事大臣，增兵驻扎，分厄鲁特部和硕特人为二十九旗，对西宁地区的藏人（凡二三百部），则实行土司制，设土官，令地方官管辖。从此，青海被进一步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

西藏方面：康熙二十一年（1682），达赖五世死，握有全藏大权的桑结，支持过噶尔丹的叛乱，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入藏，立噶尔藏嘉穆错为六世达赖。雍正即位之初，拉藏汗的一些旧臣发动叛乱。雍正三年（1725），朝廷派驻藏大臣带四川、陕西兵二千入藏平叛，封平叛有功的后藏首领颇罗鼐为贝子，叫他总理藏事。雍正五年（1727），朝廷留大学士僧格、副都统马拉为驻藏正、副大臣，分驻前、后藏，对西藏地区进一步实行监督和镇抚。

雍正皇帝改土归流、镇抚青藏，使中央对于西南地区的管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二、噶尔丹策零之死

——雍正皇帝对西北的平定

噶尔丹穷愁潦倒，其侄策旺阿拉布坦派人向康熙皇帝表示，愿以兵夹击噶尔丹。噶尔丹死后，策旺攻掠附近诸部，康熙五十六年（1717），攻入西藏拉萨，杀拉藏汗、拘囚达赖喇嘛，西藏大乱。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自打箭炉两路入藏，策旺败归伊犁地区，继续与朝廷作对。

罗卜藏丹津逃到准噶尔部后，朝廷索之，策旺不给。雍正五年（1727），策旺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一面遣使来朝，一面继续收容丹津，并整军秣马、蠢蠢欲动。因此，雍正七年（1729），朝廷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率八旗兵屯阿尔泰山，自北路进）、

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率绿营兵屯巴里坤，自西路进），准备来年平定伊犁。但不久听说：丹津想谋害策零，策零于是想执丹津以献。所以，没有向伊犁进军。

然而，雍正八年（1730）冬，噶尔丹策零却袭击了科舍图卡伦，抢去大批驼马牲畜。次年7月，又派大、小策零敦多布北犯。

大、小策零敦多布两人，领了三万兵马，埋伏在博克托岭，然后派人诈降说：叛军马匹羸弱，而且只有千把人，清军如果进击，一定全胜。傅尔丹听了，信以为真，点了一万人马，立即就要动身。副都统定寿劝他谨慎，他说定寿懦弱；海兰劝他且慢，他骂海兰是“蹈汉儿弱习”；主事何溥扣马谏，他更斥道：“你们这些汉儒，怎么懂得兵事！”并用马鞭子抽何溥的手，扬长而去了。傅尔丹虽是领侍卫内大臣，也长得高大魁梧，但却并没有什么真本事。一天，岳钟琪走进他的帐内，见墙上满挂着刀枪槊矛，问其所以，他竟说：“这都是我平日习用，挂起来以激励部下的！”岳钟琪是康熙时名将岳升龙之子，历任同知、游击、副将、提督、总督，身经百战，足智多谋，听了傅尔丹的话，出来便叹道：“做大将的，不恃谋而恃勇，当不了几天啦！”如今，傅尔丹也没跟岳钟琪商量，匆匆忙忙就出了兵。

7月24日，傅尔丹率队来到和通泊，突然敌笳大作、敌骑四合、万矢如雨。他忙命各军抵御。土默特蒙古兵打着白色军旗冲入敌阵，但科尔沁蒙古兵却扯着红旗首先溃散了。索伦兵见此情景，便喊“白旗兵被围住了！”各部一听，纷纷溃逃。车声、甲仗声彻夜不绝；只满洲兵护着辎重且战且退。但回到科布多，四千人的队伍，却只剩下二千来人。定寿中箭牺牲，海兰被迫自缢，还有十几个将领阵亡。一些被俘的将领，还被牛皮绳穿了小腿，装进皮囊，拴在马后拽走！而傅尔丹，非但不自谴，反而将率先冲入敌阵的白旗兵将领沙津冤杀。于是，将士更无斗志，一直撤退到喀尔喀。傅尔丹不久被革职拟斩。

噶尔丹策零既已得胜，当然就一路东北追来。十月，他命大策

零敦多布驻在苏克阿勒达援应，叫小策零敦多布率六千精骑北进。小策零曾在耳提施河用疑兵之计率军突入俄国侵略军进行肉搏，打败了一万名哥萨克，追击了五百里，可谓一名智勇双全的常胜将军。现在，他领兵来到了山音诺颜。山音诺颜，是清朝皇帝的额驸、土谢图汗属下的部长策凌的辖区。策凌是成吉思汗第四子的21世孙，康熙三十年（1691）曾随母入京，在内廷受过教养，康熙四十五年（1706）被招为额驸后才回到原牧地塔密尔河来；他屡次从征，熟悉山川形势，又善于抚慰士民、训练精兵，游牧行止，也一概按军事部勒属民。现在，他得到小策零入境的消息，立即派部将巴海率六百骑夜闯敌营，引诱敌人追兵，自己则领了大队人马伏于鄂登楚勒的林莽。小策零追来，伏兵尽起，其部下几乎全部被歼，自己也被打下马来，脱了铠甲，跨上一匹白骆驼，才算逃得一命。大策零听说小策零吃了败仗，退回了喀喇沙尔。

鄂登楚勒一仗，稳住了清军的阵脚。但雍正十年（1732），噶尔丹策零又东犯哈密，被岳钟琪部击败后，又率大军北犯。小策零潜至厄得尔河源，探知策凌外出，突袭其帐，捉走策凌两个儿子和一些牲畜。策凌闻讯，割发剪马鬃誓天，随即挥军进剿。

策凌有个护卫叫淖克浑的，能登高张衣如皂雕鼓翼而立，善于疾走侦察敌人详情。策凌根据他的侦察，率兵三万，乘夜绕到察罕多尔山后，黎明时分，大呼而下，敌人酣睡乍醒，顿时大溃。策凌连追二日，连胜十余仗，在喀喇森齐泊再败敌军后，进逼光显寺。

光显寺形势险要。寺左是湍急的鄂尔昆河，寺右是杭爱山脉，寺在河山之间，一径鸟道羊肠。策凌先派人请新任将军锡保前来夹击，锡保未至，策凌军于黄昏时已追及敌人，就向他们发起猛攻。敌人三万人马，被斩或淹死者几及一半。噶尔丹策零从鄂尔昆河逃走，小策零从推河逃走，扔了满路的辎重，还不断放火烧荒，来延缓追兵。

光显寺大捷，使噶尔丹策零从此一蹶不振。策凌则被朝廷晋封为超勇亲王，并赐黄带。策凌也赏侦察有功的淖克浑，淖克浑请王

姬舞剑，自己唱歌道：

> 朔风高，天马号，追兵夜至天骄逃。
> 雪山旁，黑河道，狭途杀贼如杀草。
> 安得北斗为长弓，射陨欃枪入酒钟！

策凌听了更是高兴，将这位王姬和自己的坐骑也赏给他。

雍正十二年（1734），噶尔丹策零又遭到清朝西路军的打击，所以，重新称臣入觐。乾隆皇帝即位后，仍允许他在阿尔泰山西边游牧。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死。不久，罗卜藏丹津被清军活捉。

雍正皇帝对西北地区的用兵，巩固和加强了中央对西北地区的管辖，维护了西北地区的统一、安定。

三、漠北疆界的划定
——《中俄恰克图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保证了中俄东段边境的和平和安宁，但是，条约签订以后不久，沙皇彼得一世亲政，不仅向土耳其开战、向瑞典开战、向波兰开战，争夺从顿河到黑海的通道，打通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抢占西方邻国 54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叫嚷“俄人必于黑龙江口大洋之面建立都府”，并且，在中俄边界的中段，继续攻占和蚕食我蒙古地区，隐匿我北部边境逃人。

因此，康熙皇帝曾令朝臣多次向俄国政府抗议，并提出明确划分中俄中段边界的要求。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皇帝还亲自召见俄国派来要求保持和扩大贸易的特使依兹玛洛夫，指出：中俄中段边界尚未划定，中国多次传书俄国，都没得到答复。第二年，依兹玛洛夫离京回国，康熙皇帝又在致沙皇的国书里，再次提出必

须划定中俄两国在蒙古北面的边界。然而，又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中国政府的要求，仍如石沉大海，杳无回答的音讯，而且发现俄国人插手中国内部事务，诱迫准噶尔部叛乱势力臣服俄国。清朝政府于是向依兹玛洛夫留在北京的代表郎克提出抗议，最后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7 月 12 日，将郎克和由他率领的俄国商队驱逐出境。

雍正三年（1725）1 月，彼得一世害天花病死了，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即位。叶卡捷琳娜一世一上台，便派经商多年而且富于政治、外交经验的萨瓦·乌拉的思拉维赤领了大队人马，以祝贺雍正皇帝登基为名，前来要求恢复贸易、缔结通商条约。但是，叶卡捷琳娜一世给萨瓦·乌拉的思拉维赤颁发的秘密训令里却说：先缔结商约，力求拖延划界；不得已时也可以谈判边界问题，然而，俄国不能从自己已经占领的贝加尔、乌丁斯克（乌的柏兴）、色楞格斯克（楚库柏兴）等地撤出，也不要使矿区、有价值的土地和战略地点让中国收回。叶卡捷琳娜一世还叫萨瓦·乌拉的思拉维赤沿途刺探中国情报、绘制地图，禁止中国政府在准噶尔地区建立城寨，要求在北京建立东正教堂，拒绝全部遣返中国逃人。总之，叶卡捷琳娜一世是想利用“外交”手段恢复旧日的通商关系，继续在对华贸易中牟取高利，并企图使清政府答应给俄国一些特权、使其对我蒙古地区领土的侵占合法化。

萨瓦·乌拉的思拉维赤带了 1 500 人的卫队，总共 2 000 人，在来北京的途中，还频频与噶尔丹策零联系，鼓励他的叛乱，妄图借助叛乱对清朝政府进行要挟；他也多次派人跟法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巴多明联系，叫他每天提供一些关于清朝政府对谈判、平叛和传教士的态度的情报；他更大肆收留中国逃人，南移恰克图和楚库河支流的岗哨，力争在谈判、划界前尽量多占一些中国土地。来到北京之后，他一面以攻为守，反诬中国收留俄国逃人，叫嚣要收复俄国因签订《尼布楚条约》而“丧失”的黑龙江土地，一面却用小恩小惠拉拢大学士马齐，叫他提供情报，包括中国谈判代表的性格

等等。

雍正五年（1727）7月3日，谈判改在离恰克图10俄里[①]的布尔河边进行。清朝派去谈判的首席代表是隆科多。隆科多是雍正皇帝即位时的顾命大臣，又是孝懿皇后父亲佟国维之子，一等公、吏部尚书加太保，雍正皇帝曾御书为“舅舅隆科多”，在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可谓权倾一时。但在处理“大逆”、“僭越”的年羹尧时（隆科多还掌管吏部），他却未革除年羹尧的公爵衔，因此，雍正皇帝很不满意。同时，雍正皇帝也为了防止他妨碍自己集权，所以，此时是把他降职派往边境谈判的，对他并不十分信任。而萨瓦·乌拉的思拉维赤却乘机进一步勾结我准噶尔部逃人、修筑侵略哨所，还把卫队拉上来，准备武力解决。

7月26日，隆科多以私抄玉牒案被撤回囚禁于畅春园，中国方面实际上的首席代表是策凌（当时只是郡王）。策凌和四格、图理琛一起，又跟萨瓦、郎格等谈了一个月零四天，才在8月31日，跟俄使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

《布连斯奇条约》，用满、蒙、俄和拉丁四种文字缮写，规定：以恰克图与鄂尔怀图山之间的第一个鄂博为起点，由此向东，至额尔古纳河，向西，至沙毕纳伊岭，北部给俄国，南部仍属中国。但在具体划勘时，俄国又多划了不少地方。

雍正六年（1728）6月25日，两国使臣在恰克图正式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恰克图条约》有满、俄、拉丁三种文本，它对中俄中段边界作了与《布连斯奇条约》相同的规定，但它重申：乌第河流域仍是待议区。它还规定：恰克图为两国贸易商埠，此外，俄商三年可来北京贸易一次，每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中国允许在北京俄罗斯馆内建造东正教堂，并接受俄国学生来中国学习；双方对逃犯、越境行窃和杀人犯，均须严拿治罪，等等。

《恰克图条约》，使俄国得到了比《尼布楚条约》更多的利益。

---

① 1俄里等于1.06公里。

萨瓦禀奏他的女王时说："（该约）不仅使中国在边境上割让有利之地带，且从未属于俄者，亦获而领有之。"可见在这个条约上，中国是吃了亏的。

但《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并不全面认真执行，它违约私自抽税，包庇罪犯，反诬中国边民偷俄国边民的马匹等等。因此，后来乾隆皇帝曾三次被迫下令闭市。乾隆五十七年（1792），俄国又要出种种花招，跟清政府签订了《恰克图市约》（即《恰克图条约追加条款》），其第五条甚至正式规定：俄人犯罪的审治权归于俄官，这已是后日领事裁判权的开端！

尽管如此，《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毕竟实现了康熙皇帝时未能实现的愿望，明确地划定了中俄边境中段的疆界，遏止了俄国自清初以来对我外蒙北疆的侵略势头，同时也使祖国北部边境的贸易一定程度地活跃起来。内地许多商人纷纷北上，到恰克图一带向俄国商人贩卖烟草、茶叶和绸缎等等，使恰克图这个地区，成了百货云集、市肆喧阗的繁富之区，直到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开海路各港为通商口岸之后，才逐渐衰落下来。

四、军机处的设立与内阁职权的削减

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在集权方面，都颇有成绩。

康熙皇帝为了"乾纲独揽"，他甚至连自己的儿子也有点不大相信。他的大儿子允禔，不是嫡妻所生，当然没被立为太子。康熙十四年（1675），立的是老二允礽。但是，四十七年（1708），康熙皇帝见诸子拘煽，允礽品行不端，恐怕自己得到隋文帝的下场，便废了他，把他关进了咸安宫。第二年，再次立他，但是，五十一年（1712），又一次把他废掉，依旧关押起来，从此，宣布再也不准谈什么立储[①]之事。有个受宠的老臣叫王琰的，密劝康熙皇帝还

① 立储：确定皇帝的继承人。

是立皇太子为好，差一点被杀头。

雍正皇帝即位后，说：明立太子，容易引起太子骄傲；不立，则又不足以“系国本”。为了维系国本，而又杜绝骄傲和朋党，他于是立了一条家法：皇储密建。乾清宫上有块木匾，顺治皇帝写了“正大光明”四字。雍正皇帝即位后，便将皇储的名字写好，藏于密匣，塞在这块匾额后面，又密书密旨一道，藏在内府之中，供将来勘核。

雍正皇帝活了58岁，劳累过度，中风而死①。接着便是乾隆皇帝登基。乾隆皇帝上台后，就焚香告天，发誓“若得在位60年，即当传位于嗣子。”乾隆皇帝一共三次密定储位：前两个太子都先后夭折了，第三个便是第十五子嘉亲王颙琰。1795年，也就是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便于9月宣布明年退位。第二年正月，乾隆皇帝也确实举行了内禅之典，宣布让位给颙琰即嘉庆皇帝了。从此，他自称“十全老人”、“太上皇”。但是，这个大权独揽了六十年的老皇帝，仍自称“朕”；给皇帝的奏疏上“皇帝”二字只高二格，而“太上皇”则高三格；皇帝只称为“万岁”，太上皇却称“万万岁”；乾隆皇帝授予嘉庆皇帝大宝历，但是，每年颁朔仍以乾隆历。事无巨细，颙琰和朝臣们还得向他请示，到底还是他说了算。

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皇帝，不但向儿子要权，而且向臣子要权，把一切大权都统统抓到自己的手里。

努尔哈赤时，设有议政王大臣。一切重大事件，先由王大臣受理（会推立法），再呈报努尔哈赤。因此，大臣们颇为有权。皇太极上台后不久，就设立了“文馆”，他称帝以前一个月，更扩大了文馆的职掌，改为“内三院”（秘书院、宏文院和国史院），分散了王大臣们的部分权力。顺治皇帝晚期，改内三院为内阁，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号称宰辅。鳌拜专权时，虽然恢复了内三院，但是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于康熙九年（1670）9月，又成立了内阁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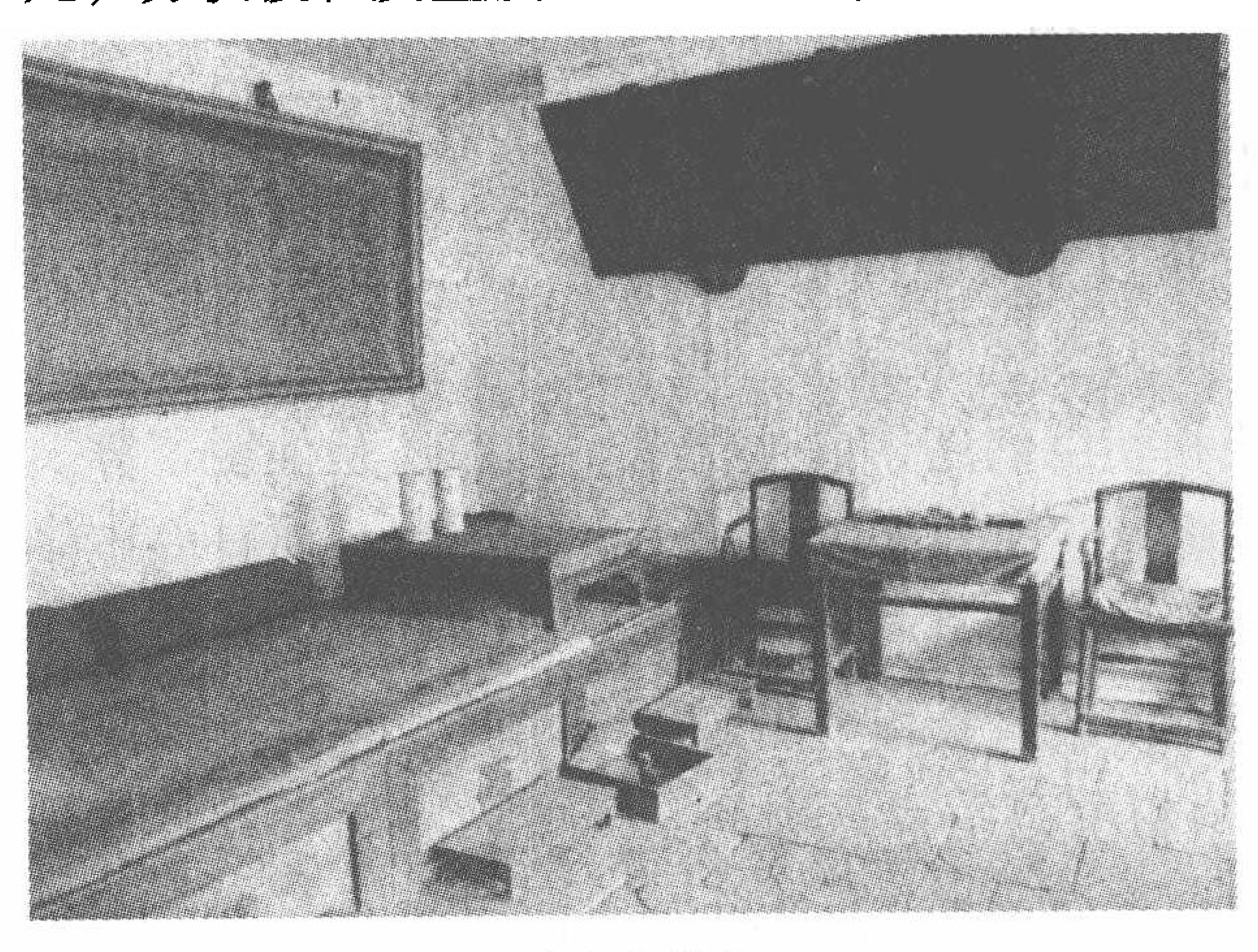
---

① 雍正之死，有种种传说。小说中说他被吕四娘所杀，不可信。

承旨出政，什么题本、公文、仪政、大典，甚至《实录》的编纂，统统都归内阁在皇帝的直接授意下进行，内阁还有权稽查六部。

康熙中期，玄烨又谕令成立南书房，叫几个翰林大学士亲承帝意、拟进谕旨，宰辅们的权力又被缩小不少，皇帝的专制又有一些增大。

雍正皇帝用兵西北之际，由于议政王大臣都是世袭的贵族，没有实际经验，早已不太熟悉军国大事；又由于内阁离街市近，人员又多，往返递奏本章容易泄漏机密，所以，雍正皇帝下令把内阁中三四品以上字迹端正、才思敏捷的大学士，由太和门外的内阁里，调到隆宗门外（后又迁入隆宗门内靠北、乾清门外靠西的地方）来亲承旨意、拟发谕旨。每天早晨五六点钟，至迟也在八点以前，皇帝亲自召见他们，口授旨意，叫他们拟呈转发。忙时，晚上也召见。拟写完毕，先呈皇帝审阅，皇帝认可后，不经内阁，直交兵部捷报处，分快慢程度直接下发。快的，上面写有“马上飞递”四字，还限定每日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的更写有“六百里加紧”的字样，直接把皇帝的声音传达给下面的当事官员。这个特别的秘书班子，初名“军机房”，后来才改名“军机处”。它最初只是内阁的一个分局、一个分支。担任秘书工作的人员，称为“军机大臣”，最初只管军事，后来逐渐也管政治大事。因此，皇帝利用这个机构，不仅亲操军令，而且慢慢地将一切政令也从内阁手中夺了过来。从此，内阁无权参与国家大事，形同虚设。尽管内阁大学士是最高官吏，但若不兼军机大臣，就无实权。而大学士、六部、九



军机处值房

卿、督抚、将军、提统、都镇、学差、主考以及驻外使节的简放，都逐渐由军机大臣开单请旨；皇帝的巡幸、谒陵、驻园，军机大臣也无不跟随。西苑、圆明园以及慈禧以后的颐和园等处，都设有“军机堂”。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等，太监也不能待在旁边。这样一个机构，是绝对君权的有力支柱，对皇帝的绝对集权，实在是大有用处。所以，乾隆皇帝即位时虽然裁撤了它，但是，两年之后，又赶忙将它恢复。至此而后，它一直成为辅佐皇帝亲自行使强权的、设于内廷的常设机构，有清一代，各个帝王都不肯也不想取消它。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皇帝反而把议政王大臣取消了。

军机处的设立和议政王大臣的裁撤，加强了皇帝的专权，打击了旧贵族的专擅，沟通了君臣上下，提高了办事效率。皇帝的一切命令，后来直接由军机处发出（不经兵部捷报处了，称为“廷寄”），下边的公文和密折，也可由军机处直送皇帝的手里。这，较之过去的由内阁和王大臣的层层处理，程序多而慢、上下沟通不畅等，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使大权更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了。军机处的要员，虽然比王大臣、内阁一般大学士，在用人、行政上有更多的奏请之权，但说了算的毕竟只有皇上。军机要员的权限，实质上不过只是依葫芦画瓢而已，他们信守着的口号，只是28个大字：

依样葫芦画不难，葫芦变化有千端。
画成依旧样葫芦，要把葫芦仔细看！

五、地方控制的加强与博学鸿词科

在绝对专制主义集权的皇帝之下，清代的中央机构有内阁（实权在军机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和院寺（都察院、大理

寺、理藩院、翰林院、太仆寺等），分别执行皇帝的命令。在地方，清代则设有行省和特别行政区。省下设道、府（或直隶厅、直隶州）、县（或厅、州）；每省设巡抚（无巡抚，则由总督兼），每一省或数省设总督。总督、巡抚之下，设布政、按察、学政、道员等官。特别行政区分顺天府（京师及近畿），盛京、吉林、黑龙江（满洲发祥地，光绪时改行省），藩部（新疆蒙古西藏）和土司四类。各省（或数省）的总督、巡抚、将军（发祥地等），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驻藏大臣等要员，都是皇帝的心腹、亲信，直接听从皇帝的指挥。州、县以下，乾隆时更加厉行保甲法：不论城乡，每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门上悬挂一牌，上书户主姓名丁数，同时登入官府册籍，厂、窑佣工和佃户，也附于牌甲之末或本户之下，如有反抗事件，一并连坐治罪。总之，控制得非常严密。

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清朝皇帝又将八旗兵分散驻扎在北京、近畿和全国各地。有人统计：畿辅25处，东北44处，新疆8处，内地20处，都有八旗兵驻防。此外，各省还驻有绿营兵（汉族），西藏还设番兵（藏族），黑龙江则还设索伦兵。谁想反抗，就马上会受到无情的镇压。

清朝统治者还集历代刑法的大成，颁布了严酷的刑律。顺治三年（1646），朝廷颁布过《大清律》。乾隆皇帝时，又重修律例，制成了《大清律例》，分律目、名例、刑律、总例、比引等条例凡47卷、226门，《名例》律中载有所谓“十恶”，规定犯了”谋反”、“谋大逆”等罪，任何赦令也不得宽免，连满族权贵也毫不例外。这就更突出地保障了至高无上的皇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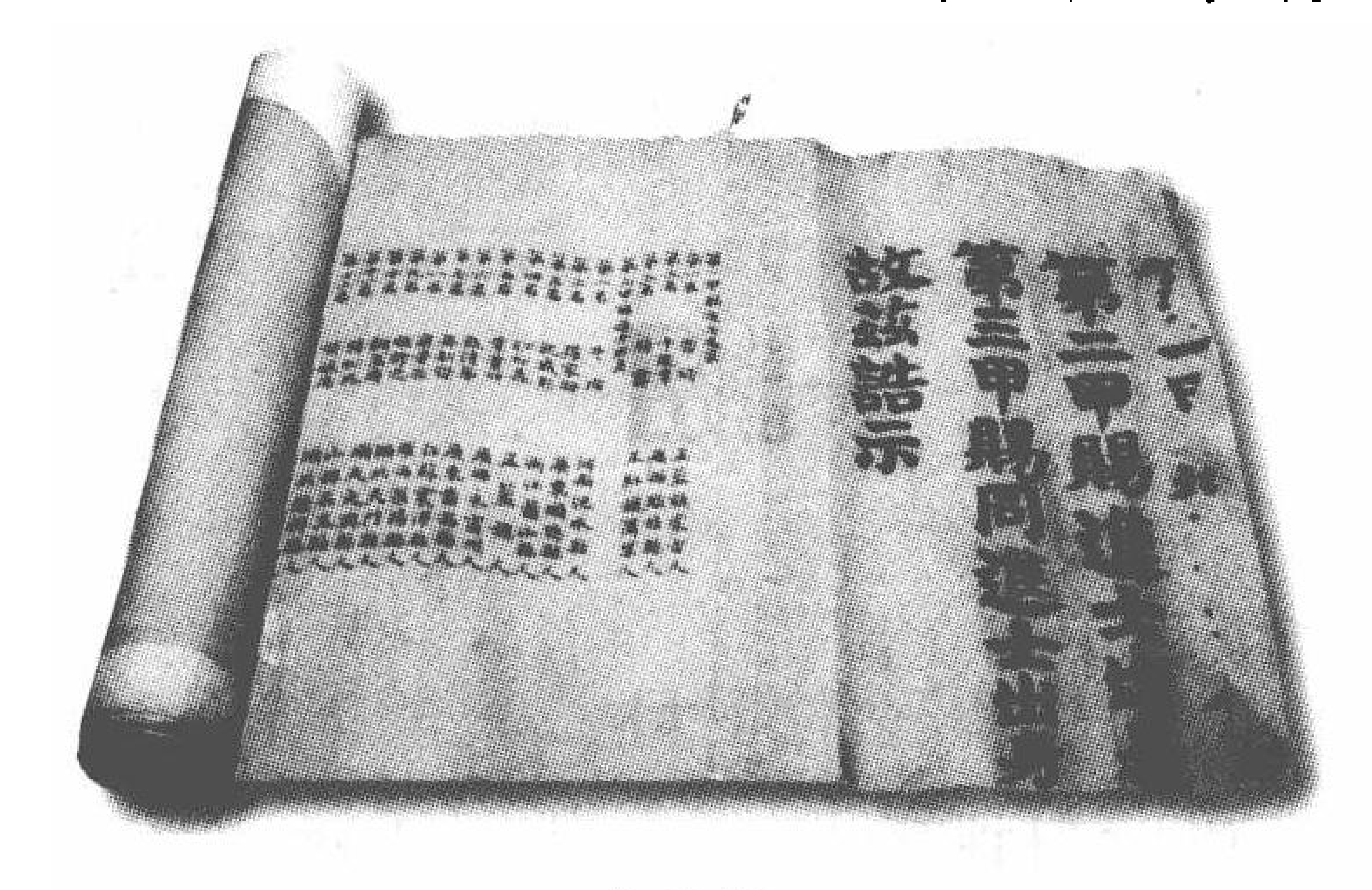
但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都知道知识分子不进考场，讥刺朝政，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因此，他们一方面告诫皇族继承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政策，见了大学士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果这大学士还兼着“师傅”，就称之为“老师”，自称“门生”或“晚生”（这种规矩，一直延续到咸丰皇帝死前）；一方面大搞正规

的科举活动，不断罗致文人士子加入为清朝服务队伍的行列；另一方面，还特开博学鸿词（康熙时叫鸿“儒”，乾隆时改鸿“词”）科，把那些自命遗老或高才、标榜孤忠或写些诗文发泄牢骚的文人，或不屑参加科考而隐居山林却又有些威望的隐士，由大臣或地方官疏荐上来，皇帝直接面试，授给一定的官职，以便使他们就范。

“博学鸿词”科名，唐宣宗的时候已经有了。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又在南方搞过，但都名堂不大。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皇帝下诏说：

>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弘词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几余之暇，留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如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任未任、京内京外，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第二年，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及学政等，一下就荐上来一百八九十人①，由户部赏给月俸，由皇帝赐宴，然后齐集体仁阁考试诗赋，取中一等朱彝尊等 20 人、二等毛奇龄等 30 人，各授了翰林院的官职。考中的这 50 人，自然感激皇恩、春风得意，落榜的百余人，也无面目自命遗老孤忠、讥刺朝政。因此，康熙皇帝这一招，的确对清朝的稳定、皇帝的集权有利。雍正皇帝于是也学着康熙皇帝的样子，于雍正十年（1732）下诏征荐，但还没来得及



大金榜

① 有的书说一百四五十人。

实行，他就于十三年（1735）死了。乾隆皇帝算是清朝第二次开科。乾隆元年（1736）九月，试被荐者176人于保和殿，首场以经解史，次场考诗赋，取中刘纶、齐召南等15人。次年在体仁阁考试，又录取了四人，各自授官有差。乾隆十四年（1749），还通过明经科目的考试，录取了顾栋高等四人，都授予国子监司业的官。顾等因年老，尤其被乾隆皇帝宠眷。顾栋高年老辞官时，乾隆皇帝亲自书写了两首七言诗加以褒美；后来，乾隆皇帝下江南，又亲赐御书，越两级封他为国子监的祭酒官。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皇帝谕曰："儒林是史传所必须写入的，只要是经明学粹的学者，就不必拘泥于他的品级。像顾栋高这一类人，切不可使他们湮没无闻呵！"于是，史馆里特别设立了《儒林传》的名目，来专门编写大知识分子的学术和生平。乾隆皇帝还叫齐召南常侍左右，后来，提拔他做了礼部的侍郎。

康熙、雍正、乾隆等帝，除了在北京招试"在野翰林"外，在巡视外地时，也随时注意搜罗。康熙皇帝南巡江浙，就召试诸生73人。乾隆皇帝下江南，也召录了85人；在巡视山东、天津和五台山时，召录了42人。

六、"十全老人"

——新疆、西藏与四川的进一步统一

乾隆皇帝对于自己的文治，远不如对于自己武功的欣赏。他晚年写诗自诩的是"十全大武扬"，用汉、满、蒙、回四体文字刻碑的是《十全记》，后来还干脆称自己是"十全老人"。

乾隆皇帝的"十全"，就是说他在位期间一共打了十仗，而且十仗都打胜了。按照他的说法，这十仗是：两次平定准噶尔部，一次征服回部，两次征服大、小金川苗族头人，一次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征服缅甸，一次征讨安南，两次降顺廓尔喀。

镇压农民起义、征讨外国，战争自非正义；但是，平准、平回、两征金川，却有利于祖国的进一步统一。

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死，其次子那木扎尔被立为准噶尔部的汗。但不久，那木扎尔的庶兄达尔札却杀汗自立，并想杀掉在雅尔拥有重兵的达瓦齐（大策零之孙）和阿睦尔撒纳（辉特部台吉、策旺阿拉布坦的外孙）。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因此当然不愿坐而待毙，二人起兵攻下伊犁，杀了达尔札，接着做汗的便是达瓦齐。达瓦齐身躯肥胖、面大如盘、腰腹十围，喜欢饮酒食羶，能耐不大，但却不受阿睦尔撒纳的摆布支配，双方意见不合。阿睦尔撒纳击之不成，便于乾隆十九年（1754）跑到热河避暑山庄来见皇帝，被乾隆皇帝封为亲王。而达瓦齐则继续保持分裂割据的状态。于是，乾隆皇帝便决定进击达瓦齐。

乾隆二十年（1755），弘历命班第等为统帅，以阿睦尔撒纳等为向导，领兵 50 000 万，分两路进发。大军会师于博洛塔拉河，达瓦齐拒战不利，加之分裂割据不得人心，部众纷纷出降，只好逃到伊犁西北 180 里的格登鄂拉。清军追至格登山，派阿玉锡等 25 名准噶尔骑兵夜袭达瓦齐营，达瓦齐营大乱，7 000 人迎降，达瓦齐领了 2 000 余人逃走，逃到南疆乌什城时只剩下百余骑，被城主灌醉捆了献给清军，跟达瓦齐同时被擒献的还有以前从青海逃来的叛乱头目罗卜藏丹津。乾隆皇帝的第一次“平准”之战，就这样胜利结束。阿睦尔撒纳也因随军征伐有功，被晋升为“双亲王”，食双亲王俸。

然而，这位双亲王阿睦尔撒纳，却并不满足，他一心想的，是要做厄鲁特四部的汗。因此，战事结束后，乾隆皇帝召他入觐，他故意迁延不来，不但不来，还在 9 月 24 日，交回了朝廷给他的大印，又造起反来。他猛攻留守的清军，迫使班第兵败自刎。

乾隆二十一年（1756）春，策楞率领的清军，将阿睦尔撒纳击败。被击败的阿睦尔撒纳，窜往哈萨克地区，但不久，又折回围攻伊犁，迫使巴里坤办事大臣兆惠撤回巴里坤。清朝大军再次打败

他，他又再次逃往哈萨克地区。不过，这次清军穷追不舍了，哈萨克汗阿布赉也只好答应擒献他，并没收了他的马匹。他见大势已去，不敢在哈萨克地区停留，便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徒步逃入俄国。俄国曾一再表示支持他，无奈清朝政府不断抗议，清朝大兵又不断追击，所以，也始终未敢轻动。势单力孤的阿睦尔撒纳，后来竟因痘疹（天花）死于俄国旷野。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清政府的追索下，俄国被迫将他的尸体送还。

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对准噶尔部分裂势力长达七八十年的战争，打击了沙俄的侵略野心，巩固了西北的边防，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西北边疆的统一，为背井离乡、远奔伏尔加河流域140来年的土尔扈特部的重返家园创造了条件。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们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平了准部，乾隆皇帝接着平定“回部”的叛乱势力。“回部”指的是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地区。这一地区，清初以来，一直受到准部贵族的奴役。康熙三十五年（1696）击败噶尔丹之后，朝廷命回部首领阿布都实特管理南疆，阿布都实特死后，其子玛罕木特继位时，策旺阿拉布坦又袭取了叶尔羌城，囚禁了他，还扣押了他的儿子布那敦、霍集占——大、小“和卓木”[①] 作为人质。乾隆二十年（1755）平准首战告捷后，朝廷派兵护送布那敦南归治回，留霍集占管辖伊犁地区的维吾尔人。不料霍集占竟参与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阿睦尔撒纳兵败逃走，霍集占不但不降，反而逃回南疆与布那敦一起发动了叛乱，把清朝派去的副都统、回部招抚使阿敏图杀了。

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军围攻库车，霍集占乘夜潜出，乾隆皇帝乃命尚书纳木札尔和将军兆惠合剿。兆惠侦知霍集占在叶尔羌城，便只率精骑先进至城东的叶尔羌河畔扎营。叶尔羌河，“回”语叫“喀喇乌苏”，意为“黑水”，所以，兆惠之营被称为

---

① “和卓木”，译言“圣裔”、“教长”，指回教首领。

“黑水营”。河西，叶尔羌城，城周十余里，四面 12 门，隔岸伏有叛军，兆惠兵单力薄，出营初战不利，退回营中，掘壕自守，等待援军。不料纳木札尔等，早已半道阵亡。兆惠军孤守营中，霍集占等乃筑长堤围困，并掘黑水上游以水灌之。营中军粮告罄，驼马杀光，营内、外树上和栅上，也被击满了铅弹。霍集占就这样围困了兆惠军三个月。直到第二年 2 月，富德率领的清军逼近时，兆惠军才拼死突围而出，退回阿克苏。

6 月，兆惠和富德汇集了三万大军，从阿克苏分两路再进，拿下了叶尔羌城，霍集占逃走。7 月，清军追至帕米尔高原的伊西洱库河谷，降其 12 000 人，霍集占身边只剩下妻孥旧仆三四百人了。9 月，霍集占和布那敦逃到巴达克山，被山主擒杀。

霍集占等发动的叛乱平息后，乾隆皇帝下令在南疆喀什噶尔驻参赞大臣①，在南疆其他大城驻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并将天山南北合称新疆（全区的最高长官是“总统伊犁等处将军”），而在回部只收1/20的租税。

乾隆皇帝不仅结束了西北边疆的分裂混乱局面，而且，还加强了对四川、西藏的统一和管理。

大渡河上游有两条支流：一条源出松潘一带，较大；一条源出理番一带，较小。两岸万山丛矗，多产金，故被人们称为大、小金川，隋朝还置过金川县。大金川的头目莎罗奔，因随清军入藏平叛有功，曾被雍正皇帝封为金川安抚使。莎罗奔势力渐强，心随权起，就开始攻打周围的土司，朝廷劝谕，他也不听，乾隆十二年（1747），他竟敢打伤官军。乾隆皇帝派兵镇压，前后打了三个年头，最后避碉深入，用老将岳钟琪（莎罗奔入藏时的顶头上司）率十三骑入营招抚劝谕，莎罗奔才在十四年（1749）算是服了。

但是一波刚平，二波又起：乾隆三十六年（1771），小金川的头目僧格桑，又侵扰邻近土司，并与官军开仗。乾隆皇帝于是派大

① 北疆的参赞大臣驻塔尔巴哈台。

兵平定了小金川，但是，僧格桑逃入大金川，大金川的头目莎罗奔却拒不交出，而且二人串通一气，杀了土司官，打败了四川总督阿尔泰率领的军队。乾隆皇帝下令杀了阿尔泰，以尚书桂林作统帅，以大学士温福来督师。



《乾隆平定金山图·收复小金川》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军进攻大金川，抵达木果木。温福虽然看到石碉林立，却不想绕出敌后，也不愿避实击虚，竟也大筑碉堡千余，与叛军对垒，并日与提督董天弼等置酒高会，致使月余无功，连小金川又重新丢了。大、小金川的叛军，一齐猛攻清营，温福被擒，天弼等战死。清军大乱，溃时自相践踏，争渡铁索桥时，人相拥挤，锁崩桥断，落水溺死者以千计。溃至美诺，后军收容犒劳，才稍安定。不料有人用铜盆舀水，不慎失手落地，咣啷一响，大家又惊呼“追兵到了”，再次争逃，不可抵止。

秋天，乾隆皇帝以阿桂为定西将军，重点兵马，第二年才扭转战局。

乾隆四十年（1775）9月9日，清军终于攻破勒乌围，莎罗奔逃到噶尔厓。

乾隆四十一年（1776）1月，清军攻破噶尔厓，莎罗奔再次投降。

平定了大、小金川，乾隆皇帝宣布废除土司，改设州、县，在小金川设美诺厅（后赐名懋功），在大金川设阿尔古厅，都直接归四川省管辖。在勒乌围，则置重兵把守。这就不仅巩固了雍正以来改土归流的成果，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也促进了苗族与汉、满各族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

乾隆中叶，侵入印度的英国殖民者，曾两次派人进入西藏，妄图迫使清朝政府跟它签订不平等的通商条约，不成，就唆使廓尔喀（尼泊尔）封建主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十六年（1791）两

次入侵西藏。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皇帝派福康安（据说是他的私生子，名义上是他妻兄之子）率满、汉、蒙、藏、索伦等各族大军万余人藏反击，将侵略军逐出，维护了祖国的领土主权。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皇帝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进一步地、全面地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

七、逻察与巡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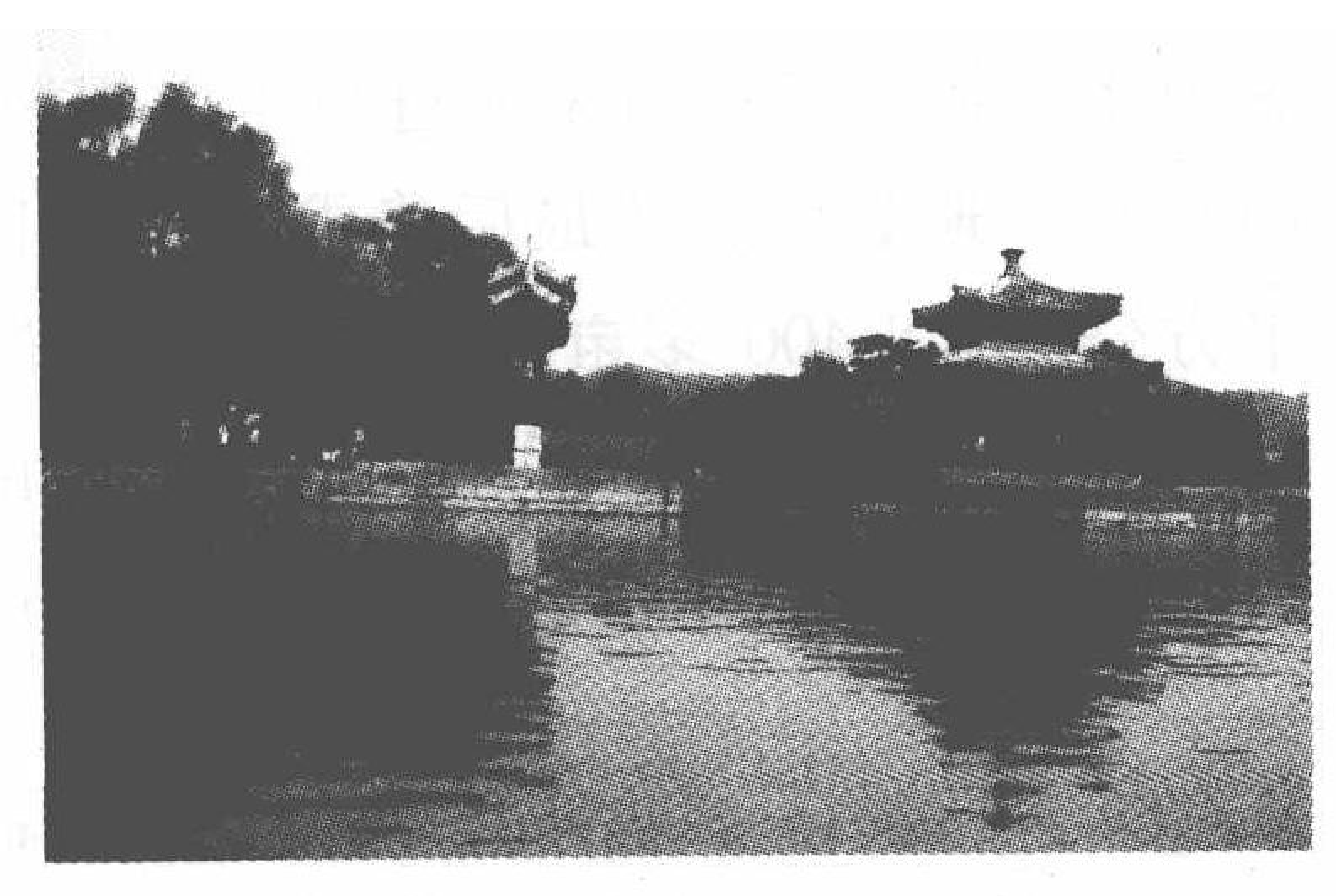
临苑囿而阅武，因行幸而观兵，这是历代帝王加强统治的一种成法。康熙皇帝平了三藩之乱，便把政治注意力转向了北方。为了不忘祖宗骑射的传统，提高满、蒙八旗兵的军事素质和骑射技能，并加强对漠南、漠北和漠西等蒙古三大部的抚绥，康熙皇帝便在第二次出巡口外的那年——康熙二十年（1681），建立了木兰围场。木兰围场东西相距三百里，南北直径近三百里，周长一千余里，总面积约一万多平方公里。自此以后，康熙皇帝几乎年年[①]都来到这里。康熙皇帝一共48次行幸木兰，乾隆皇帝也来到这里好几十次[②]。每次都在这里举行为期20天的大规模的围猎和军事演习活动，蒙古各部以及青海等部的上层人物纷纷前来，并派出大量骑兵、向导、随围枪手、长枪手、打鹿枪手参加。而为了出巡木兰，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开始，到乾隆中期，又在口外修建了十四处行宫。四十二年到四十七年（1703—1708），康熙皇帝修建了热河行宫，这就是有名的避暑山庄。乾隆皇帝后来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到五十七年（1792），避暑山庄才最后建成。避暑山庄规模宏大，面积约560万平方公尺（8 400多亩），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园林。

康熙、乾隆两个皇帝，花了90年的时间，修筑这么大的园林，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避暑，实际上，用乾隆皇帝的话说，是为了

① 只有二十一年（1682）和三十五年（1696）两年，因出巡东北和亲征噶尔丹而未来。
② 乾隆六年（1741）开始，隔年一次；十六年（1751）后，更是夏、秋必至。

“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因此，他们几乎每年，都要在这里召见全国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宴请他们，笼络他们。在用兵北部、西北部、青海、西藏等处的过程中，皇帝还下令修造了一些各具风格的庙宇，作为各部彻底归服统一的标志和象征。平定了准部，修建了普宁寺；平定了回部，修建了普乐寺；为了笼络西藏官俗，又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和班禅行宫。……这里还种植了外兴安岭的红色味甘的野果（草荔枝）和南部新疆的无子绿葡萄。年复一年，到这里朝见皇帝的，除了内蒙四十九旗，外蒙四部、厄鲁特四部、青海各扎萨克（旗主），不下百余旗的头目之外，哈萨克的阿布赉、土尔扈特的渥巴锡等也曾前来。因此，避暑山庄，俨然成了清朝皇帝维护各族统一、处理民族事务的第二中心。

木兰围场的狩猎和避暑山庄的巡幸，巩固了清朝皇帝对于全国主要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而对于经济、文化发达，思想、政治不稳，汉族聚居最密的东南各地，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也各自作了六次的“南巡”。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和四十六年（1707），玄烨南巡六次，不断巡视河工、蠲免租税、省风问俗，还谒明太祖陵、访孔庙、召见奖励耆老秀才。乾隆皇帝也学着祖父的样子，在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和四十九年（1784）南巡六次，除了审视黄河堤坝、修筑浙江海塘、参观江南机房之外，也通过谒明陵、祭孔庙、免钱粮来笼络汉族士绅，缓和江南地区的阶级、民族矛盾。比康熙皇帝更突出的是：乾隆皇帝不但加祭历代先贤、勋臣、名宦、忠烈（包括岳飞）的祠堂、



避暑山庄图

坟墓，遣祭本朝故吏的陵寝，而且还不断地阅兵，通过阅兵，告诫将士防止腐败，发挥维护清朝统治的职能。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看见八旗将军和绿营提镇坐轿，便下令应该骑马。三年后，杭州将军伊领阿、副都统刘扬达，都因坐轿丢了官。乾隆皇帝在通过南巡来进一步笼络士绅方面，也很有一些办法。他宣布增加巡幸地区的官学生的名额，亲自选拔一些文人当官：桐乡的陆费墀，被选拔成了进士，后来还当上四库全书馆的总校官；嘉善人谢墉，后来更当上了吏部左侍郎。他接见那些退休的老臣，给他们赐坐、赏饭、赏人参、赏貂皮、晋衔、赐子孙功名出身。前文所述的沈德潜，70岁才考上进士，当礼部侍郎退休；嘉兴有个康熙时的进士钱陈群，乾隆时当过刑部左侍郎，也退休南归。乾隆皇帝南巡时，二人两次接驾。二十七年（1762），乾隆皇帝在常州见到他们，写诗称他们为“二老”；三十年（1765），乾隆皇帝又见他们在苏州候驾，更写诗称他们为“二仙”，说：“二仙仍此候河滨，三载相睽意更亲”，显得更加亲热。康熙时期，梅文鼎的孙子梅瑴成，曾被召入内廷，康熙皇帝还曾亲自给他讲过算学，叫他编过天文、算法等书，官至左都御史而死。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时，赐他的长子举人出身，还写诗说明自己是“推恩缘旧念，皇祖内廷臣。”溧阳还有个康熙年间的老进士史贻直，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兵、吏等部尚书，乾隆二十年（1755）因给坐事籍没的山东巡抚鄂昌讲情，而被罢官回籍。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时，特地召见了他，恢复了他的大学士衔，叫他重新入阁办事。

康熙、乾隆两个皇帝的这些作法，对一向多事的东南地区的稳定，确实是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在督察各地官吏、加强君主集权上，雍正皇帝却最下工夫。他设置“观风整俗使”不说，还广置个人亲信逻察官吏们的表现。田文镜，是康熙时的内阁侍读。雍正皇帝即位后，派他去祭华山，回来后，向雍正皇帝报了山西的荒情，雍正皇帝见他敢讲真话，提拔他当了山西布政使，后又升他为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田之所以官运亨通，跟幕客邬先生

（思道）大有关系。他当总督时，邬先生问他：“你想当个出名的总督么?”田说想，邬就说：“那么，就放手让我替你办件事，别干涉我吧!”田问办什么事，邬说：“我将替你草写一纸疏文上奏皇帝。但这疏，一个字也不能叫你看。”田文镜答应了，邬先生弹劾了权臣隆科多，田文镜于是更被雍正皇帝宠眷。不久，田文镜不听邬先生的意见，邬愤而辞去，田文镜再奏事，就不中帝意而数被谴责了，及至再请邬来，又帝眷如初。有的史书说，这邬先生就是雍正皇帝派来的心腹，假借田文镜的名义要弹劾、除却权臣而集权于一身的。康熙时的进士王士俊，雍正初离京到河南去做官。临赴任，尚书张廷玉推荐给他一名佣人。士俊后来要回京陛见，这佣人却要提前告辞。士俊问其所以，这人说：“你做官几年，还不错，我要先回京面圣，替你说些好话。”原来这人，是雍正皇帝的侍卫，派来做耳目的！诸如此类的逻察，雍正皇帝还搞了许多，朝臣们一个个只好谨慎小心，乖乖儿让皇帝独裁。

清朝入关后，满洲八旗的旗主们，还保有一定的传统势力，不久，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虽已直接受皇帝的指挥，但下五旗（正红、镶红、镶白、正蓝、镶蓝）仍由旗主统领，他们各为旗君，并多勾结旗下、树立朋党，妨害皇帝集权。雍正皇帝于是将下五旗也收归皇帝直接管辖，直接委派亲信统理旗务，并严禁旗主与外吏勾结、严禁旗丁在旗主门下行走，宣布旗丁必须尊奉皇帝为至高无上的君主，这也大大地加强了皇帝对旗主、旗军的统治，保证了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内空前的统一。

第七章　清朝鼎盛时期的经济和文化

一、内地经济的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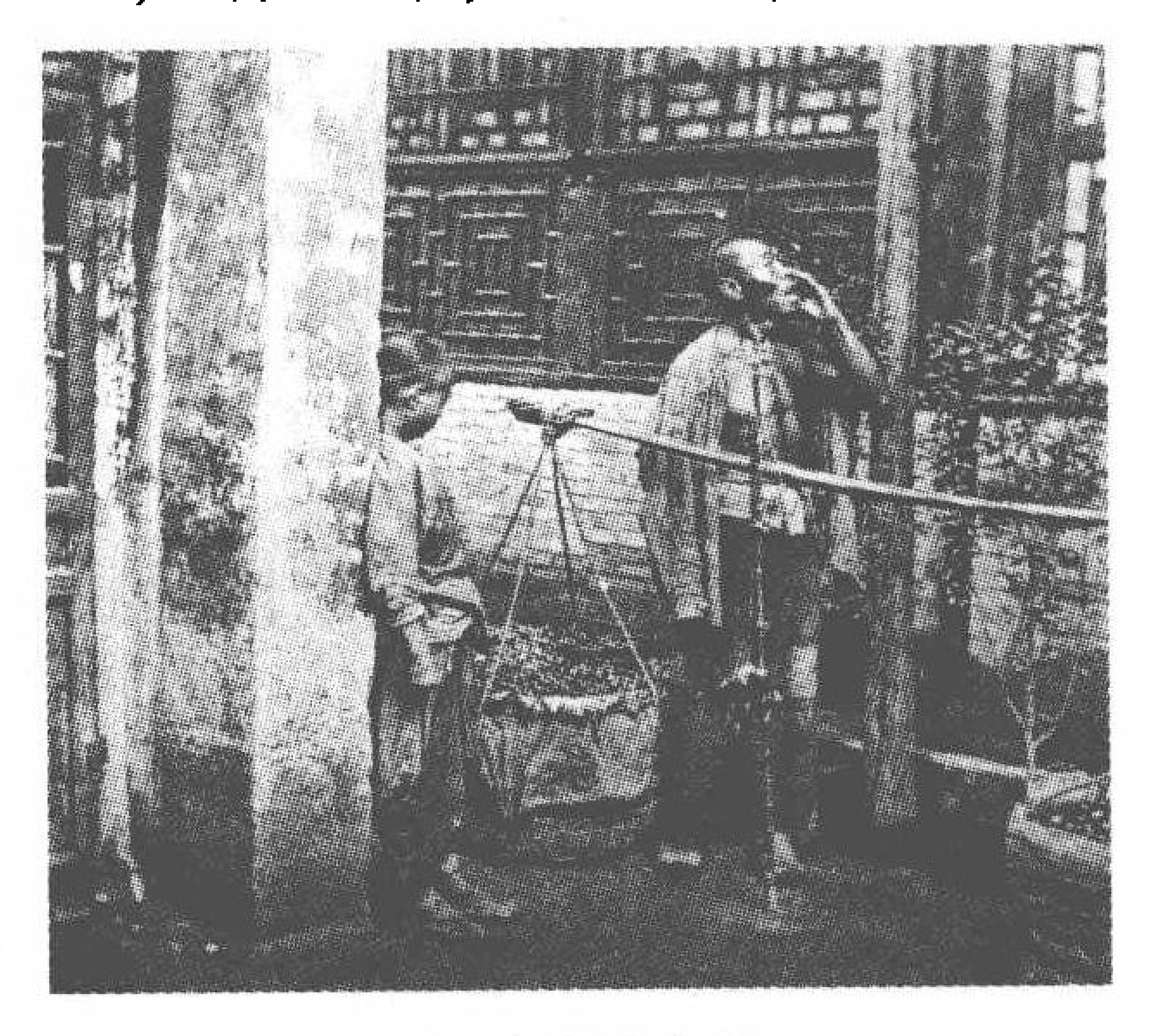
清朝经过雍正、乾隆两代皇帝之后，社会经济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明朝崇祯时期（1628—1644），全国耕地最大面积是 7 837 000 多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极不精确的统计，耕地面积即已差不多达到这个数字，到嘉庆十七年（1812），竟超过了这个数字 77 727顷。人口方面，顺治末年，全国人口统计数字还不到 2 000 万（其中也有隐瞒的），而乾隆末年则达到了 3 万万！国家赋税收入：顺治末年，国家岁征银 2 150 余万两，粮 640 多万石；而乾隆末年，岁征银则达到2 990余万两，粮更达到 830 多万石了。

早先，粮食主要产地是东南的江浙地区，雍正、乾隆时，“苏、湖（太湖地区）熟，天下足”的局面，已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所代替。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这些省份，亩产高时可达五六石甚至七石。长江以南，两季稻已开始普遍有了；北方的天津地区，也成了鱼米之乡。雍正时期，河北省的稻田，已有了 6 000 多顷。高产作物，普遍推广种植：陕西南部，漫山遍谷都种的玉米；河南、山东，也种起了薯瓜。到乾隆末年，薯秧也不必从南方运来了。乾隆五十年（1785），福建闽县有个 80 多岁的老农叫陈世元的，竟带了薯种、孙仆，到河南、山东指导人们育秧、栽种，朝廷还给他赏了个“举人”的职衔！一向人烟稀少的川、

陕、楚交界处的南巴老林地区，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区，成千上万的流民披荆斩棘而入，开荒种粮，并从事铁、木、纸、炭等手工业的生产。气候较冷的京畿一带，也有不少“地窖”和“火室”，寒冬腊月，已能自产韭黄、黄瓜之类的青菜了。

粮产的增加，使经济作物的种植增加了。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到处是桑树成荫、蓊郁一片。乌程、石门、桐乡、海盐等县和杭州一带，极目远眺，绿云如海，侧耳倾听，剪声如涛。棉花，宋、元时期，从海南岛传入江南各省，到清朝雍、乾年间，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以及河南孟县、内黄县，河北保定地区，到处都是棉田。“嘉定县，近海边，不产米，多种棉。”——这歌谣，反映了乾隆末年江南许多地方植棉争利的盛况。黄蒂、穲蒂、紫花等等，都是棉花的新品种；秋收时节，蜂积蚁聚、纷纷赶来棉区“坐庄”收购的，尽是远近各地的棉商。上海的花（棉花）市，天刚破晓就人声鼎沸；保定的棉区，商贩们的牛车也是络绎不绝。而那一堆堆的棉花，高耸如山，色白如雪。烟草，大约在明神宗时传入中国（主要在福建先种，崇祯年间才扩种于江、浙一带），一名“相思草”，满名“淡巴菰”。康熙末年，北方普遍种植，而乾隆时期，文人士子，也开始普遍吸用了。福建、浙江、安徽、山东、河北、陕西，种烟的到处都有；而山东济宁城六家烟铺，竟有工人四千多名！湖南衡阳府造的“衡烟”，驰名全国；江西玉山县造的烟丝，在大江南北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卖红枣的小贩

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提。南京的缎机已有 3 万台，它们一般都由 132 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 9 000 多根，多的甚至达到 17 000 根。南京

的缎子，供宫中用的有花缎、锦缎、闪缎、装花、暗花、五丝等等；供民间用的则有头号、二号、三号、八丝、冒头、靴素等等，真是“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杭州的丝织，是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纻丝等等什么都有；松江的棉织，也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等等样样俱全。陶瓷业，不仅窑数增多，而且规模更大。乾隆时，景德镇是“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镇大十多平方里，匠工几十万，瓷窑二三百区，烟火终岁相望，入得镇里，四处轰鸣，故被称为“四时雷电镇”。窑内分工更精：匠作有淘土、拉坯、印坯、旋坯、画坯、抬坯、装坯、舂灰、合釉、上釉、满掇、烧窑、开窑之别，而烧窑工又有三个工种，画坯工也有画工、染工的细别。粉彩、珐琅彩更臻完美，釉色也有粉青、郎窑红、松石绿、茄皮紫、蟹甲青等名目。矿业方面，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有313处（不包括偷采的在内）。云南铜产，每年多达千余万斤，民厂大者七八万人，小者也有工人几千。广东，铁炉四起，高者一丈七八尺，炉后有两扇门式鼓风设备，还用机车把矿石、焦炭飞掷入炉，每炉每昼夜可出铁12次，每次即出铁300多斤。大炉，环炉300多家人手，运矿石或产品，用牛200头、船50只。只佛山镇一处，炒铁炉即有数十家，铸铁炉即有百余家，昼夜冶炼，火光冲天，其产品广销各地。四川的盐井，雍正八年（1730）增至5 939眼，而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更发展到8 307眼了，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每个大盐厂都有几十万两的资本。盐厂的分工也很精细，有司井、司牛、司车、司篾、司梆、司槽、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等各种不同性质的工种。



山西票号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

号商，这些票商（以山西人为最多），具有巨额的资金，因而，甚至为官府代解钱粮、存支官款、贷给官款。此时，最富的商人，还有盐商和行商（所谓广东十三行）。行商垄断的资金多达几千万两。尽管这些人大都是官商或官员，其经营的业务也没超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范围，但也有一些商业资本被投到手工业生产中，转化为最初的工业资本。

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就出现在清朝的鼎盛时期。乾隆十六年（1751），弘历南巡，到苏州时，吴县阊门专诸巷有个画画的叫徐扬，向乾隆皇帝献了画。乾隆皇帝很高兴，让他入了画院，后又赐他“举人”衔名，官至内阁中书。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人更以苏州为模特，画了一卷《盛世滋生图》。这卷画，形象而真实地记录了从苏州城西25里的灵岩山起，到城西北七里的虎丘山止的整个苏州市的繁华实况。在这卷长达十公尺、宽仅36公分的画面上，竟展现出12 000人，大小船只四百只，有招牌的店铺230多家，50多个行业中，还有两家“洋货行”；14家丝绸业中，最大一家竟有七个门面！店铺之外，还有蜂攒蚁集的小贩。商品，除本地产品之外，还有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四川、广东等省的特产。虎丘的凉席，当地的盆景，金华的火腿，南京的板鸭，宁波的淡鲞，以及川、广、云、贵的杂货，统统陈现于观者的眼前！的确，此画绝非夸张：乾隆时期，苏州城的人口已不下50万，合郊区的更不下100万了！东城的习织之家，不下万余；阊门之外，踹坊就有四五百处；盘门、葑门等处，也是“万家灯火”哩！扬州，到乾隆年间，市民、商贾也不下数十万人。大的盐商，衣屋华靡，竟将金钱珠宝视为泥沙。大商人江春，在大虹园里，一夜就修成了一座白塔！南京，乾隆时也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除了前面提到的江绸、贡缎名甲天下，书坊、扇市更独享盛名。灯影里的秦淮河，桨声不断；歌舞中的茶肆酒楼，欢声不绝。广州，已被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了。在这里，已有几十个单位与外国贸

易，贸易额增加速度亦很惊人：乾隆十四年（1749），洋船只有 18 艘，而到五十四年（1789），洋船已有 83 艘；乾隆四十年（1775），出口的茶叶只有 1 600 余万磅，而到五十年（1785），出口的茶叶，已达2 800多万磅了。乾隆中叶虽曾限制出口，但出口的生丝仍有二三十万斤，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丹麦、瑞典等）的贸易，竟出超 240 多万两。乾隆年间，长江沿岸的无锡、镇江和汉口，被人誉为“布码头”、“银码头”和“船码头”。此时的汉口，已成长江中游最大的粮、盐、布、木材、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地，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货宝奇珍在此集聚，千樯万舶在此停泊。乾隆末年，一次大火烧毁的粮船、客船，即达三四千只！乾隆年间，运河两岸的淮安、清江浦、临清、济宁等镇，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清初的清江浦，才三万多人，乾隆时，已增加到了 54 万。此外，厦门“不减通都大邑之风”，佛山也成了“岭南一大都会”，乾嘉之间，这个“大都会”，光大小街巷，就有 622 条之多！至于北京，那就更是全国贸易的中心了：东北的人参、貂皮，西藏的红花、藏香，新疆的毡毯，蒙古的裘褐，以及云贵的药材，都出现在这里的市场上；安定门外的“外馆”，城内御河西岸的“里馆”，随时迎送着远道而来的蒙古客商。

二、边疆经济的发展

国家的空前统一，内地经济的繁荣，给清朝鼎盛时期的边疆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

北疆的蒙古人民，和拿着政府“印票”而来的汉族农民一起，共同发展了农业生产，很多牧地已经变成了农田，小米的产量大大增多，价钱比北京还贱四倍，因此，常常供应北京。山西和北京的商人纷纷来到这里经商，这里的商人（皮商、畜商）也纷纷经商内地。临清的机户，专门供应蒙古地区“哈达”；北京的“大字

号”，也专门为蒙古地区生产念经用品和其他手工艺品。恰克图是漠北繁庶之区，归化城也“商贾丛集”、多伦诺尔同样“商贾日众”，库伦、张家口更有了空前的发展。汉人不仅与蒙古人通婚，而且很多人能用蒙语说话。蒙古人民也已大量阅读汉族的书籍、居住汉式房屋。

西北方面：乾隆中期，天山北路的厄鲁特蒙古，已有十四五万亩的民屯田，而且已经生产稻子。这里不仅有了大批的汉人，而且还有从吉林、黑龙江迁来的达斡尔族、锡伯族人。乌鲁木齐已经成了西北地区的大城市，史书记载，这时，这里已是“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荣富庶，甲于关外。”伊犁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所产的煤、铅也很有名。天山南路，灌溉面积增大，农产增多，也出现了不少商业中心。和阗的玉器、丝绸，喀什噶尔的五色绒毡，阿克苏的百货，叶尔羌的土产，都吸引了内地（尤其是江浙）的大批富商巨贾。阿克苏每逢赶集之时，货如云屯，人若蜂聚，有的史书记载：内、外商人、市民、牧民、农民来此，竟到了“摩肩汗雨”的程度。西北地区，肃州（酒泉）已是内地与新疆物资交流的枢纽。这里的贸易，一次赶来的牲畜就有十余万只。乾隆四十二年（1777），由此运往伊犁贸易的缎、绢、绫、绸就有11 000匹。

西南地区：乾隆五十三年（1788）以后，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隔年轮班入贡；而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禅额尔德尼六世，还曾在热河承德的避暑山庄谒见过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因而对西藏的重视远过于康熙、雍正时期。成都机户所织的“哈达”专门供应西藏，内地的茶叶、布匹、陶瓷、绸缎、烟酒，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西藏的藏香、红花、大黄以及冬虫夏草之类的药材，也不断地满足内地商人的购求。一些民族（尤其是蒙古族）的人，经常到拉萨“熬茶”，朝圣布达拉宫，也带有贸易的性质。但广大人民之间的贸易，则在四川的打箭炉（藏语：茶布买卖市场）地方进

行。由于打箭炉百货完备，商贾成群，故被人誉为“小成都”。乾隆年间，云南、贵州的汉人大大增多（甚至流放的汉人自乾初起也改发到这里来），因此，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矿、铸铜之外，乾隆初年还派人疏浚了洱海口，涸出良田万余亩；后来，又沟通了清江、都江，使楚、粤的商贾船只直达苗区重镇古州。毕节，“市集甚盛”，成为云、贵铜产的集散地；个旧，也“商贾辐辏，烟火繁稠”。乾隆二十九年（1764），政府被迫允许苗、汉通婚后，苗、汉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就更进一步密切起来。苗人积极学习汉文，不少人通过科举考试中了举。

台湾和南海诸岛的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也远胜于前，因而，生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台湾，乾隆时出现了更多的“汉庄”，高山族人民进一步掌握汉族人民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后，种出了一种稻子，最大的稻粒竟有豆大。台湾生产的粮食，一年已够四五年吃；台湾生产的蔗糖，和粮食一样，远销至天津和牛庄！这时，高山族人民，还学会了淘金、冶金、烧瓷和刺绣等技术，他们盖的房屋也相当别致，远远望去，简直跟画舫一般。海南诸岛，黎族人民多用黎茶换取汉族商人的盐、布以及“太和烧酒”之类，学习汉文、发展农业，都已蔚然成风。

东三省，是清朝的发祥之地，因此，朝廷一向是实行严厉的封禁政策，不准汉人出关开垦。顺治十八年（1661），朝廷构筑了盛京到开原以北威远堡的“老边”；康熙九年到二十年（1670—1681），构筑了威远堡到吉林北边法特哈的“新边”（即“柳条边”），总之是不准汉人逾越。康熙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和三十六年（1675、1679、1686 和 1697），还将此“边”向西延筑，以防汉人自蒙古地区插入。同时，朝廷还大圈官庄和牧厂（奉天附近的“养息”牧厂，就占地南北 250 里、东西 150 里！），不让汉人来私垦。但是，内地经济的高度发展，土地的兼并集中，迫使农民纷纷“闯关东”。雍正时期，由于吉林地区汉人的增多，不得不建置泰宁县、长宁县和永吉州单独管辖。乾隆皇帝上台后，大设

封堆台卡，严令官兵把口（包括海口），务想保住“龙脉”，结果还是不成：乾隆中期，盛京旗、民杂处，已经无界可分；柳边已同虚设，清查之令已成具文。乾隆四十二年（1777），汉人增加到将近80万；四十六年（1781），辽宁民田已达35 854顷，比顺治十八年（1661）增加了四倍多。乾隆五十六年（1791），朝廷不得不宣布开放大凌河牧厂，允民开垦31万多亩。吉林地区，乾隆四十六年（1781）也比雍正十二年（1734）的旗地增加了五倍①、民田增加了四倍多。黑龙江地区，乾隆四十五年（1780），有官庄136处，比乾隆元年（1736）增加了75处。地处偏寒的黑龙江，粮食已能自给，谷物已有十个品种。瑷珲的荞麦，尤其“甘滑洁白”，独具风味。乾嘉之际，齐齐哈尔，已有了芹菜、芥菜、菘（洋白菜）、韭菜、菠菜、生菜、茄子、萝卜、黄瓜、南瓜、葱蒜、辣椒的大量种植。烟草，还有“南山烟”、“东山烟”和“台片”之分，台片味较达斡尔烟气味清淡，价钱又便宜，很受吸者欢迎。汉族与土著各族还进一步开发了黑龙江北的海兰泡地区，后来成为有名的“江东64屯”。

农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使手工业、商业也发展起来。乾隆末年，长春、农安等地，已蔚成市廛。而早先的盛京、辽阳、海城、锦州、熊岳、宁远、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三姓、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呼兰等市镇也有进一步的繁华，榨油、制粉、浇蜡、滤蜜、陶瓷、纺织、印染、造船、鞣皮等手工业作坊也日益增多。“直隶帮”、“山西帮”的关内商人，不断地交流着关内外的货物，江苏的茶、北京的靛，奉天的盐，黑龙江南北的人民都能买到。每年五六月，黑龙江南、北各族人民，照例拉家带口、大车小车载满皮毛、人参、药材、山货，来到齐齐哈尔西郊，支上帐篷，摆上摊床，跟市民和从吉林、盛京远道而来的客商，进行昼夜不停的交易。从晨曦初露到烛天的深夜，这里始终是人声鼎

① 很多旗地，实为汉人佃种。

沸、欢声不绝。——这就是有名的“楚勒罕”（“盟会”）。黑龙江下游的普禄（今俄罗斯波卡罗夫卡附近）、台伦（今俄罗斯卡尔吉）等地，定期的交换场面也热闹非凡：穿红戴绿的赫哲人、费雅喀人、鄂伦春人、库页岛人，拿着貂皮、海象牙之类，换取官员和商人的“乌林”（满语：财货）。

清朝鼎盛时期，各族人民在共同开发边疆方面的成就，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可比拟的。各族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冲破重重阻挠，开发和建设边疆的业绩，永远光照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三、华侨对东南亚的开发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南洋婆罗洲昆甸的东万律的城门上，高挂起“兰芳大总制”的大匾；城内大厅里，也高挂着一块匾额，上书“雄镇华夷”四字，每个字都是四尺见方。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华侨建立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的创始人叫罗芳伯。罗芳伯是广东嘉应县（今梅县）石扇堡人，屡赴科场赶考，都没考中，于是，便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去到南洋婆罗洲的昆甸教书和采金。适逢昆甸国内爆发了内乱，昆甸的苏丹（国王）无力平叛，罗芳伯便组织了当地的华侨三四万人，并团结了当地人民20多万，帮助苏丹平叛。叛乱很快地平息了，苏丹起初是跟罗芳伯“约为兄弟”，后来，干脆就把权力让给了他。罗芳伯把无数采金的小公司，组织成了一个大公司，取名“兰芳公司”。与公司相适应，建立了“兰芳大总制”的政权。有人建议他称王，他说：“赖众人功力，侥幸得海外一片地，我如果称王自尊，是为私而不为公了，这不是我的志愿。”于是，只称“大唐总长”，建元“兰芳”，以东万律为首府，设大厅，下设省、府、县，还有三个附属国。他振兴农业，扩充市场，开发金矿，聘请儒生办学堂，实行立法民主，把昆甸搞得生气勃勃。

乾隆六十年（1795），58岁的罗芳伯死了。临死前，华侨们劝他立后人，他却说："我们漂泊海外，共同出力，得有今天，我怎敢存私心？请众兄弟推贤继任。"这样，芳伯死后，大家相继选举了江戊伯、宋插伯、刘台二、古六伯、谢桂芳、叶腾辉等继任，兰芳大总制几十代，一直坚持到光绪十二年（1886），才被荷兰殖民者消灭。

清朝鼎盛之际，在南洋建立政权的华侨，还有郑玖、吴阳。郑玖，广东雷州人，康熙初年到达暹罗湾的河仙，令子弟读汉文书籍，后来，博得了华侨和当地人的拥戴。吴阳，福建漳州人，乾隆年间到了马来半岛的宋卡，也深受华侨和当地人的热爱。

乾隆初期，还有个叫郑镛的潮州澄海人，去到暹罗的大城府，富了，当上了赌饷官，娶了个叫洛央的暹罗姑娘为妻，生了个儿子叫郑信。郑信长大成人，也被拥立为王。乾隆三十三年（1768），暹罗发生了鼠疫，他组织了大批华侨和当地人灭鼠，他还输金海外、广购粮米，解决粮荒，算是为暹罗人民做了两件好事。可惜，后来他狂热地信仰宗教，得了精神病，杀了不少不尊他做长老的僧人，他又苛刻富商，于是，48岁时便被郃克里杀掉了。但是，郃克里登上王位后，却自称郑华，向清朝进贡时更称自己是郑昭（即郑信；"昭"，暹语"王"之意）的儿子。这也足见：在南洋各地，华侨影响之大。

明末清初，是华侨开发南洋的第四次高潮。清军入关，出去一批；郑成功抗清时，又出去一大批；康、乾盛世，土地兼并加剧，剥削、天灾逼走一批，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商品经济活跃，又有一批买卖人往返于祖国与南洋各国之间。康熙五十六年（1717），玄烨下令出国之人不许归国；乾隆元年（1736），弘历又下令：1717年例禁后出国的，永远不准归国。这样，相当多的人，只好永远侨居国外了。他们中的1/10去到日本、美洲，其余9/10，都往南洋定居。

往返或定居的华侨，从明代起，就给南洋各国带入了比较先进

的生产技术（如冶铁、制糖），运去了生活必需的商品（如丝绸、金属、牛马、水果甚至纸墨）。制木、缝纫、做鞋、经商、打鱼……各行各业，处处闪动着华侨的身影；繁茂的甘蔗园，青葱的橡胶林，马来半岛的锡矿，婆罗洲的金矿，到处都渗透着华侨的血汗。康熙四十九年（1710），爪哇的巴达维亚一带，一共有130家糖厂，一半是华侨经营的，华工就有上千人。而暹罗、吕宋、缅甸、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华侨的大小买卖人，一地更有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名之多！康熙五十九年（1720），巴达维亚市内外的华侨，共有十万人；而乾隆初，华侨吴尚贤在缅甸卡瓦地区开设的茂隆银厂，竟有几十万人的规模！

华侨和当地人民，共同开发了南洋各地。

然而，17、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却攫取了华侨和当地人民的劳动果实。西班牙殖民者强占了菲律宾，荷兰殖民者强占了爪哇，英国殖民者强占了马来半岛，后来又掀起了重新分割整个南洋殖民地的战争，争夺整个南洋地区的殖民统治权。英国政府在这里的收入的9/10，都来自华侨之手。其他殖民主义国家，也尽力抢夺华侨的财富。不仅如此，他们还大肆进行血腥的屠杀。

顺治十八年（1661），菲律宾华侨喜闻国姓爷（郑成功）光复台湾，欢欣鼓舞，西班牙殖民者却暗布骑兵百人、步兵八千，严守炮台、大修军械，然后，捕了两名华侨船主，挑起事端。华侨激怒，抓了一个西班牙凶手杀掉，西班牙殖民者乃大打出手，杀了华侨一万名左右！乾隆二十七年（1762），英国殖民者攻马尼拉，西班牙殖民者唯恐华侨暴动，又杀华侨6 000人！

乾隆五年（1740），荷兰殖民者见其统治下的巴达维亚华侨太多，便强迫他们去锡兰、好望角，途中又百般折磨，并投海数百，九死一生的华侨逃回相告，华侨震怒，荷军又连杀五日，杀死万余，财产全被侵吞。

欧洲学者说："欧洲人得了牛，而中国人却得了奶。"其实，华侨不但丢了牛和奶，而且丧了命。而处于鼎盛时期的清朝政府，

却对华侨的遭遇不闻不问，不唯不问，甚而至于痛恨唾骂！荷兰殖民者在屠杀了巴达维亚的华侨之后，于乾隆七年（1742）跑来向清朝政府“谢罪”。乾隆皇帝却说：“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福建有个总督叫策楞的，听得华侨惨遭大屠杀的消息，更咬着牙齿骂道：“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荷兰殖民者）戕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有人请求以停止南洋贸易来表示对殖民者的惩罚，广东那个监察御史李清芳马上就给乾隆皇帝打报告：停不得，停不得，江、浙、粤、广四省的关税，从南洋商船可收全部洋船的9/10，“每年总共不下数十万呐！”朝廷的享受，历来建筑在劳动人民的汗水和血泊之中！

清朝处于盛世尚且不顾华侨的死活，到中衰之际的19世纪初，南洋华侨就更加孤苦漂泊了。相当一部分人，这时只好再度离开自己双手开发的土地，作为“契约华工”的“猪仔”，纷纷前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中流血流汗了！这些被迫卖身的华侨，很多还淹死、病死或被折磨死在殖民者的押运途中。道光二十五年（1845），法国一艘商船，还从厦门运走了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契约华工；同治十年（1871），秘鲁船“顿周安”号，开离香港不远就起了火，650人中，竟被烧死、淹死了500来名！这“浮动地狱”的滋味，何等地辛酸！

四、“乾嘉学派”

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来。社会的安定，又为学者们提供了良好的治学环境。加之宋、元以来，已有人掀起过考订古书的学风，所以，清初以来，即有人注意过考证之学。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治学就非常谨严扎实，成为清代学术的开山祖；稍晚一点的阎若璩（1636—1704）和胡渭（1635—1714），更发扬了疑古、考证的精神。阎若璩写的《古文尚书疏证》，考证出古文尚书是一

部伪书；胡渭所著《禹贡锥指》和《易图明辨》，在辨别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上也有一定的贡献。有人曾经记录阎若璩的治学情形，说他辨核一事，至检数书相证，反复研究，“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解”。说他的爱读书，有如酷暑之慕清凉；细推敲，有如缝纫之于丝履；严区别，有如老农之于黍稷。至于其用力的程度，虽壮夫骏马，日驰数百里，比不上他的勤苦；至于他的持论，即使老吏断狱，具两造、当五刑，也不足喻其严。然而，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文字狱的摧残，却使他们的治学目的，开始从“经世”转入“避世”，从要求改革转入“为考据而考据”了。而到了乾隆以后，这种认真整理、考订、搜辑古籍的学风，进一步发展起来，形成了一大学派——“乾嘉学派”。

这个学派对于每一问题，都要弄清原委，很推崇汉儒（尤其是东汉的许慎、郑玄）的治学作风，所以，又称“汉学”。他们的学风，崇尚朴实，反对虚浮，因此，也被称为“朴学”。又因为这个学派盛于乾隆、嘉庆时期，于是，人们就常称之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创始于惠栋，发展于戴震，知名的学者共有 60 多人。它以经学为根底，及于小学（文字学）、音韵学、天算学、地理学、金石（考古）学、乐律学、典章制度、目录、版本、校勘和辑佚之学，粗分之，可分为经学、史学和文学三大方面。

乾嘉学派的学者，大抵是一些不很热衷于官场生意的考据学家。他们扎扎实实整理了《易》、《书》、《诗》、《礼》、《春秋》等经书 389 种、2 700 多卷，还鉴别了一些古书的真伪，疏证与校勘了古籍的字、句。他们把文字学、音韵学的研究，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南宋末年的王应麟（作过《词学指南》）、明末和尚陈第（作过《毛诗古音考》）跟他们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不仅校勘了秦、汉以前的诸子著作，而且校勘了西汉以后的许多要籍。他们还搜集了很多散失佚亡的书，仅被《四库馆》辑出的经、史、子、集，就有 375 种，4 926 卷；而黄奭收集在《汉学丛书》中的，

也有 216 种；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竟收集了 29 家、630 种！

他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用科学归纳的方法，对我国的古籍，可说是进行了一次大清理，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更有利的条件。他们考证的方法，梁启超曾打过比方："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样。乾嘉学派中有吴派和皖派的区分。江苏吴县有个叫惠栋的人，是吴派的头头，虽然好博尊闻，但却一味好古、一味崇古。章学诚把这一派比作吃桑叶不吐丝的蚕，梁启超也说他们是"必古皆真，凡汉皆好"。他们确是颇有点非古不足为训的味道。

惠栋（1697—1757），苏州元和人，家学底子很深，曾祖有声、祖父周惕、父亲士奇，都是知名于时的学者。祖号"老红豆先生"，父号"红豆先生"，惠栋本人也号"小红豆先生"。父亲对许多古书都能背诵得不差一字，这当然给惠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他自幼很爱古书、爱买古书，还常借了古书来读。他在门上写了副对联："六经宗服（虔）、郑（玄）[①]，百行法程、朱"。他考证《易》、考证《古文尚书》，推崇汉儒，开了汉学尊古的头。他的《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周易述》等书，都极力恢复汉人讲经的说法。他的学生江声，甚至不写楷字，书信往来也统统用篆字，写得天书符箓一般，又作了《尚书集注音疏》等，博引旁征，说明汉儒的正确。他的另一个学生余肖客，对汉学也孜孜不倦，读书读得左眼都瞎了，人称"盲先生"，可还是五年奋笔，杜绝交游，博注校刊，写出了有名的《古经解钩沉》（30 卷）等。王鸣盛也听过惠栋的课，24 岁到 58 岁这 30 多年，废寝忘食，也写了《尚书后案》30 卷来发挥郑玄的学说，后来，眼睛也曾一度累瞎。

---

① 都是汉儒。

皖派的领袖是安徽休宁的戴震。戴震可以说代表了清朝鼎盛时期进步思想的主流。他著有《声韵考》、《声类表》、《考工记图》等书，对反切、韵书、四声等音韵学有专门的研究。但真正能代表他的思想的，却是《孟子字义疏证》。

戴震的哲学思想比较唯物。他认为所谓天道，不过是客观的"阴阳五行"而已，阴阳五行是"道"的实体，"举其实体、实物，而道自见"，离开肉体（"血、气"），就得不到精神（"心知"）。而阴阳五行，又在生生不息地运动和变化着，有规律、可认识。因此，反映到汉学研究上，他就比惠栋等人高明得多。他说：汉儒也有附会之处，需要甄别是非、实事求是，不能偏重一家之言，学贵精专、学贵能"化"（融会贯通）、学贵创造，不能抱残守缺、支离破碎，学者要"去私"（除却偏见）、"解蔽"（扩大视野）。有人比喻戴震治汉学，好像"老吏折狱"，案子断得公平。


戴　震

戴震不"为学问而学问"，他敢于拿他的哲学思想联系社会实际。他公开承认人有情、欲，而且认为"无欲则无为"，主张"圣人"治天下，一定要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他严厉谴责封建礼教的杀人。他说：尊者、长者、贵者无论那个理是否合理，总认为合理；卑者、幼者、贱者据理争辩，就是合理也被认为不合理。因此，下面的人都成了罪人！他于是指控："被法律杀死的罪人，还有人怜悯；被理杀死的罪人，谁曾去怜悯过？这就是宋儒读理的祸害！"他于是高呼："理"，应该是"人情"，多数人的人情；个人的意见，不是公理！可惜，对戴震这种在当时难得的先进思想，只

有后来的焦循敢再发挥，别人都像空谷回声，还有不少人进行了攻击！

戴震在治学上，主张切实弄清问题。他长于小学、天算，功在校勘，他贵精不贵博。而且，他提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因此，学者既应不靠抨击前人自我表现，也应不靠依附古人得到个人的好处。他的这种一心求真的精神，影响很大。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这样做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在探求古经真意上，使人真是“如梦初觉，如醉初醒”。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校勘了古书 18 种，和他的另一著作《广雅疏证》，都是乾嘉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之作。

乾嘉学派中，皖派的成就比吴派大。这个学派中，还有江永的声韵学，王引之的训诂学，王昶、毕沅的金石学，都很精湛；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也是第一流的佳作。

然而，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在盛世清朝的文禁森严的形势下，却使学术越来越脱离了现实生活，在社会上也造成了许多穿凿性理、故为艰深的风气。

五、“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乾、嘉史学的概况

乾嘉学派不仅对经书大胆怀疑，主张精核地考证，而且对于古史，也要“考信”征实”。“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崔述喊出的这个口号，很能代表这个学派中许多史学家的特点。

崔述（1740—1816）是直隶大名人。他反对人云亦云。他一生写了 34 种书，最重要的是《考信录》（32 卷）。《考信录》不但考了史，而且主张只有考了，史才可信。

这种考了才信的学风，其实在清初，即已显露出了端倪。清初的史学家，虽然特别注重于当代史（尤其是明末史）的研究，但

是，也极力主张真实、可信。以黄宗羲为首的所谓浙东学派，就很有一些知名的“信史”作家。黄宗羲的《南雷集》，万斯同（1643—1702）的《明史稿》，全祖望（1705—1755）的《鲒埼亭集》，都是“信史”中的佳作。这一派的史学家写史，除了博考文献之外，都非常注意广泛采访当事人、搜集碑传记序等遗迹。其辛苦的程度，也很感人。有个叫谈迁（1593—1657）的海宁人，29岁时，母亲死了，在家闲居，读了陈建的《通纪》，很觉失实，于是遍访钱塘、嘉善、归安、吴兴等地，向藏书家借古籍读抄，用了27年的时间，改了6次，写出了按年、月、日记载，从1328年（元泰定五年）到1645年（清顺治二年）间大事的《国榷》。顺治四年（1647）八九月间，《国榷》手稿被小偷盗走，谈迁拊胸流涕、喟然长叹道：“我手还在，岂肯罢休！”于是，又广寻古籍、遍访遗迹，还跑到北京来翻《万历实录》、《崇祯邸报》，冒了严寒酷暑和雨雪风沙，访问明朝降官、太监、贵族子孙、明清官僚，最后又重新写出了500万字、108卷的《国榷》，真实地考订、记录了明朝前后的史实。全祖望为了进一步丰富张煌言的史迹，访问了张的80岁的族母；为了进一步写好史可法的事迹，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扬州，登上梅花岭。

乾嘉学派的史家，充分发扬了清初史家的求实精神，做了大量的考证、整理古代史籍的工作。江苏嘉定的钱大昕（1728—1804），当了大官，但却无意久沉宦海，而对考证古史兴趣至浓。晚年，他在《自题像赞》中说：“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其实，他从未闲过，自18岁起，就晨夕披览史籍，考订史籍，用不同版本互校，用本书的纪、传、表、记互校，用其他书的记载再校，还用诗文、国史、杂史、碑传、笔记、方志、金石文字来校！70岁时，终于写成了《廿二史考异》。他的同学、妻兄王鸣盛（1722—1796），也用这种方法，写成了《十七史商榷》。还有个叫赵翼的，也写出了一本好书，叫《廿二史劄记》。《廿二史考异》详于校勘、文字，解释、

训诂名物，纠正史书谬误；《十七史商榷》详于典章故实，特别是官制、地理；《廿二史劄记》则着重论证各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三部书，被称为清代考史的三大名著。

乾嘉史家，对史书和作史的义法，还提出过崭新的看法。浙江会稽有个章学诚（1738—1801），少年时，反应迟钝而多病，十五六岁时坚持读书，有志于史学，28 岁时到了北京，在内阁学士、藏书家朱筠家里读了许多书、交了许多名流（如戴震、钱大昕等），知识大进。57 岁时乡居无聊，便整理了自己的读书心得，兼论文学、史学，写成了著名的《文史通义》（内、外篇共八卷）。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说六经都是古史，都是古代纪实之书，都是史料。章学诚还说：“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史分二类：史学著作和一般史料；专门注意词章的，不是好的史学家。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强调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个要素，章学诚则强调史学家的德。他说：“德是什么？是著书人的心术要正直！”他认为：古代经典、方志、官府案牍、金石图谱、歌谣谚语、私家著述，都有益于史实。他反对为考证而考证，提出史学要切于人伦日用，“只要切于世事的，虽锱铢纤毫，决不遗漏；不切于人伦日用的，即使像泰山那样的庞然大物，也不值一顾。”他主张修史贵开创而不必拘泥于成法。因此，他非常重视方志的编撰。他一生撰过方志六种：《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和《湖北通志》。他提出要“立三家之学”，记通志（大事）、写掌故、收文徵、编丛谈。对于宋、明以来的方志，他都给了很高的评价。所以，人们把他称为“方志之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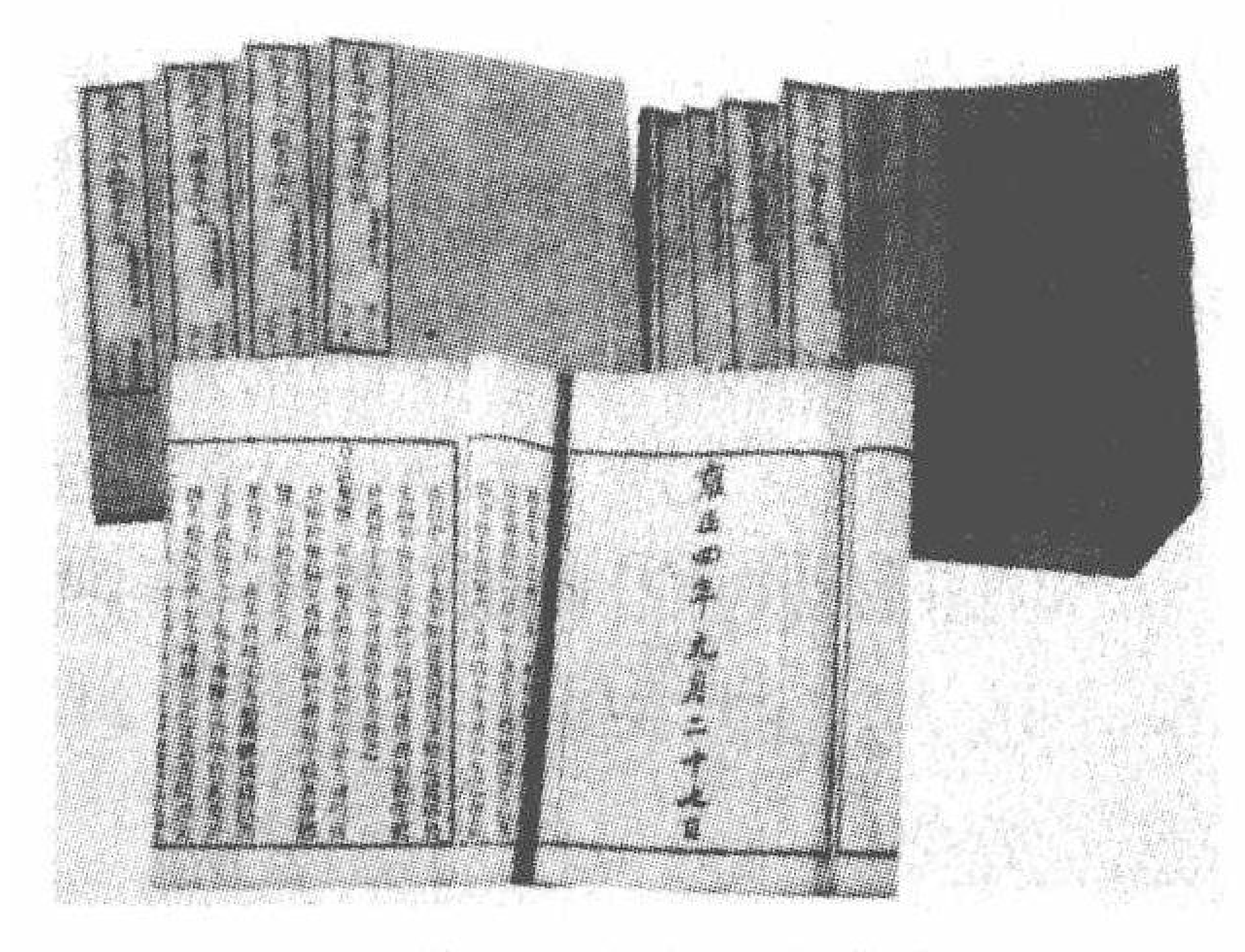
乾嘉史家，对旧史补表、补志、补注和辑佚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他们在辑佚方面，有各种后汉书和晋书，邵晋涵（乾隆进士）和徐松（嘉庆进士）等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旧五代史》、《宋会要》等许多失传的史书。

但是，由于乾嘉学派中的史家，大都偏重于注史、考史，有些厚古薄今的倾向，因此，没有出现一部超过《资治通鉴》的大著

作，也没有像宋人创造“纪事本末”和“会要”那样，创造出新的史学体裁。不过，方志学却因章学诚的提倡和实践，有了大发展。乾隆以后修的方志，约有4 300多种，73 400多卷。乾隆初年刊行的《明史》，也比过去的许多正史要好，在中国旧的纪传体史书中，《明史》是较好的一部。

六、古今图书一大成
——《四库全书》及其他

大抵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朝代，文化上总会有所作为。清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编辑的类书，以三国时魏文帝叫王象等编的《皇览》为最早，以唐代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为较大。尤其是《永乐大典》，一共辑入22 900多卷、11 095册，可算是最大的一部了。


雍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但是，康熙皇帝却并不灰心，他还想有所前进，于是便组织了一班人马，编辑起《古今图书集成》来。他的工作没有做完，就死去了；雍正皇帝又接着做。雍正三年（1725），终于把这部书编完。不过，《古今图书集成》才编辑了一万卷书，分六编（《历象汇编》、《方舆汇编》、《明伦汇编》、《博物汇编》、《理学汇编》和《经济汇编》）、32典，计书6 109部，差不多只赶上《永乐大典》的一半，内容也不如《永乐大典》准确真实。

乾隆皇帝即位之后，总想学着康熙皇帝的样子办事，在好古尚文这一点上，也落个好名声。这样，从三十八年（1773），到四十七年（1782），他组织文人竟编出了中国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一个

大部头——《四库全书》!

"四库"二字，最早是唐朝的魏徵提出来的。乾隆皇帝一向喜欢贪大求全，因此，亲自给这一大部头取名《四库全书》。

为了夸示文治、兼行书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祖孙几代皇帝，都屡次下诏访求遗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大兴人朱筠在安徽当学政，奏请搜集遗书，还提出："《永乐大典》里头，古书很多，请开馆校、辑。"乾隆皇帝一见朱筠的奏疏，立即表示同意，下令收罗名士、开四库馆办理，并说："将来办理成书，着名为《四库全书》。"

这时候，"纪大锅"纪昀，因为给自己亲家、两淮督运使卢见曾通风报信（卢亏空盐款，要被抄家，做侍读学士的纪昀闻讯后，派人用盐和了面、包了少许茶叶送去，暗示因为盐款，家产将被查抄），被发配到乌鲁木齐，现已回京，又做了侍读，在敬一亭值班时早已翻阅过《永乐大典》，对《永乐大典》非常熟悉，乾隆皇帝叫他做了四库馆的实际总纂。

纪昀（1723—1805）从四岁开始，一直到老，始终刻苦读书，他曾题过一副对联，说自己是"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他性格开朗、诙谐、大方，而且重才，因此，能团结人，威望很高。在他的实际负责下，一共组织了359个学者，开始了编纂的工作。

他们把过去的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各省采购采访本、私人进献本以及国内一些通行流传本，统统集中起来重新校勘，按经、史、子、集四部，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汇编，该刻印的就刻印，该抄存的就抄存，该存目的就存目。明、清两朝政府编辑的实录、正史、政书、会典、方略、方志、目录、诗文总集等各种图书，大部分也被他们收入《四库全书》之内。

《四库全书》一共收书3 457种[①]，79 070卷，装订成36 275册；存目6 766种，93 556卷；抄写人员共有1 500人之多。《四库

① 也有人说是3 461种。

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

《四库全书》一共抄录了七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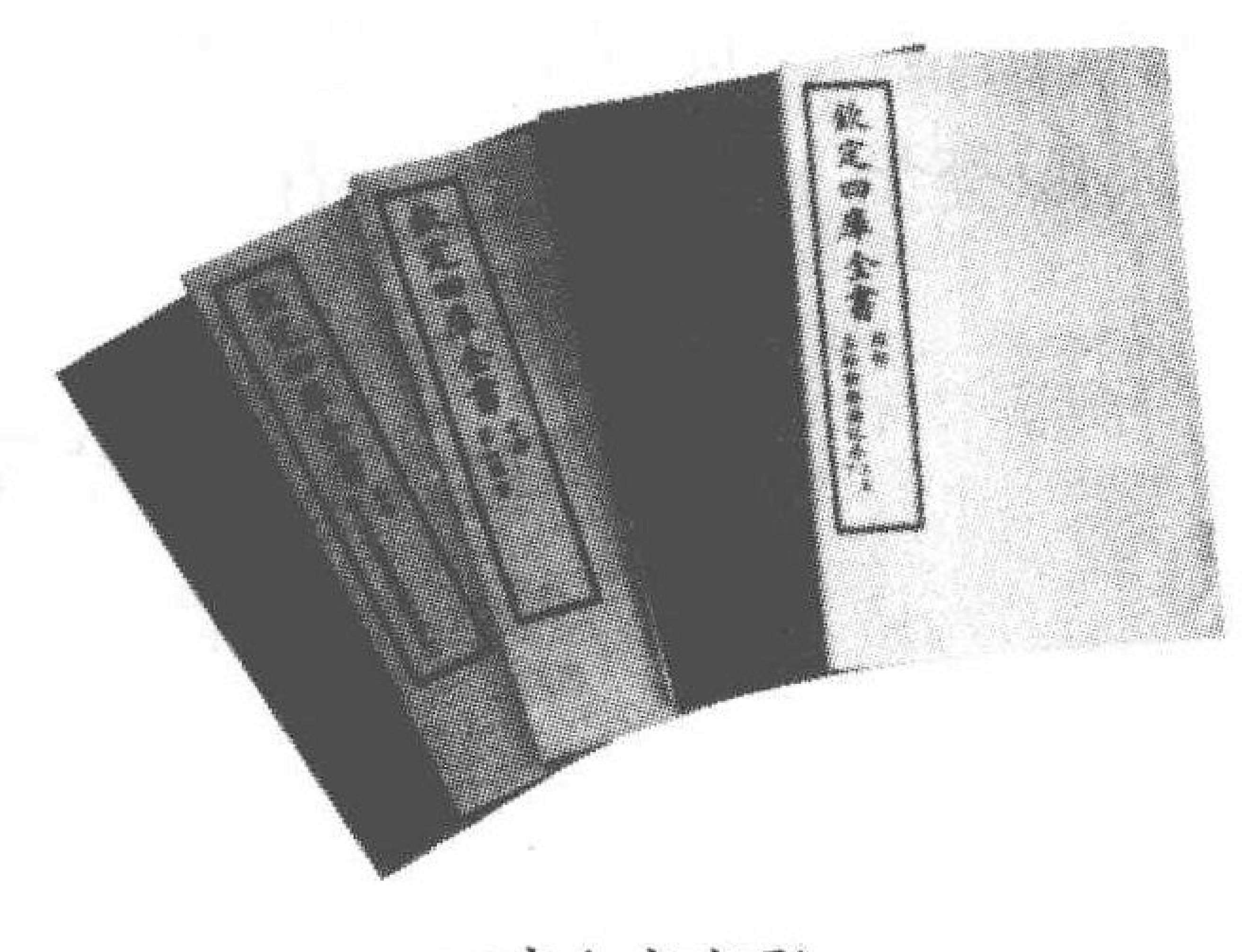
第一份，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抄成，放在新建的文渊阁中。第二年，又抄出一份，放在沈阳的文溯阁中。第三年，又抄出一份，放在圆明园里。第四年抄出的第四份，放在承德的文津阁里。这四份算是正本，抄得十分精工，一色用的宣纸朱栏，装订得也非常精巧。

副本书型略小，一共三份，都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抄成，分别存放在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中。

第一份《四库全书》，从收集编纂到成书，一共才用了十个年头（1773—1782）！

《四库全书》略备了中国的古籍，并且，还保存了中国古籍的完备的目录。起初，它只被允许抄阅，后来还允许借阅，尤其是江浙三阁，竟一任学士参考，几乎成了近代图书馆的雏形。因此，它不仅保存了中国的古籍，而且还传播了中国古代的文化。

《四库全书》也有一些毛病：有的古籍未尽收入；有的古籍，由于涉及清朝先世的事而被删改；有的文字，由于有损于清帝倡行的理学，也被篡改（如“改嫁之妇”被篡改为“贞孀”）。此外，为了让乾隆皇帝显示高明，不少书还往往故意留出一二错字，待乾隆皇帝亲自校正，结果，弄巧成拙，有的错字，弘历没改，其他人也就不敢再改了！



四库全书书影

但这一切还不算大问题，最糟糕的却是乾隆皇帝为了加强专制，在编审《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把许多有损于其统治的古籍烧掉了！乾隆皇帝为了收尽触犯清朝、表彰明季、寓意感慨、词含激愤的遗书，下令各省、府、州、县衙门，专门成立“收书局”。乾隆三十九年（1774），他说：“明朝编的野史很多，其间随意毁

誉，传闻异词，必有诋毁本朝之语，应乘机查办一番，尽行销毁，杜绝、禁止邪说，以正人心而厚风俗，……至于各省已经进到的书，全交四库全书馆检查，如有关碍的，即行撤出销毁！”而早在头一年的4月、6月，他就两次提出：编《四库全书》时，对古籍中的一些，“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的应予删改。这样，修《四库全书》的同时，也就来了中国封建社会里规模最大的一次焚书！仅浙江一省，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就毁书24次，毁掉书籍就有538种、13 862部之多！江西有个叫海成的巡抚，仅乾隆四十一年（1776），就搜缴了禁书8 000多部！总计乾隆时期，焚毁的禁书共有71万卷。乾隆皇帝在焚书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空前的！

但是，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毕竟是大有益的盛事。而参加编纂的学者戴震、纪昀等，还把《四库全书》中每一部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写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其溯源彻委、扶奥提纲之功，又使读者如驾轻车而就熟道。《提要》还嫌浩繁，又刊行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四库荟要》，更方便读者了。

七、“时代王子”登高峰

——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小说至于明、清，一跃而为时代的王子。明代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不论就其产生之早，还是就其质量之佳，均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名。而清朝的鼎盛期出现的完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而进行创作的小说《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和《红楼梦》，则一跃而登上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成了世界文坛上的瑰丽辉煌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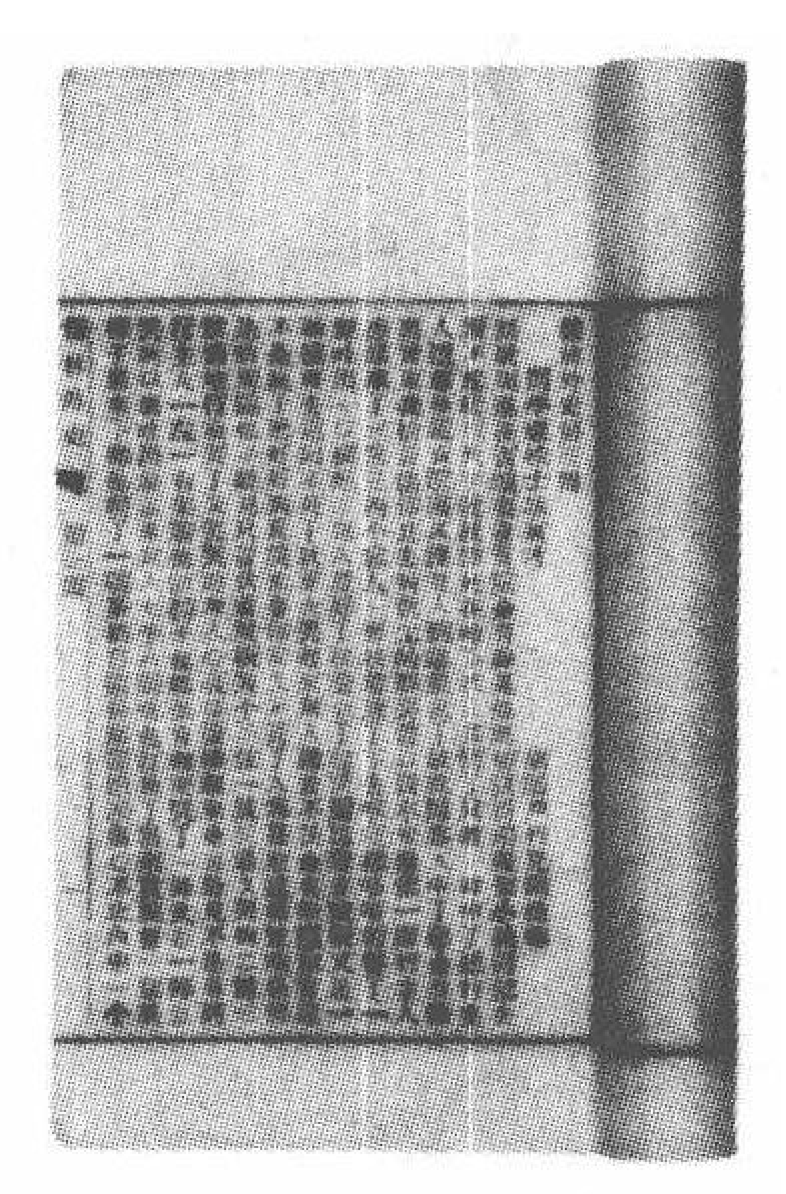
清朝经过康熙、雍正时期的生息发展，到了乾隆时期，真是有如日上中天，臻于鼎盛。然而，大抵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即已开

始显露其逐渐转衰的端倪。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便是这种日中留阴影、鼎盛现衰微的真实记录。


吴敬梓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吴敬梓（1701—1754）是安徽滁州全椒人，出生于一个书香仕宦家庭，23 岁时死了父亲，祖父给他遗留下来二万多两银子的家产，也因他好交乐施而不数年挥尽，弄得不时断炊。但他性格豪爽，得钱仍是饮酒歌吟啸呼，未尝一日为贫困而犯愁。安徽巡抚赵国麟素知其才，以博学鸿词推荐，他竟辞而不就。他对科举制度所暴露出的腐朽性，深恶痛绝，因而，尽管环堵萧然，却仍拥书自娱；冬日苦寒，只得用走路来“暖足”。他 54 岁死于扬州，生前所著《文木山房诗集》七卷、文五卷、《诗说》七卷，可惜都佚失了。

《儒林外史》假托写明代中叶的社会生活，通过众多的人物和情节，无情地批判了清朝统治下的封建制度，尤其着重地反对了科举制度和讥讽了那些追求功名的人，生动地刻画了上至翰林（如汤知县、施御史等）下至井市斗方名士的酸陋无耻的形象，真实地表现了科举制度如何摧残文人（如范进、周进）的青春、智慧和灵魂，使他们变得麻木、愚蠢甚至卑鄙恶劣（如匡超人）。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还通过王玉辉的女儿“殉节”等故事，批判了封建道德，指出了旧礼教已不得人心、必然走向破产，那些假道学先生、封建的迷信以及轻视妇女的意识，也遭到了无情的讽刺与鞭挞。

对于地主阶级的贪婪吝啬的本性，至死不忘钱财的守财奴的本质，《儒林外史》也有极

为精彩细腻的刻画。

《儒林外史》不光是批判讽刺了那充满了污七八糟、愚蠢残酷的社会，而且也描写了一线光明，讴歌了一些真正善良的人们。第一回中的王冕，就像他自己所画的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不慕功名的杜少卿，不但喊出“秀才不见得强似奴才”的口号，而且反对轻视妇女、反对纳妾，尊重妻子、携妻游山，弄得旁观者“目眩神摇，不敢仰视”。最后一回里，更写出市井中出现了四大奇人：擅长书法的会遐年、棋手王太、开茶馆而又会画画的盖宽、会做诗的荆元，他们不为功名，劳动之余琴棋书画，显然是有真才实学。

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新经济因素尚很幼弱，因此，使他没能发现医治社会疾病的妙方，更不能勾勒出新社会的蓝图，却幻想恢复古代的礼、乐来治天下。但是，他对当时社会的无情鞭挞，他所开创的独特的结构方式（作品中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让众多的人物各自表现时代生活的某一个别生活的某一方面，若断若续地反映整个时代的全貌），却开了清朝现实主义批判小说的先河，竖立起了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光辉里程碑。法国的百科全书评价《儒林外史》是“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确实堪与果戈里、菲尔丁的作品媲美，而其诞生的年代却比果戈理、菲尔丁的作品诞生的年代早得多。《儒林外史》是与它同时代的《红楼梦》的姊妹篇，它和《红楼梦》是同时代的两部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曹雪芹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1724？—1763），汉军正白旗人，祖先是内务府包衣，曾祖曹玺、祖寅、父頫，都是清朝政府的江宁“织造”官。曹玺的妻子曾是康熙皇帝的乳母，曹寅还当过康熙皇帝的侍读，因此，康熙皇帝南

巡时，曾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曹家可谓显赫一时。曹寅藏书极多，又精于书法、校勘、诗文，不仅奉命刊印过《全唐诗》，而且和《长生殿》的作者洪昇等诗酒往来。曹寅死时，雪芹尚未出生。但这一切，后来无疑给少年的雪芹以莫大的影响。

然而，好景不长。雍正时，雪芹家被削职、查抄、遣回了北京；乾隆时，曹家再次受到打击。往昔的繁富，化为灰烟，少年的舒适，转为成年的竭蹶。曹雪芹全家，住在西郊，竟过着喝粥赊酒的日子！也好，困苦玉成了他，乾隆十九年（1754）以前，即他31岁以前，却开始攀登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写起伟大的、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杰作《红楼梦》来！家事的衰落，社会的颓倾，尽聚于他的笔下，他用血和泪辛勤地书写了20来年。当他刚写到80回[①]的时候，他的爱子又夭亡了，这更增加了他这个末路人的莫名的哀伤。乾隆二十八年（1763）2月13日（大年三十），这位年仅40余岁的世界文学巨匠，终于在穷愁潦倒中与世长辞。

《红楼梦》描写的是贾、史、王、薛四大官僚地主家庭的衰亡，而客观上揭示的却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命运。

曹雪芹在梦一般的哀愁伤感中，一面为它们唱着挽歌，一面却在诅咒它们。《红楼梦》渗透着颓废厌世的色空，却又细腻入微地揭示着封建社会行将寿终正寝的厄运。它的社会意义无比深刻。至于它的艺术成就，更是登上了空前的高峰。它一共塑造了232个男人、189个女人，合计400多个人物[②]的不同形象，它打破了当时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八股气，也突破了古典小说结构上的传统写法，人物的交替、情节的变换、故事的运行，有如层波起伏，断无停滞、中断、缝合，而是层层依连、浑然一体。它文笔平

---

① 今天看到的120回的《红楼梦》，后40回是高鹗补写的。

② 关于《红楼梦》里到底写了多少人物，从嘉庆年间一直到今天，读者始终未能彻底查清，说法竟有12种之多。同治、光绪年间的寿芝说有398人，算是人物最少的一种说法；近人或今人则认为多达985人或975人。

实而又绚丽多彩，语言明畅而又生动贴切。它不仅是清代鼎盛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杰作，而且是中国悠久历史中的不朽巨制。

清朝鼎盛时期的小说创作，不愧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小说创作的最高峰。

八、京剧与诗、画

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统一，各地文化联系自然加强。

乾隆年间，各地的土戏非常活跃：汉调、京剧、徽调、川调、二黄调、弋阳调、高阳腔、山西梆子、陕西西皮等等土戏腔调（总称为“花部”，也叫做“乱弹”），因为文词通俗、故事生动、音调和谐、内容丰富，大受当地人民的欢迎，所以，以前词曲典雅的昆曲①和传奇，就渐渐开始冷落，甚至有些“无人问津”了。有个文人曾经记载：乾隆初年，戏院里上演昆曲，听者竟“哄然”一下散去。



程长庚

湖北黄冈、黄陂地方有一种土戏叫“皮黄”（后来也叫“二黄”），腔调婉转动听，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流传到安徽，安徽人也很喜爱。久而久之，便与徽调融为一体，后来，又吸收了汉调和秦腔（西皮）的一些腔调，尤其是西北地区的秦腔，它音调高亢，与二黄的婉转一结合，很快就在南方流行开来，南方各省人民都愿意听它。乾隆皇帝也很爱听戏，安徽的四大戏班便纷纷赶到北京，在北京进一步争夺听众。四大班中

① 明代嘉靖年间，江苏昆山乐工魏良辅和剧作家梁辰鱼合作创成，用笛、管、笙、琶合奏演唱的一种流行的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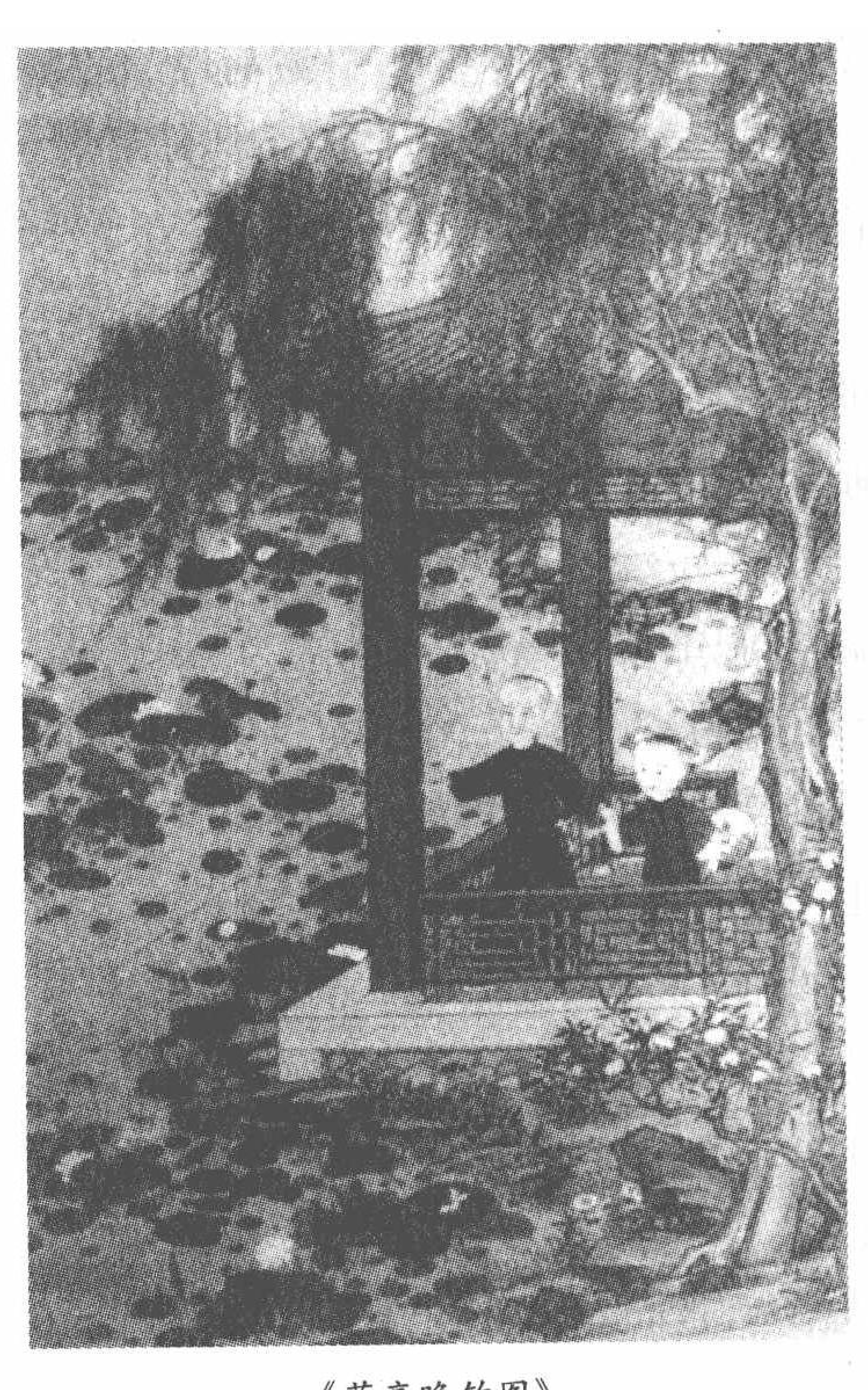
有个三庆班，主持人叫程长庚，这是一个很有头脑的竞争者。他把昆曲、徽调、汉调（二黄）、秦腔以及北京地区流行的皮黄等腔调中的优越处，统统融合起来，又专门聘请了学问高深的卢胜奎在班中编剧本（如《全本三国志》、《东周列国志》等），并特殊笼络了许多的名演员，结果，一下子轰动了京城，往往一个剧反复演了半年还是满座，不久，即被朝廷认定而加以提倡了。这就是京剧的来历。

与昆曲比较，京剧文字通俗，词句不拘长短，声调和布景也较多样，兼之其中又吸取了昆曲的精华，各种土戏腔调（主要是秦腔、二黄）和京调（皮黄）的优点，因此，它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各地都大受欢迎，迅速地成了中华民族古典戏剧中最有生命力、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嘉庆以后，无论是大河上下，还是岭南塞北，也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市民宵小，到处都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人人几乎都能哼哼它的曲调了。

乾嘉时期，诗风也有相当的变化。清初一些诗人骚客，多发故国之思，多作兴亡之叹，他们耻于事清、厌恶科举，也揭露清朝一部分黑暗。这时最著名的，是“江左三大家”，就是江苏常熟的钱谦益、江苏太仓的吴伟业、安徽合肥的龚定孳。钱谦益虽曾事清，但又眷恋于亡明，被清朝统治者视为“二臣”，他的《初学集》、《有学集》还被列为“禁书”，烧掉了。吴伟业临终时很以自己曾经事清为耻，嘱咐家属，墓碑上只写“诗人吴梅村之墓”。他也确是无愧为诗人，他的歌行体写得最好，《圆圆曲》、《永和宫词》都被广为传诵。乾隆皇帝很爱写诗，经常与群臣唱和，又到处题留不断，收集在他的三集“御制诗集”中的，共有 24 240 多首。其《乐善堂集》里的，还不包括在内。不过，他的诗，不少是臣子代作，自作的也并无什么突出的优点。然而，乾隆、嘉庆时期诗人很多，描写的范围、题材，都比清初广泛得多。它们再不像一滴水珠，只反映出一片风景，而像一面大镜，映出了整个社会的生活。这时，又有新的“江左三大家”：袁枚、蒋士铨、赵翼。有人评论

这三人道："袁像通天神狐，醉了才露出尾巴；赵像东方朔的正谏，时常夹着诙谐；蒋则好比剑侠入道，总是杀气腾腾。"关于诗评的专著也多起来，沈德潜的《古诗源》、袁枚的《随园诗话》都很有见地。嘉庆时，名诗人有舒位、陈文述等。乾、嘉时期的诗风，或细腻、或缛丽、或飘宕、或流利，或织春花于锦绣，或竞秋草于芬芳，较之清初是绚丽多彩得多。

清代中叶的绘画，比清初又有了大发展。清初，遗老派画家有工于山水竹石花鸟的朱耷（八大山人）和工于人物的肖从云等，拟古派则有"四王"和"六大家"[①]，还有专用指头作画的高其佩，参与过圆明园设计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王原祁是王时敏的孙子，其画很受康熙皇帝的欣赏，大多供奉于宫廷之中。吴历、恽寿平、沈诠等，都以写生为名，形成清代特有的写生派：吴历画山水，吸取了西洋的一些画法，也常和郎世宁合笔；恽寿平见石谷山水画特出，不忍作天下第二，就改画花卉，独创一格；沈诠专画花鸟、动物，雍正九年（1731）至雍正十一年（1733）到过日本长崎，对日本的绘画产生过巨大影响。西洋画和西洋画法，自清初以来，在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影响。郎世宁的《准噶尔贡马图》等画，无论在反映社



《荷亭晚钓图》

① "四王"指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加上吴历和恽寿平，合称"六大家"。

会生活或画法上，都堪称风靡一时的佳作。

乾隆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恢复和发展，还出现了一大批靠卖画为生的人，著名的有“扬州八怪”（金农、罗聘、郑燮、李鱓、黄慎、汪士慎、李方膺、高翔）。他们的画，抒发个性，风格新颖，题材也广泛，融合了各代绘画之长。

雕刻方面，也发展到十分的精细。乾隆初，有个叫杜士元的雕刻家，竟被人们称为“鬼工”：他能在橄榄核、桃核上刻出非常精致的图画。他的《东坡游赤壁》，堪为空前的精工。小小的核上，船、篷、樯、橹、柁、帆、篙清晰分明；船上七人，又各有风姿——苏轼须髯飘飘，巾袍鲜明；佛印正冠危坐，禅衣长垂；从客手持洞箫、启窗外看；船头童子，持扇烹茶，茶盘上有茶杯三盏；驾船的三个人，又复两坐一卧，形容各有不同。

社会经济的繁荣，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年画（版画）的发展。清朝鼎盛时期，印制版画的地方很多，最有名的是天津的杨柳青①和苏州的桃花坞。整个清代，杨柳青山版的年画，共有 2 000 多个品种；较大的画铺有 12 家，每家都有十几个刷画案子，戴廉增一家每年就印制 100 万张年画。桃花坞是南方版画的中心。桃花坞的版画，深受明代木刻画和铜版画的影响；杨柳青则体现出宋、元、明绘画和清代画院木刻画、透视画法的风格。雍正、乾隆时期，年画的内容也广泛起来，神佛僧道、山水楼台、丰收场景、古今故事，皆入画图。

版画的发展，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也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艺术的要求。和那些宫廷画师相比，年画的作者们实在是广泛地从事着艺术的普及工作，较之清初的艺术又算是一大进步。

---

① 后来，北方人民将天津杨柳青、南乡炒米店和东丰台三处所制的年画本身，也称为“杨柳青”。

九、《畴人传》

——清朝鼎盛时期的自然科学

嘉庆、道光年间，有个人叫许小欧的，在《三异笔谈》里写道：他曾亲眼见到有个人做了一套“马脑草虫百科”，只见许多“草虫”藏在一个柜中，那柜子好像中药铺里的百眼箱一样。那虫子，大的像蟾蜍，小的像蟋蟀，它们一个个须眉齐全、灵动如生。只要那人在桌柜背上先铺好毡毯，然后用走绳一拽，那许多的虫子便纷纷跳跃而出，弄得满案缤纷；只要那人振动一下开关，它们就又蜂拥入柜，柜门也自动关上。

他说，做此“奇巧设计”的，不是别人，就是有名的阮元。

阮元（1764—1849），本是朝廷的大官，做过兵部侍郎、浙江巡抚，对经学颇有研究，但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也很浓厚。还在很年轻的时候，阮元就写了《考工记车制图解》（二卷），绘图说明古代造车之法。做巡抚时，选出许多高才生，集中在“诂经经舍”里，读经、读史，也读天文、地理，学算法。嘉庆十五年（1810），他做国史馆总裁，专门为清代的知识分子开辟《儒林传》，搜入传的，共146人。后来，又将其中天文、算学方面人才的事迹收辑起来，著成《畴人传》八卷。

阮元是清代第一个专门为科技人员树碑立传的人，他本人也算得上一位科学家。他对机械制造、钟鼎文字、考古学和天文、算学都有一定的研究。

清朝鼎盛时期的天文、算学家，最著名的是梅瑴成、明安图、王贞仪等人。梅瑴成（1681—1764）是梅文鼎的孙子，他把祖父的著作35种，完整地收入《梅氏丛书辑要》一书中，自己的著作，也附在书后。他主编的《律历渊源》，包括《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和《律吕正义》三部书，不仅是天文、数学的百科全书，

还总结了音乐知识。明安图（1692—1765），是我国蒙古族人。幼年时被选入“钦天监”学习，学得很刻苦，成绩很优异。后来，他见有的传教士在用解析方法求圆周率上故弄玄虚、愚弄中国人，便更发奋自强，钻研30多年，撰写出《割圆密率捷法》[①]，即创造出“割圆十三术”，独立地论证了法国传教士秘而不宣的求圆周率的三个公式（圆径求周、弧背求正弦、弧背求正矢）的“立法之原”，并创造出超过当时世界水平的十个新公式，第一次突破了用几何方法求圆周率近似值，采用解析方法来计算圆周率，用连比例归纳方法证明割圆术的13个公式。人们誉明安图为“弧矢不祧之宗”，说他父、子（明新）“堪与北齐祖冲之父子媲美”。乾隆时期，还出现了一个“尝拟雄心似丈夫”的女天文、算学家，这就是安徽泗州的王贞仪（1768—1797）。王贞仪幼年时就博览群书，对梅文鼎的科学著作尤其爱读。她精通了梅氏的天文、算学，学会了父亲的医学卜术，夜里还坐观天象。为了搞清月望、日食的道理，她竟用灯笼当太阳、圆桌当地球、镜子当月亮反复实验。她在不断吸收古人、洋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重订策算证讹》、《西洋筹算增删》等数学专著补充和纠正了它们的不足。王贞仪仅仅活了29岁，但是，她却写出了50多卷包括哲学、文学、天文、算学等各种学科的著作，只在《德风亭初集》（14卷）里，就有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论文十篇。

清朝鼎盛时期的农学家，以杨屾最为突出。杨屾（1699—1794）是陕西兴平桑家镇人，以教私塾为业，也从事一些农业生产和养蚕植桑的事。雍正三年（1725），他从山东沂水引来柞蚕种，雍正七年（1729）又从江南引来桑蚕种，在关中试养，都获成功。他还通过试植桑树，摸索出一套培育桑树的好方法，于是把当地植桑养蚕的古今记载和经验，总结成一部名著——《豳风广义》。杨屾还根据当地农民和自己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用了十年时间，写出了另一部名

① 初稿于1763年完成，1774年其子明新等最后完成。

著——《知本提纲》，书中对耕稼、园圃、蚕桑、树艺、畜牧等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例如施肥，就要注意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土质，使用不同的粪肥：春季用人粪、夏季用草粪、秋季用火粪、冬季用骨蛤肥；高燥地用猪粪；麦、粟用黑豆肥等。名为“提纲”，讲得却较详细。乾隆七年（1742），官修的《授时通考》，更是一部集历代农业生产技术大成的巨著，对农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影响更是不小。

乾隆四年（1739）到十二年（1747）官修的《医宗金鉴》，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名著，它对医学经典《金匮要略》和《伤寒论》等书作了不少考订，并征集了许多家藏秘笈和世传经验良方。雍正年间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将我国18世纪以前的大部分医学文献全汇集起来了。康、雍、乾时期，还出现许多私人撰注的医学专著，出现了许多有独到专长的名医。江苏吴江的徐大椿（1693—1772），是著名的内科医生，有《医学源流论》等十多种专著，善于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受病的不同部位、致病的不同原因施治。江苏吴县的王维德（1669—1749），是著名的外科医生，著有《外科证治全生集》。康熙年间的夏禹铸，乾隆时期的陈复、庄一夔，都是有名的儿科专家。康熙时，工于书画篆刻的傅山，对妇科也有独到的研究。康、乾之际，江苏吴县的叶桂（1667—1746），更是鼎鼎有名的传染病专家，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的《瘟证论治》，就是他祖孙几代，尤其是他一生行医的成果，是一部传染病学的名著。和他齐名的薛雪和比他稍晚的吴瑭、王士雄等，都在传染病的理论与实践上有深入的功夫。在药物学方面，赵学敏、吴其濬也有杰出的贡献。赵的《本草纲目拾遗》，补充了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遗漏的716种药物；吴其濬则通过30年的调查，积累成《植物名实图考》，图考了植物1 714种。

齐召南，是清朝鼎盛时期最有成就的地理学家之一。他看到郦道元的《水经注》对祖国东南的水道记载不详，又见顾炎武的

《今水经》详于南水而暗于北水，便作了《水道提纲》来补充。

清代鼎盛时期的建筑，比明代更加细致精美。这时的建筑艺术，几乎凝聚在全部的“官式”建筑中。承德避暑山庄，集中了南北各地的建筑优点，表现了全国各族建筑的风格；北京圆明园的建筑，更不仅荟萃了全国名园的精华，而且综合了中西建筑的成就。它们都是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世界建筑艺术宝库中的精品。

承德避暑山庄，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分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宫殿区有正宫、松鹤斋、东宫、万壑松风四组建筑。苑景区包括湖区、平原区、山区。湖区洲岛错落、碧波荡漾，富于江南水乡特色；平原区西部绿草如茵，东部林木苍翠，颇似蒙古草原风光；山区峰峦陡峻、峡谷幽深，为避暑和登高远眺的处所。山庄内有楼、堂、馆、阁、轩、斋、亭、榭、寺、观、庵、庙等建筑一百余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题名的就有72处）。规模宏大的山庄外围，武烈河东岸和狮子沟北沿的山丘地带，还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间，陆续修建了11座宏伟壮丽的巨大的喇嘛庙（乾隆时修了九座），它们（除康熙时修的溥仁寺和溥善寺外）都面向皇帝居住的山庄，以山庄为轴心，在东面和北面整齐排列，形成一种百川归海、众星捧月的态势，象征着边疆各族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形成了建筑史上的奇观。这些寺庙金碧辉煌，气魄恢宏，造型精湛，具有汉、蒙、藏等不同民族风格的特点。

而圆明园，则与法国的凡尔赛宫，同称为世界两大奇迹，它被誉为“万园之园”。它原是明朝贵族的一座废园（武清侯李伟清华园旧址），康熙四十八年（1709），玄烨把它赏给皇子胤禛，并开始建筑，赐名“圆明园”。乾隆皇帝又将它大为修建：东边修了长春园，东南圈入了绮春园。长春、绮春、圆明三园相连，合称“圆明三园”，方圆20里。圆明三园与和它相通的熙春园（在今清华大学校园内）、春熙院（在今北京大学校园内），又合称为“圆

明五园”，方圆则达30里了。圆明园以水景为主。园内小山都是用挖湖的土方堆成。玉泉山水屈曲东北流，形成的奇湖妙泊占了全园的二分之一的面积。湖畔石阶，围砌着汉白玉栏杆。各具特点的建筑，形成了一百零八景；每一景又各有大小不一的殿、阁、楼、台、廊、榭、轩、馆。桥有圆孔、莲瓣孔、拱尖孔，形状也各异，木石各别。“正大光明”殿，是皇帝会见群臣的处所；“万方安和”殿，建在水上，冬暖夏凉，是皇帝留宿久住的地方；福海东岸的“接秀山房”，紫檀作柱，尽嵌珠宝；福海中心的“莲岛瑶台”，烟波浩渺，有如仙境；“海岳开襟”，则殿楼高耸，俨若海市蜃楼。长春园之北，有西洋式的楼群，仿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加上中国自己的某些风格，简直令人目眩神飞。琉璃瓦的彩色，覆盖着异国风光的汉白玉石大的柱，柱上布满了浮雕。这块狭长的地带，由西向东，还耸列着“谐奇趣”、“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和“线法山”。“谐奇趣”的汉白玉柱，一色罗马式，正楼两侧是五色琉璃八角亭，楼前是喷水池。“海晏堂”西的三角形喷水池，两边还排列着代表12时辰的12种动物的雕像，每一动物各按自己所属的时辰喷水两小时，它们构成了一座巧妙有趣的喷水时钟。这也充分体现出清代鼎盛时期建筑科学家、物理科学家们的高度的智慧和精巧的设计。

第八章　清朝的转衰和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

一、“富贵如花”、“贫贱如草”

乾隆皇帝即位初期，励精图治，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科学上都有所发展，达到了清朝极盛的顶点。但是，中叶以后，土地集中现象极为严重，统治阶级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大小官僚贪污成风、鱼肉人民，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因而埋下了清朝中衰的种子，导致了长期积弱局面的开始形成。

封建阶级剥削农民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占有土地攫取地租。乾隆中叶以后，土地兼并之风，更是日甚一日。

乾隆初期，有个漕运总督叫杨锡绂的上疏奏道：“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而到了乾隆末年，则有人记录说：“（如今）占田者十无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不到十分之一二的人，兼并得大量的田地，其余十分之八九的人，不是沦为佃户，就是变成乞丐或流民，这已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无田可耕而又无资充佃的农民，只好跑到城市里出卖劳动力和当乞丐，或者逃亡到边疆和偏僻地方谋生了。嘉庆元年（1796）二月，“十全老人”和嘉庆皇帝居住的北京城的一个寒冷之夜，冻死街头的乞丐就有八千人，可见当时乞丐之多！而从康熙末年起，

河南、山东、直隶等省的破产农民，到口外开荒种地的就多至十余万。湖广、广东、江西等省的破产农民，雍正时期，跑到四川糊口的，也不下数万人。乾隆中叶以后，这种赖出口外以资生计的破产农民的人数，不但继续突破政府的封禁而有发展，而且，各省的深山老林中的“棚民”也越来越多。川、陕、楚边界的南、巴老林中，土著人民还不到十分之一二，湖广的流民却占了十分之五，江西各省的流民则占了十分之三四！

背井离乡、流落异地的流民不得温饱，故土难离、忍气吞声的佃农，也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而占有绝大部分土地的官僚、地主和富商，却一个个锦衣轻裘、食不厌精。

真是“富贵如花”、“贫贱如草”，土地高度集中以后必然这样。

二、从“太平之君”到“散财童子”

——乾隆皇帝的无度挥霍

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中叶以前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发达、国力强盛，每年收支，至少都能结余五百万两以上。

然而，谁能料到，乾隆末年，库存却已告匮，年剩二百万两，一遇灾荒，除了变相加赋，同时大开捐纳，便毫无办法！

大量的积贮、大宗的收入，跑到哪里去了？除了军费、河工、宗室俸禄和官吏俸禄、养廉之外，官吏的贪污和乾隆皇帝的铺张浪费也是一笔大消耗。



乾　隆

乾隆皇帝大修避暑山庄，所费亿万，大修圆明园，也不下亿万。

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宪皇后六十大寿、七十大寿、八十大寿，以及乾隆皇帝本人

八十大寿之日，那就更是大肆挥霍之时。

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五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七次东谒三陵，两次巡游天津，一次登赏嵩山，一次游览正定，多次避暑热河，加之“十全”用兵，又费军费一亿二千万两以上，乾隆四十七年（1782）还增加常备兵额六万名，岁添饷银三百万两，因此，他确实是大伤了祖宗积聚起来的元气。有人曾经打比方说：乾隆皇帝“好像一个纨袴子弟，得了先人丰富的遗产，穷奢极欲、富丽堂皇”，结果，成了清朝盛衰转变的枢纽。这话，不能说毫无道理。

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乾隆末叶官吏的贪婪

月色明如许，嗟余困不伸。
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
……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
……

这是在乾隆末叶当了二十多年大官的和珅，入狱之后写的一首诗。

和珅怀的什么“才”，犯的什么罪？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他的历史：他，姓钮祜禄氏，是满洲正红旗人。由于他的高祖尼牙哈那有军功，他承袭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但他本人，乾隆中叶还只不过是咸安宫

和珅

官学里一个小小的官学生，乾隆三十四年（1769）才被选充拜唐阿[①]，在銮仪卫里当差。一天，乾隆皇帝要坐了御轿出去，黄盖却找不到了，于是厉声责问："究竟是谁的过失？"和珅应声插嘴："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皇帝循声看去，觉得和珅仪度俊雅，不禁有点欣赏；一路上问他四书、五经，和珅奏对得也很不错。巧言令色的和珅，从此开始，逐渐博得了乾隆皇帝的信用。[②] 他很快当了仪仗总管、侍卫，不久升为副都统、侍郎。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月，又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乾隆四十二、四十三年（1777、1778）间，便由尚书授大学士，逐渐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专了朝权。乾隆四十五年（1780），儿子丰绅殷德，还娶了乾隆皇帝的第十个女儿——和孝公主。自此以后，和珅更是外结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掌官吏任免、财政收支、刑法诉讼、谏议策划、政令公文。他的弟弟和琳当了都统，他的亲家苏凌阿当了大学士，甚至他早年的师傅等也当上了御史、侍郎之类的京官，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说明和珅一上台就注意"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

和珅每天上班入朝，文武大员都要伺立道旁，夹道迎送。人们称这迎送的人墙为"补子[③]胡同"，还有人描写道：

绣衣成巷接公衙，弯弯曲曲路不差。
莫笑此间街道窄，有门能达相公家。

由此可见和珅威权之重。

和珅权越大，胆也就越大。他的特点是最爱榨取钱财和收受贿

① 满语：执事人。

② 有的野史、笔记说：和珅之所以被乾隆重用，是因为他长得很像乾隆年轻时爱过的一个父妃，该妃被赐死时乾隆曾抚尸说：若有缘，请在20年后重逢。事虽荒诞，却也可见封建帝王的任人标准。

③ 清代，官员着青色贡缎外褂，胸前、背后各绣彩纹一块（亲王、郡王绣圆形），称"补服"，俗称"补子"。

赂。就连皇子永锡要承袭肃亲王的爵位，也被迫把前门外两所铺面房送给了他。给他送银子几百两至千余两的人名，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甚至下面给皇帝的贡品，上等的也先被他扣下。

嘉庆四年（1799）2月7日，89岁的太上皇乾隆皇帝死了，第三天，给事中广兴、御史王念孙等就向嘉庆皇帝揭发和珅；三天之后，嘉庆皇帝就宣布他有20大罪，把他逮入监狱，十天之后，下令赐死。在逮捕和珅的当天，查抄了他的家产。

和珅的田产共8 000千顷。在蓟州，他还造了坟茔，茔中立了享殿，开了隧道，人们称之为"和陵"。

和珅寄顿移挪的东西不算（有个叫萨彬图的官员，就提出还要继续追查，嘉庆皇帝不同意）只据嘉庆四年（1799）2月11日嘉庆皇帝所说：查出没收的和珅家产109号，83号还没估价，单算已估价的26号，即合银223 895 160两！若按近人梁启超的估计，和珅的全部家财，则有八万万两之多！和珅得宠不过20多年，积赃竟至数万万两，全国大大小小的贪官，又不知一共敛聚了多少，人民遭受的压迫剥削程度岂不可想而知！

四、"大元帅"与"草鞋"
——人民的秘密结社

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等名，会内自称"洪门"。有人说，它起源于顺治初年；也有人说，它起源于郑成功经营台湾之际。"洪门"是借用明太祖的年代"洪武"表示拥护明朝，实际上它原来也确实是反满派志士反清复明的斗争工具。清朝的民族压迫（薙发、改衣冠、屠城和迁海等），使它得到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满、汉地主阶级合流，统治渐趋稳定之后，满、汉畛域亦未消除（满官地位优越等），明朝一些遗老遗少就"祝发入道"当和尚，有的还参加农民起义军（如康熙时张念一奉"朱三太子"

起义的军中有僧洞然，朱一贵起义军中有“异眼怪饰”僧和万和尚）。康熙年间，活动在以川、黔为中心的西南、西北、长江流域的“留汉”（后来叫“哥老会”），也是一个秘密反清的组织，它和天地会是同一起源。清朝的高压政策，迫使这种组织，从雍正十二年（1734）以后转入地下，但乾隆初年，它们却在各省广泛活动了。

清朝官方文献最早提到“天地会”的，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而它的正式创立（命名“天地会”）却在乾隆三十年（1765）前后。福建漳浦人洪二和尚（本名郑开，法名提喜，乳名洪）是它的创始人。它的创建地，是广东东江、北江、西江三江汇合处一带。它很快发展到了福建、台湾、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各省和南洋诸国。清朝的民族歧视和乾隆中叶以后阶级矛盾的渐趋激化，给它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起初只是一种迷信色彩较淡薄的，以广东三江汇合处的肩挑负贩者、小商贩、小本营生者以及其他一些贫民流浪者的互助组织，成员之间平等、团结、嫉恶如仇、打抱不平，所以又叫“兄弟会”。但是，很快得到了南方各省人民的广泛拥护，一些明朝的遗老遗少、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只要是有旧会员介绍，又习了暗语的人，香主便在城外设场，以演戏、放马为名，举行吸收仪式加以吸收。这样乾隆末叶，天地会到处山堂林立，人们不论身处何地，只要隐语相通、暗号相符（喝茶、抽烟俱用三个指头；大、二、三指代表天，四指、小指代表地；大指、二指代表人，等等），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同志。

天地会最初的宗旨、口号，是“顺天行道”、“争天夺国”，后来更明确地提出了“反清复明”。入会誓文有36条，会规有21则，此外还有十禁十刑，内容大抵是抗清不降、义气相帮、勇斗不畏、严禁淫诓。天地会的诗歌有六七百首，不少首明确提出反清，其一说：

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
养成锐气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

对联也有：

身背宝剑游我门，手执木棍打江山。

可见，它反清主张用暴力手段。这较之明末清初的“复社”、“畿社”、“明社”、“雪苑社”、“惊隐诗社”、“望社”以及后来的“西湖诗社”等等单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会社，是强得多的，比它们那种“乐志林泉、跌宕文酒、角巾野服、啸歌于五湖三卯之间”的斗争方式，积极得多。

天地会的结合比较自由，组织也较分散。

哥老会，乾隆末叶也有发展，到19世纪太平天国失败后，它更广泛地发展起来。成员间兄弟相称、义气相结，首领称“掌柁”或“正龙头”，下设内八堂（副龙头、坐堂、陪堂、刑堂、理堂、执堂、盟堂、香堂）和外八堂（心腹、当家、管事、福禄、巡查、大九、小九和老么）等，会员不论身份，不论士、农、工、商、文、武、贫、富，都得拜师傅。只有血统不纯粹（有满族血统）的，以及剃头匠（因为他们曾为清朝搞过薙发）、轿夫（因为他们接近官员）和伶人（因为他们为官僚演戏）才不得加入。哥老会的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性质，从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宗旨，也是“反‘满’复明”。

乾隆末叶土地的高度集中、官吏的疯狂掠夺等，使另一系统——白莲教系统的秘密结社也发展起来。

清朝很早就禁止结社，但是人民却希望过好日子。白莲教适应了人民的要求。它提出了“红阳（指现在）劫尽，白阳（指未来）当兴”、“清朝已尽”、“日月复来属大明”的口号，又信奉“同教人都生于天宫”、都是“无生老母”的儿女、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平等，主张同生死、共患难、“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而且还要“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共同享受。这一切，对于广大劳

动人民，尤其是那些破产而漂泊无定的流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白莲教还通过给穷人治病、教拳等方式扩大影响，并常常把经文编成歌词，配上民间小调，击渔鼓、打竹板、说说唱唱来传教，因此，它就更广泛地得到了流传。

像天地会后来衍生出许多支派、名目（如三星会、小刀会、匕首会、棒棒会、三点会、三合会、仁义会、孝义会、双刀会、江湖会、在园会等）一样，白莲教也有许多的分支（如罗教、清水教、圆教、长生教、弘阳教、天理教等）。

乾隆末叶，白莲教得到了大发展。福建、台湾一些地方，罗教教堂竟有74座，福安一县，从教男女即有2 600多人。云南大理人张保太，自称是49代收园祖师，影响及于贵州、四川、湖北、江苏、山西等省。

天地会、哥老会，大多只是个人参加；而白莲教，人们则往往是举家齐入。老头儿、老太太、大人、小孩、妇女，甚至许许多多的寡妇，也都公然加入，他（她）们练习拳、棒，练习气功，画符念咒，每月还利用一两个深夜，男女毕集，传授秘技。总之，他（她）们是随时准备参加战斗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就率领清水教徒，在山东发动过农民起义。

秘密结社，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在清朝统治者高压政策的逼迫下的一种革命的（当然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组织形式。乾隆中叶以后，这种形式广泛地被汉族人民利用了；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人民，则大多直接地发动起义斗争。

五、西北烽火

——回族、撒拉族人民起义

清朝最高统治者一向推行民族歧视的政策，一向鄙夷回教，一

向贱视回民。雍正皇帝认为伊斯兰教“一无可取”、回民“率皆鄙薄之徒”。乾隆皇帝也说回经“鄙俚者多”。他们不仅把回族人民诬为“回子”、“回逆”、“回贼”，而且，把“回”字甚至也写作“狪”，以表示回族人民“不侔（等）于人类”！

居住在陕、甘一带的回族人民，不满于清朝入关后的屠杀政策，顺治年间，曾在米喇印、丁国栋等率领下，举行过起义，参加的回民有十万人，号称百万。乾隆时期，居住在甘肃省循化厅（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及附近地区）的回族和撒拉族①人民，遭到沉重的盘剥。最初，政府规定：水田下籽一石，交粮一斗五升；旱地下籽一石，交粮一斗。这个负担已经不算轻了，后来，政府还要在正赋之外，按田亩抽厘谷十分之一二。徭役、兵役也不少：征金川、征西藏、征准部、征台湾，打缅甸，都抽调回民和撒拉族人民。受灾，政府发点“赈济”，官吏们从中克扣，装进自己的腰包。布政使王亶望，吃驴肉只吃活的（从活驴身上一脔一脔地割取），吃豆腐得拿肥鸭汤煎煮！此外，朝廷还在循化厅设置“循化营”驻军，并指使地方官员挑起回族、撒拉族人民间的宗教斗争。

以前，回族是十几户、几十户、百户、几百户独立地聚居，各不相属，因此，伊斯兰各教坊也各不相属，教长也实行着聘请制。明末清初，尤其到了清朝鼎盛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间联系的加强，回族中地主势力的增大，于是，西北地区的回族中，便实行了世袭的地主教长制（门宦制）。这种门宦制的教长，既通过租赋盘剥教民，还通过念经勒索羊、布。回族、撒拉族人民，对此很是不满，恰好听说安定（今甘肃定西县）有个叫马明心的，从叶尔羌、喀什噶尔学习回来，创立了一个新教派，主张只诵墨克经，聘诵者不需交羊、布，只交56文“新忏钱”就可以，大家就把他请了来，和总教长韩哈济唱对台戏。早就和官府通气的韩哈济，再

---

① 甘肃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个少数民族。

次报告官府，官府便派兵把马明心撵回，韩哈济依仗官府又不断向新教派挑衅，使矛盾越来越大了。这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事。

但是，新教派却在受压抑中不断得到了发展，十二工①的回族和撒拉族人民，竟有九工信了新教！

乾隆四十六年（1781），查家工的苏四十三，干脆请来马明心，要立新掌教，又遭到了旧掌教韩三十八的坚决反对；新教徒忍无可忍，便在苏四十三的统率下，进攻旧教各庄，杀了韩三十八和旧教徒40个。韩三十八的儿子跑到兰州陕督衙门告状，陕甘总督勒尔谨立即派兰州知府杨士机领兵前来，杨士机杀气腾腾，还扬言要清洗新教，这更激起了广大贫苦教民的义愤。4月14四日夜二更，新教徒男女二千，在苏四十三的率领下，袭杀了杨士机等官兵，夺了他们的器械，攻下了河州城。

勒尔谨把安定的马明心抓进了兰州城，起义军便渡过洮河，直逼兰州城下。他们拆断了黄河上的浮桥，使清军不得入援，随即将兰州城团团围住，四面大呼释放马明心。当时，兰州城里只有督标兵八百，在西关与起义军打了一仗，已经损失了三百多，布政使王廷赞强迫马明心登城谕众，未成，杀了马明心，起义军于是更加群情激昂。勒尔谨这时正在河州和起义军打仗，并在循化厅大捕起义军家属，听得消息，星夜赶回兰州城。

消息传到北京，乾隆皇帝大为震惊，一面速遣大刽子手阿桂、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领京师健锐、火器二营两千兵进“剿”，又令西安将军伍弥泰、提督马彪等驰援，一面又指示“以贼（回族，撒拉族中信旧教的人）杀贼（起义军）”。清军凑足了万余，但都落营于城东，不敢攻打驻扎在城西南高地的起义军；起义军又在城西南关外自由往来，清军仍不敢轻举妄动。清军和起义军小有接仗，也都败了，因此，每天夜里都自相惊扰，只好通宵达旦地放枪

① 当时循化地区分十二工（片），工工都有掌教，韩为总掌教。

放炮壮胆。清军中的新兵，一见起义军，更是“惶遽”哆嗦。由于海兰察率旧教回军袭击起义军，起义军才不得不从龙尾山退居华林山。华林山“崖坑陡立，斜通一径”，形势险峻，加之山上牛马驴骡、粮秣火药充足，清军因而还是一筹莫展。乾隆皇帝一气之下，撤了勒尔谨的陕甘总督职，同时下令调来四川、西藏兵一千，蒙古兵七百，共同“会剿”。

6月份，清军围住华林山，开展了争夺西南大卡的车轮战。起初，起义军还是屡战屡胜，后来，起义军见清军又被打败，就回营休息，不料清军的伏兵却突然进行了袭击，占据了西南大卡，并截断了起义军的水源，使起义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起义军突围不成，于是决定继续死守。不幸，8月12日，苏四十三在反击战中牺牲了。清军乘机再次猛攻，被起义军用石头砸退；清军抛掷火弹，妄图烧毁营门，也因天雨而未能奏效。8月15日，起义军撤入华林寺，在韩六十个等的率领下继续抵抗。清军攻之不克，放火烧寺，但起义军没有一个人出来投降，全部在烈火中壮烈捐躯，表现了回族、撒拉族人民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崇高气节。

镇压了华林寺的起义军，清军又扑向洮南、安定、河州、唐家川、洪济桥，大肆屠杀起义军的余部和家属。家属中的女子，统被发配伊犁为奴，幼男全送云南监毙！他们不仅毁了各地新教寺堂，强设“乡约”，不准教民互相来往，而且还叫陕西提督移驻固原，固原总兵移驻河州，对回族、撒拉族人民进行严密的监视。

然而，人民斗争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家住通渭（甘肃）小山的田五（马明心的信徒），就在当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冬天，又开始在远离家乡二三百里的地方，修筑了石峰堡，第二年加固它，在那里聚众礼拜，修造旗帜刀矛，挖窖储粮，以它作为重新斗争的基地。

乾隆四十九年（1784）5月，田五把回族、撒拉族人民的起义队伍部署在伏羌县的鹿卢山、静宁州的底店山、潘陇山，决定六月

四日起义，不幸被内奸李应得告密，只得提前起义了。六月，田五首战负伤牺牲。战友马四圭等率众攻下通渭县城。甘肃提督刚塔强迫回民带路，被回民导入无人之境；西安副都统明善由静宁赶来，中途被起义军伏击毙命。起义军声威大震，顿时发展到几千人，横扫千余里，拿下村庄1 200余处。

乾隆皇帝下令逮捕陕甘总督李侍尧和甘肃提督刚塔，派福康安、海兰察带了火器营二千兵和川、藏、蒙兵万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八月中旬，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回族、撒拉族人民两次起义，使乾隆皇帝尝到了厉害。因此，在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他一方面下令要“诛无孑遗”，一方面也不得不稍稍改变主意，告诫地方官，要他们“设法化导，不可区别新（教）、旧（教）之名，转资犄角也！”这就是说：别再划分什么新教、旧教了，别再挑起矛盾了，无论是新教还是旧教，都要统统设法开导。他害怕回族、撒拉族人民再起义。

六、“贼砍老子头矣！”

——林爽文领导的台湾人民起义

台湾的汉、高各族人民，很早以来就恨透了官府的压迫、剥削。乾隆十八年（1753）、三十三年（1768）就曾竖旗称社（“大肚社”等）反抗过。乾隆中期以后，反清的秘密结社——天地会，大规模地活动起来。乾隆四十九年（1784），漳州人严烟曾在溪底阿密里组织过天地会，但是，台湾天地会的最大组织者还数林爽文。

林爽文也是漳州人，流落到台湾彰化县，住在大理杙庄，靠赶车度日。官吏的贪暴、穷民的困苦，激起了他打富济贫的决心。他于是平时也做“贼”、窝“贼”了。他把夺来的银钱用来帮助穷人，穷人很敬服他，他便号召大家加入天地会。他曾被捕入狱，大

家把他买放出来后，他还是要跟“天朝”作对，还把从诸罗逃来的同志保护起来。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1787年1月），彰化知县俞峻带了大军，跑到离大理杙庄五六里的大墩，勒令庄民擒献林爽文和“逃犯”。这对早就想反抗压迫的广大庄民，不啻火上加了油。

大理杙庄是个大庄，有二三千人丁。在林爽文和其他天地会骨干的率领下，奋战七八天，一举歼灭了这股官兵。第二天，冒着大雨，便向彰化县城挺进，第三天，队伍发展到四千多人，砍倒竹栅，冲进了彰化城。

在彰化，林爽文建立了革命政权，被推为“顺天盟主大元帅”，封了将军、军师及各县、各港官员，造了各色“顺天”、“将军”、“元帅”军旗，留下几百人守城，挥军诸罗、淡水。1月24日，攻下了诸罗。

起义军的另一领袖庄大田，此时进攻凤山。凤山守将、参将瑚图里，领了三百兵驻扎城外迎战。1月31日天刚亮，二千起义军赶到，瑚图里放了一阵枪、炮，就纵马南追，岂知义军却由龟山北门直扑城中，攻入衙署，知县汤大奎自刎。

起义军声威大震，便猛攻台湾府城。在离城50里的盐埕桥，总兵柴大纪负嵎顽抗。起义军先用几百只船从水路攻击，随后又用陆军从山上夹击，水陆两路，旋来旋去，使柴大纪成了“苟延一息，指日便可歼除”的“釜底游鱼”；也使二月份从大陆来援的水师提督黄仕简等不敢交锋。总兵郝壮猷费了50天的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夺回凤山城，但起义军一反攻，他便又弃城逃进了台湾府城。

乾隆皇帝见援兵无力，又派第二批八千人的队伍，叫闽浙总督常青亲自挂帅。常青一到，就杀了郝壮猷、逮捕了提督任承恩，做出非打胜不可的姿态。不过，他既无学问，又不知兵，完全是靠给和珅拍马行贿发的迹，因此，躲在府城里日夜哭泣。这样，起义军在六七月间，已全部占领了离府城十里的各个村庄。常青不详，率

军出城南，离城十里，骤遇义军万余，还没来得及打照面，便吓得哆哆嗦嗦，连马鞭子也举不起来了，大呼一声“贼砍老子头矣！”调转马头，一口气遁回城里，再也不敢出来。他还好几次要弃城逃走，连连谎报“敌兵有法术”，请求再增兵一万，并密札和珅，请求把自己换回大陆。

城南一战，十天之间，起义军剧增到十几万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一月，起义军更增加到几十万人了！

城南战后，林爽文挥军再攻诸罗（柴大纪重占）。柴大纪不敢出战，起义军的火箭便一支支射进城里。柴大纪躲在城里放枪、放炮，起义军又赶制了挡炮车进攻。起义军杀声震天，柴大纪命令敲锣打鼓来壮胆。柴大纪请求援兵，起义军又给援兵以狠狠的打击：早先，从台湾府派来的三路援兵，就遭到了三路义军的围歼。那时，正值大雨，泥泞一片，起义军光了脚板，又早把道路削窄，援兵无从转身、无处可躲，损失非常惨重。蔡攀龙率领的 1 266 人，一下子被歼灭了 620 多个，其中，丧命的头目就有 16 名。

乾隆皇帝叫柴大纪出城“进剿”，柴大纪回禀“不敢”，乾隆皇帝只好再派大军，叫陕甘总督福康安代替常青指挥。

由于林爽文、庄大田分兵作战，又由于福康安等声言直捣大理杙庄，暗地里集重兵疾趋诸罗，与起义军大战于萫子岭、牛稠山，因而诸罗之围被清军解除。

诸罗解围后，清军集中全力猛攻大理杙。起义军败而复合、合而复战、抵死不退，大战一日，杀死许多官军；黄昏，又重整阵势搦战，打着火把进攻清军，不料中了清军的埋伏，被敌人从暗中腰击，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起义军顿时灭了火把，擂鼓冲杀，鏖战不休，直到黎明，才放弃大理杙，走集集埔。

集集埔前临大溪，就高岸，起义军战士更垒石为高墙，周围垒了好几里长。清军仰攻不得手，就偷偷爬上小半天处，打败了起义军的队伍。

林爽文被迫撤进高山族居住的深山，身边的一些将士却又在猫

里社被清军冲散。2月13日，这位起义英雄，在老衢崎不幸被俘。

与此同时，清军抵达南边的千牛庄，袭击了庄大田的队伍，大田走郎桥，负山临海抵抗。清军用舟师封锁海面，进而围困了郎峤山，大田亦被俘。

林爽文、庄大田以及许多起义军将士的家属，被清军残酷杀害了。林爽文、庄大田被凌迟处死，其他一些将士，有的被先挑了脚筋，然后处死。朝廷还将15岁以下（最小的才只有4岁）的起义军将士的后裔，统统阉割，抓到宫里当奴隶！

林爽文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迫使弘历两易主将，调动了广西、四川、贵州、福建、浙江、湖北、湖南七省十余万的兵力，消耗军费银达一千万两。林爽文的起义，敲响了清朝由鼎盛开始转向衰落的丧钟。在林爽文起义的直接影响下，乾隆五十二年（1787）底和五十三年（1788）初，福建漳浦的天地会员108人，还在张妈求的领导下举行了暴动。林爽文起义，迫使乾隆皇帝不得不在大屠杀的同时，下令罢掉“番、民田界之禁”，允许汉族和高山族人民自由垦荒，因此，也可以说：林爽文等起义将士，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推动了台湾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台湾的进一步开发！

七、“逐客民，复故土”

——湘、黔、川苗民“乾嘉起义”

平垅吴八月，
上山能擒虎，
下海能降龙，
哪怕清兵千千万！

这是直到今天，在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还流传着的一首歌颂乾嘉苗民起义领袖吴八月的民歌。

吴八月，乾州（今吉首）平垅人，出身贫苦，胆略过人，力气特大，据说能举重三百斤。他又关心苗族同胞的疾苦，痛恨朝廷和汉族地主的压迫、剥削，所以，很受群众的拥护。

改土归流以来，生活在湘西、黔东、川北的苗民，苗族旧贵族的压迫、剥削有所减轻，但是，清朝政府和汉族官吏的压迫、剥削却越来越重。

清朝政府在广大苗区，不仅设立了府、州、厅、县的衙门官府，而且设立了镇、协、营、汛的军事据点，实行高压政策：苗民稍有“不法”，立被搜捕；苗民稍有“抗拒”，马上“剿灭”。乾隆元年（1736），黔东苗民反抗压迫，清朝的“七省经略”张广泗，就率大军进行了严厉的镇压：焚毁了1 224座苗寨，“阵斩”了17 600多苗民，后来，又把25 000多名“俘虏”中的一半以上也杀了！随后，还增筑了城防、增驻了清军。

为了控制苗民，清政府强制“苗汉杂居”，叫汉族官吏监视苗民的一举一动。乾隆五年（1740），湘桂苗、瑶、侗族人民联合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更在广大苗区编保甲、立寨长，实行连坐法。苗民既不能与汉民结亲（雍正五年，1727年规定），又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赶集也必须由寨长押去押回。汉官、百户、保长、甲长、寨长，任意勒索，坐吃一半以上的田租不算，还小者逼具酒食，大者强索钱财妻子、置之狱讼；苗民告状，更得先交“规矩钱”8 800文！满、汉官僚私设的“公堂”，贪暴自然更甚了。

官吏和乡绅们通过高利贷进行的盘剥，有“客账”（汉族乡绅放）、“营账”（满、汉官兵放）两种，名目则有“放新谷”、“断头粮”等等，利息是一年翻几番，苗民还不起，就得拿田地“折算”。折算来，折算去，汉族、满族官绅就变成了占有千石、万石谷田的大地主。永绥（今花垣县）厅四郊，原来每一寸土地都属于苗民所有，乾隆末年，竟全部集中到满、汉官绅手里了。贵州松

桃地区，情况也大同小异。因此，乾隆五十九年（1794）2月，贵州铜仁小营寨苗民石柳邓，湘西永绥黄瓜寨苗民石三保，便在湘西凤凰厅鸭保寨的苗民吴陇登家歃血立盟，提出了“逐客民（满、汉官绅）、复故土（夺回被占去的田地）”的口号。这口号，当然得到苗民们的广泛支持。大家于是决定明年2月24日（正月十五日）起义。

不料消息走漏了，石柳邓乃于乾隆六十年（1795）2月2日提前起事，首先吹响了苗民大起义的号角。

2月7日，湘西的清军，到永绥去抓人，苗民闻知，当夜就聚集了几千人（乾州平垅的吴八月也率众赶到），一把火烧掉了官军的大营，起义军的灯笼火把，照亮了百十来里的大地。12日，湘西各地的苗民，纷纷围攻当地的城池，吓得乾州游击陈纶，带着营兵首先逃跑。13日，起义军攻下乾州，杀了同知宋如春、巡抚江瑶。镇筸（今凤凰县）总兵明安图也被当地起义军打死。永绥城仅余清军二百人，也在岌岌可下之中。

不久，石柳邓率领的贵州苗民起义军，也赶来黄瓜寨与石三保的起义队伍汇合。起义军声势浩大，进而提出了“打到黄河去”、“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战斗口号。清朝大震，派云贵总督、四川总督、湖广督抚和湖南提督合兵镇压，并派福康安为主帅、和琳为随军参议，统领全军。

吴八月率领的起义军，给清军很大杀伤。苗民起义军战士，一个个身披铁甲，头戴铁盔，胸围铁链，腿裹铁皮，左手拿着木牌，右手拎着铁镖，口中含着利刃，踏壁穿涧如履平地，翻山越岭行走如飞。他们使的鸟枪，枪身比清军的火枪还长尺余，打得既远又准。他们既三三两两地打冷枪，又蜂拥蚁集地大狙击、大围歼，一支支的官军总是吃亏上当。福康安带兵打黄瓜寨，在鸭保寨遭了截击。两湖巡抚福宁领本部六千兵马，由泸溪增援乾州，在狗琶（爬）寨遭到起义军的伏击，被打得落花流水，福宁本人也差一点送命，好容易才钻进一辆辎重车逃走。湖南提督刘君辅，在鸭保寨进攻起义

军，被起义军团团围住，戳得“遍体鳞伤”，冒死方得突出。

苗民们自己吃着树皮、草根，把菜粑献给自己的队伍，吴八月常以此激励战士们，因此，战士们更加抖擞无畏，很快控制了北至保靖，西连松桃，南达镇筸，东通泸溪的广大地区，并深入到四川的酉阳、秀山等县。

九月，各部义军共推吴八月为吴王，斗争方兴未艾，不料鸭保寨的吴陇登，却在福康安的花翎顶戴、锦缎盐米的诱惑下，叛变投敌了。11 月 23 日，清军攻占了鸭保寨，吴陇登已经投降。协助吴陇登守寨的吴八月尚不知晓，寨破之后，撤军卧盘寨驻扎，吴陇登佯为溃败，领了三百人混进寨中，12 月 13 日，突然抓了吴八月，献到福康安的营中，吴八月于是被清军杀害。

吴八月牺牲后，石柳邓、石三保领导起义军狠狠地打击了吴陇登等的叛卖活动，派兵夺回了鸭保寨、猛攻下三岔坪，清军和叛徒们被打得惶恐不宁。

不幸的是，嘉庆元年（1796）6 月 18 日，石三保也被叛徒诱捕而惨遭杀害。

清军的攻击力量全部投入了起义军的最后根据地平垅镇。石柳邓担任了平垅保卫战的总指挥。

9 月，清军集中重炮围轰平垅。石柳邓和广大苗民一起，在清军的炮火下，多次击退清军的进攻，打死清军守备王泰和等数十人。几个月中，人民还编出了保卫平垅的赞歌：

平垅坪，平垅坪，
三个包脑包龙门；
三个坳，
三个乌鸦飞不过，
三个大炮轰一早晨！

平陇城就这样岿然挺立到嘉庆元年十二月（1797 年 1 月）！石

柳邓重伤逝世不久，苗奸吴廷梁就捆了吴八月的儿子吴廷礼、吴廷义投降了。

清军压平了湘西苗民的这次起义，留兵二万，“屯田养勇，设卡防苗”。到嘉庆五年（1800），光在乾城、凤凰、永顺、保靖各厅设立的这种碉卡就有八百多座！凤凰的苗民，不准到泸溪、麻阳去谋生；起义中，苗民得回的一点土地，官府又攫取分给地主和官兵了。这样，贵州松桃厅、湘西永绥厅的苗民又掀起了第二次起义的高潮。

嘉庆九年（1804）底，永绥厅丁牛寨、岊落寨的石宗四、石贵银发动的起义规模最大。他俩原是吴八月的“将军”和“总统”，也很有组织能力。他们起义后，凤凰县同知傅鼐，带了三千多兵勇来镇压，在阳孟寨吃饱喝足便倒头沉睡，没想到黎明前竟遭到了石宗四等率领的万余苗民的突袭。傅鼐袜子也没来得及穿，光着脚、昏头昏脑便想溜走，又碰上在后路截堵的起义军！只是由于大雨大雪，打湿了起义军炸药包的火绳，他和他率领的残兵败将才没全部丧命。

这次苗民起义，一直坚持到嘉庆十一年（1806）12 月，才被镇压下去。

吴八月等领导的两次苗民大起义，前后经历了 12 年，沉重打击了清朝在湘西、黔东和川东北广大地区的统治，使清朝调用了七省的兵力，耗费了 953 000 多两的白银，损失了 116 员将、官（福康安、和琳都是在这里被拖死的），有力地配合了川、陕、楚五省的白莲教起义。吴八月等苗民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这页历史，像万溶江的江水一样，永远流注在中华各族人民的心中！

八、“官逼民反”

——川、陕、楚五省白莲教大起义

湘、黔、川苗民大起义之际，川、陕、楚的广大汉族人民的日

子也很不好过。乾隆中叶以后，被官、绅逼得背井离乡、逃入南巴老林[①]地区谋生的流民，遭受着地主、商人的双重剥削。木厂的搬运工，扛着二三百斤重的大木枋，必须在陡峭的山间日行40里，睡在山洞或树林里，吃着自备的干粮，厂主把他们叫做“骡子”，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盐厂的工人，必须背盐240斤，背兜高出肩膀一大截，重心很高，稍一失足，立即摔下山崖陡峭的山涧而粉身碎骨。歉年粮贵，厂主停业，他们还被解雇。政府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在这里一再推行“保甲法”；衙役兵丁，更是随时无风生浪、敲骨吸髓。

在故乡挣扎的农民，乾隆末年同样苦不堪言：湖北荆州（今江陵）人民，屡遭洪灾，淹死无数；当阳人民没有粮吃，连树皮也啃光了；枝江、长阳人民，只能吃到观音土，枣阳人民，甚至以石粉充饥；四川重庆、忠州（今忠县）一带，饿殍载道，到处是一幅凄惨的画图。

老实厚道的人民，寄希望于白莲教。

但是，官府却大肆捕杀白莲教徒。老教首刘松，被发配到甘肃隆德县的配所，前来看望他的弟子、新教首刘之协、宋之清等人，也被逮捕、杀害或充军。川、黔、湘苗民大起义爆发后，川、陕、楚官府追查白莲教的活动就更猖獗。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借着朝廷追查之风，更行压榨掠夺之实。两湖总督毕沅、巡抚福宁、布政使陈淮，平时就贪得无厌，老百姓就编过歌谣讽刺他们是“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如今当然就搜括得更厉害。“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凡是不给官吏们钱的人，就被按信奉白莲教严加论处。达州有个知州叫戴如煌的，本该离任，但为乘机大捞一把，竟私设衙役五千多名。武昌府（今武汉）有个同知叫常

① 从陕西南部的略阳、凤县向东，经宝鸡、洋县、宁陕、镇安、山阳等地到湖北西北部的郧西一带是南山老林；从陕西南部的宁羌（今宁强）、褒城向东南，经四川东北部的南江、通江、开县、巫山，陕西东南部的紫阳、安康，直到湖北西北部的竹山、房县、保康一带，叫巴山老林。

丹葵的，任意敲诈迫害村民，连累无辜好几千人；乾隆六十年（1795），他又到荆州、宜昌一带去“巡捕”，稍得“证据”，便施酷刑，用铁锤猛砸农民，甚至用铁钉把农民钉在壁上！被押到省城去的“嫌疑”分子，每船一二百人。其中，被迫害死的，投尸江上；被严刑拷打死于狱中的，多得连尸首也敛不过来。其他地区的官吏，在搜捕白莲教徒方面，也同样暴虐：安徽有个姓赵的贡生，死了老人，开了亲朋名单，雇轿头派人挨家通知他们来殡葬。王轿头派伙计李自平去通知。官兵在城隍庙抓到李自平，听说李是“王轿（教）头”派来的，又见李兜里揣了许多人的名单，竟差一点把所有人杀掉！

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被捕在中途逃脱、隐居在河南新野县教徒家中的白莲教首刘之协，秘密串连河南、湖北、四川的教徒，约定嘉庆元年（1796）4月17日同时起义。但是，被官吏们日益凶残、屠杀的湖北宜都、枝江人民，实在忍无可忍，2月初就首先举起了起义的大旗，接着，长乐（今五峰）、长阳等地的人民也继起响应。

当阳县令听得消息，立即升堂，命令衙役们赶快严捕本县教徒，衙役们齐声答道：“我们都是白莲教，去抓谁呢?”县令拍桌怒道：“你们反啦?!”衙役们慢声慢气地答道：“反就反嘛，发什么火呀!”县令这才如梦初醒，抬腿想跑，大家一拥而上，拿住他，押到衙门外，叫他左手拿钱一串，右手抓银一锭，游街示众后，杀了他，占了县城。与此同时，湖北远安、来凤等县的人民，也纷纷揭竿而起。

3月10日，王聪儿、姚之富等起于湖北襄阳的黄龙垱。10月，徐天德起于四川达州、冷天禄起于四川东乡（今宣汉）。随之而起的，还有巴州（今四川巴中）的罗其清、苟文明，通江的冉文俦、冉天元，太平（今四川万源）的龙绍周、徐万富，大宁（今四川巫溪）的陈崇德，以及陕西安康县的冯得仕、林开泰等。

各支起义军中，以王聪儿率领的襄阳起义军最强。王聪儿是襄

阳地区白莲教首齐林的妻子。齐林是襄阳县衙的总差役，预计2月23日（正月十五日）起义，不料事泄，2月11日被捕牺牲。跟他同时遇难的共有一百多人，他们的头颅被悬挂在小北门，这就更激起了广大教徒复仇的决心。3月10日，齐林的徒弟姚之富等，便共推王聪儿为白莲教的总教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

王聪儿是襄阳城里人，从小跟父亲流浪街头、走马卖艺，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后来，父亲当茶役，她便和齐林结了婚。夫妻俩看到官吏的贪暴、世道的不平，有着共同的反抗志愿。如今，刚刚20岁的她，丈夫竟惨死于那帮贪官暴吏的屠刀之下，她岂能甘心！她剪去了长发，穿上一身白衣，执鞭跨马，投入了人民大起义的滚滚洪流。她指挥着襄阳起义军，迭攻襄阳和樊城，随又转战于河南的邓州、唐州（今唐河）之间，火烧了吕堰驿，声威大震，逐渐成了四方起义军的中心。

清朝统治者把襄阳起义军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拨下白银二百万两，急调山东、山西、河北、陕西、广西等省的军队入鄂，并赦免了流放在湖南、湖北、河南的偷马罪犯作为骑兵助“剿”队，后还调来二万“苗疆兵”，配合湖北原有的军队，妄图首先歼灭这支中坚起义军。然而，王聪儿等迭挫强敌，冲出其包围圈，6月，兵锋直逼孝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到离汉阳只有一百来里的地方，立时“三楚震动”，吓得清政府马上宣布武昌戒严。襄阳起义军在襄阳一场伏击战，还杀死了清军参将傅成明。年底，王聪儿率领的这支队伍，更飞渡了刘家河，进逼谷城、光化，把河南巡抚、和珅的族孙景安（外号“迎送伯”）包围在魏家集（今鄂、豫交界处）。敌人的围歼梦宣告破产。

嘉庆二年（1797）初，襄阳起义军兵分三路攻人河南，再经陕西向四川进发。嘉庆皇帝一再命令加强汉水防御，想把起义军堵歼于汉水之北。但是，起义军却早在清军赶来之前五天，全部南渡汉水，六月，竟到达四川的东乡附近。

四川战场，徐天德、冷天禄率领的起义军节节胜利，早在1月

27 日（大年三十）就一举攻下了东乡县城。六月，当他们正在东乡附近的白秀山遭到清军的围攻时，王聪儿率领的部队分成黄、白、蓝三队，步兵在前、骑兵在后，突然出现在山沟，向清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终于把清军击溃。湖北、四川两支起义大军汇合后，统一分编为黄、蓝、青、白等号，并在军中设了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组织领导，年底，一共控制了 20 多个州县的广大农村地区。不久，冷天禄部又拿下了临江市，各支起义军于是纷纷赶来聚会，载歌载舞，欢度除夕。

东乡会师后，王聪儿留下李全部，亲率大军，突破敌人包围圈，又杀回湖北，避实击虚、飘浮不定，连连粉碎清军的围追堵截之计，在郧西杀死清军护军统领惠伦等将领，再次进入陕西，与北上的李全部会师于兴安（今安康），后又进入四川境内。嘉庆皇帝大骂王聪儿是“贼中首逆”，勒令各路清军务歼襄阳起义军于汉水之南。王聪儿密令一支人马向东北方向出击，引诱敌人穷追，而后挥军北上，抢渡汉水，发动了汉中大战，猛攻郿县（今眉县）、直逼西安，迫得清军日夜兼程赶回西安防守。

由于李全部遭受了重大损失，王聪儿才决定不打西安，东回湖北。又由于各路清军尾追不舍，各地地主“乡勇”不断发动远甚于清军的进攻，襄阳起义军终于在郧阳（今郧县）境内的三岔河被围。被围的起义军舍死拼杀，占据山上，奋勇还击，弹药、箭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击清军。当敌人得知王聪儿在卸花坡时，便集中全力团团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沉着地组织了多次反击，终因众寡悬殊，便带领姚之富和十多名女战士，且战且退，直至山顶。清军步、骑蜂拥而上，妄图将王聪儿等活捉，岂知王聪儿等登上山顶，全都纵身跳下了陡峭的山崖，壮烈地牺牲了！这一天，是嘉庆三年（1798）4 月 21 日，王聪儿才不过 22 岁！

王聪儿是牺牲了，但是，襄阳起义军的余部却又重新杀回四川，与四川各支起义军并肩战斗，给了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嘉庆四年（1799）底，他们发动了苍溪之战，一夜杀死清军副将以下 24

名军官，歼灭清军无数。嘉庆五年（1800）2月，他们又在蓬溪县的高院场，一举歼灭了大刽子手朱射斗及其率领的一千多名清军。不久，冉天元又率领起义军在江油以西的马蹄冈与清军激战了三天三夜，清军统帅德楞泰险些儿被活捉。

嘉庆五年（1800）夏天以后，清朝政府下令大办地主乡绅的乡勇、团勇和实行“坚壁清野”、碉堡政策，才使起义军的力量大为削弱。但是，起义军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四年的英勇斗争。直到嘉庆十年（1805），这场轰轰烈烈的白莲教大起义，才被清朝统治者最后镇压下去。

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是清代中叶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纵横川、陕、楚、豫、甘五省，历时九年半，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从全国16个省调来的军队，杀死其副将以下的军官四百余名，一二品的大官20余名，土豪劣绅不计其数（仅四川一省，就不下五六百人），严重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清政府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还消耗了饷银二亿两，相当于它五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朝就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绌的困境，迅速地堕入了没落的深渊。

第三编　江河日下的天朝

(1806—1840)

第九章　嘉庆、道光时期的政局

一、“八卦定君臣”

——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

天理教又名八卦教，是白莲教的支派之一。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天理教就传遍了直隶、山东、山西等省，甚至广东平远县的黄锦能等、台湾淡水的高妈达等，也在当地传教。天理教的八卦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天理教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的口诀之一是“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早在清初，山东单县有个叫刘佐臣的，就开始用它来组织群众斗争了。嘉庆年间，它的主要领导人是林清和李文成。

林清身材颀长、面色黧黑、胡子粗硬得像刺猬的刺一般。他本是浙江人，因为家境贫寒，流落北方，自幼做过别人的家僮；在药铺里当伙计的时候，长了脓疮，被老板辞退，之后，跑到江南当过署役，惹了麻烦，官府要抓他，又搭了运粮的漕船逃回北京一带，住在宋家庄他姐姐董林氏的家里。嘉庆十一年（1806），他加入了天理教，不久，便成了坎卦的首领。

李文成，家住河南滑县谢家庄，很早失去了父母，跟人学木匠

活，大家叫他“李四木匠”。后来，他念了几天私塾，又自修了一些数学、星象学，因此，他没去参加义和拳、顺刀会等团体，而投身于天理教中的震卦。当时有民谣说：“若要红花开，须待严霜来”。他于是自称“严霜十八子”，人们也说他是李自成转世。他有抱负，有知识，有威信，所以很快不仅成了震卦的首领，而且成了除坎卦以外其余各卦的领袖。

嘉庆十六年（1811），林清到滑县，第一次见李文成，便认为他是了不起的人物，决定二人共掌八卦：林清做天皇，冯克善当地皇，李文成是人皇，将来各领一方土地。嘉庆十七年（1812），李文成来到黄村，更与林清商定：明年10月8日午时同时起义。从此，南北双方进一步加速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宣传入教者缴纳“根基钱”（又叫“种福钱”），并约定，事成后偿钱十倍，凡交百钱者，将来可得地一顷。他们还将收得的“根基钱”周济穷人。这一切，对失去土地、极端穷困的农民，真无异于雪中送炭，甚至许多太监（河间各县多出太监）也积极拥护他们（有个都司叫曹纶的，也附和了林清）。他们于是更广泛地发展队伍。李文成则开始大买军马、大造军仗、广招士卒、颁制旗帜。

嘉庆十八年（1813）中秋之夜，滑县巡检刘斌，跟聂监生喝酒作乐，闻知此事后，不久，便潜行庄中，听得锻造声，从铁匠口中侦得实情，马上报告知县强克捷，强克捷立即逮捕了李文成等，给李上了夹棍，打了六七百棒，打得李遍体鳞伤、胫骨折断。消息传来，群众大哗，起义终于提前爆发。

9月30日，三千多名愤怒的群众，在身躯壮硕的宋元成和李文成的妻子张氏（人称“李四嫂”）的率领下，一举攻下滑县城，杀死了刘斌等酷吏，强克捷被迫自缢。起义军打开监狱，救出李文成，树起“大明天顺李真主”的大纛，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建元“天顺”，并屯兵道口诸村堡。

直隶的长垣、东昌，山东的曹县、定陶，人民纷起响应，起义人民还把曹县、定陶攻克。

嘉庆皇帝在避暑山庄闻变后，立派直隶总督温承惠、河南巡抚高杞带兵前去镇压，不料黄村的起义军，居然打进了皇宫！

10 月 8 日中午，二百来名起义军战士，腰缠白旗、白布，肩挑柿子大筐（筐内藏着刀、箭），在太监刘得才、杨进忠等引导下，分两队分别来到东华门和西华门。东华门的一队，由祝现、屈五率领；西华门的一队，由李五、宋进才率领。东队与卖煤的争道，露出了刀，把门的清军立即关了大门，因此，只进去十余人，但也在协和门大量杀伤了官军。西队全队进入西华门后，杀了看守，关了大门，杀到文颖馆、杀入苍震门，丛集于隆宗门外（门已关），一些人还杀入慈宁宫的内膳房。他们白布裹头，高举“大明天顺”、“顺天保民”的大旗，呼号于雉堞之间，一支支利箭射向隆宗门，一个个战士开始爬上养心殿前的熙和门。闻变的清军从神武门赶入，但护军统领石瑞龄还是不敢接战，主张速备车辆保护后、妃逃走，直到火器营官兵又来了一千多人，才稍稍放了心。只有皇次子绵宁等，见起义军战士爬上养心门，便慌忙用鸟枪猛射（据说绵宁第一枪没来得及找到铅丸，竟装入衣扣发射）。后来，火器营也纷纷齐射了。起义军势单力孤，失去战机，但仍顽强抵抗。夜幕低垂，他们便隐身于五凤楼、南薰殿等处，不时向搜兵发起突袭。十月九日黎明，雷雨交加，清军的火绳被雨浇灭，一个个更胆战心惊。夜里，听说西长安门还有起义军，还惊扰了好一阵。进宫的 70 余名起义军战士，一共杀死官兵 41 名，伤其 60 名，但终因众寡悬殊、饥渴备至，苦斗了两天一宿而失败了。

闯宫以前，有人建议林清不必派人闯宫，而应于 10 月 10 日伏杀回銮的嘉庆皇帝，然后大举起义，林清不听；闯宫以前，又有人建议多派些人，林清又没听。闯宫失败以后，林清待在黄村，却仍幻想着河南援军的到来！10 月 10 日黎明，一辆大车来到林清的住宅前，押车的张鹏、高得明，诡称自己是河南援军，叫开了门，骗林清上了车。林清见势不妙，低声叫姐姐派人追抢，但已追悔莫及

了！11 日，宫中撤了“辟邪丸”镇惊；12 日，嘉庆皇帝才回到宫中。

然而，河南滑县等城的城头上，起义军的白色大旗，却仍高高飘扬着。

温承惠胆小如鼠，不敢进击，嘉庆皇帝改派那彦成督师。那彦成兵至卫辉，同样不敢前行，被嘉庆帝密诏痛斥。直到十一月，镇压白莲教大起义的老刽子手杨遇春、杨芳、刘清等赶来，汇合了各路清军，加上西安、徐州兵，建锐火器兵，吉林、黑龙江马队和索伦兵，才在 29 日攻破道口，进围滑县。

滑县是古滑州旧治，城坚壁厚，城门有五，粮秣充足。起义军斗志高昂，文成每出令，将士欢呼，声震数里。清军因北门外是一片苇塘，故未设围。起义军为了牵制敌军，12 月上旬，在刘国明率领下，分出四千人马，用大车推着李文成（因伤未愈）冲杀而出，直奔太行而走；受阻，转入辉县，用簸箩将文成抬入十八盘山的司寨，安营扎寨，抗击杨芳等追兵。

司寨背山临川、沟深墙固，有民房三百多家、碉楼十余座。不料起义军出寨迎敌，在白土冈中了杨芳的埋伏，在南首山又遭到清军的追击，损失很大。12 月 10 日，起义军在寨中与清军展开了最后的血战，杨芳下令烧民房，使起义军失去了抗战的依托。众将士抬着李文成转入一座楼房。杨芳率兵围楼猛攻，刘国明大喝一声，通名持刀跃出，砍死数敌，不幸中矛身死。敌军于是喊话叫降，李文成大声喝道：“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随后纵火自焚，身边数十名亲兵将帅，一齐簇拥在他的身边，在烈火中同时殉难。第二天，敌人验尸，发现李文成头戴网巾、蓄着长发、两股贴着膏药，两臂被焚，肩膀烧焦，左目有伤，面带枪箭伤痕；帅帐虽被焚毁，但身下却完整地珍存着一方白旗，上书“大明天顺李真主”！

文成别无亲人，妻张氏领着他唯一的幼女（12 岁）还在滑县坚守。清军攻陷各城之后，云集滑县城外，攻而不克，便掘地道。

起义军将领黄兴罕发现，率众到南门地道砍杀，其他将士，则纷纷往地道灌水。清军重炮猛轰，起义军更用牛皮一类东西制成巨帐保护城墙，炮弹随上随下，城墙安然无恙。但狡猾的杨芳一面佯筑寨栅，一面暗填炸药于旧地道，并在城外三里处尽伏甲兵。

嘉庆十九年（1814）一月一日拂晓，各路清军猛攻五门。守城一将在城上大喊："欲破我城，须精兵20万！"清军弓弩齐发，射中了他的左臂，他丝毫不动声色，拔下此箭就回射；清军再射，他又用手接箭，左右驰突指挥反击。不料西城关帝庙一隅，突被炸开20多丈，中午，清军蚁聚蝗集，钻入城中，起义军突围不成，英勇巷战。一名战士，手持大斧，被敌砍了脑袋，却仍作迎敌之状，挺立不仆。战斗一昼夜，三更时，清军被迫撤出。文成妻张氏，又第三次率队出击，她手使双刀，旋转如飞，击杀了数十余敌，再次安返城中。后来城破，牛亮臣等劝她扮成难民出去，她竟慷慨说道："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挥刀巷战又杀数敌，身负重伤，才关门自缢。她的幼女，也自刎而死！

天理教这次起义，虽然被清朝镇压下去了，但是，连嘉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起义，是汉、唐、宋、明各代所从来没有过的！他还写诗说："群'凶'扰齐、豫，隐匿伏萧墙。德薄致灾重，椎心吁上苍"。足见，他自己也感觉到：清朝的统治，已经开始动摇，皇帝的宫殿，已经开始不稳了。

二、江河日下

——道光时期的国内形势

嘉庆二十五年（1820）9月3日，颙琰北游热河，途中中暑，一命呜呼，次子、38岁的绵宁奉遗诏即位，改"绵宁"为"旻宁"，以明年为道光元年，是为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上台，也曾想过革新，还试图作些节俭的样子，裤膝

破了不换新裤，打个补丁重穿，谓之“打掌”。但是，清朝的统治基础已经腐朽，又进一步信用曹振镛（1745—1835）这个旧臣，使形势更糟下来。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红人，道光元年（1821）做了武英殿大学士，权极人臣。他的门人问他为官之道，他答道：“没有别的窍门：只是多磕头、少说话而已！”有个“无名氏”便写了《一剪梅》的词来讽刺他，其一是：


道光皇帝像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便无穷，不谥文恭，便谥文忠。

这也很形象地描绘出了道光时吏治的一般情形。曹振镛本人根本不学习，奉命评文时，卷子稍微古雅一点，他就看不懂，因此，只挑一两个破体字（诗则一两个不合平仄处），评为劣等完事。他还把这种轻巧法传授给道光皇帝，说：“皇上您只要指出那奏章上字体舛误的一两处，那么，群臣就一定惊讶于您的圣明，自然不敢欺瞒什么了。”道光皇帝信了这话，臣下谏事，往往因折中一、二字的舛错而受到谴责，因此，绝大多数好官，也因循苟且、畏葸柔曼、退缩琐屑起来，各方面的情形也因而更坏。

另外，土地更加集中，民生更加大困。大学士琦善一家，兼并土地2 561 200多亩；云南按察使李象鹍兄弟，嘉庆十七年（1812）至道光十二年（1832）21 年中，仅地租一项，即由 1 200 石增至7 000石之多。官僚夺地，商人买地，缙绅也兼并土地。老百姓受到层层剥削，纷纷沦为流民。道光二年（1822），流入朝廷封禁的宁波、台州交界的南田地区的垦户，即有 2 400 户之多；道光三年（1823），流入西安府周至县山中的“客民”，更达 15 万人！那时，

老百姓贫而多病。道光元年（1821）8月，北京大闹瘟疫，死者日以千百数！

河道失修，水灾频仍。河南沁河、漳河、中牟河泛滥成灾，湖北荆州堤决，黄河水漫，高邮湖河水溢，江南桃北厅溢，畿辅北运河、永定河溢，人民遭灾，漕运也“大梗”了！而“治河”的官僚，从总督到属吏，却无不骄奢淫逸、贪赃枉法。

满官胸无点墨、目不识丁，满兵不是雇人打仗，就是临阵脱逃。有人曾写对联描绘道：“红鬼、白鬼、黑鬼尽由内鬼，将军、抚军、制军都是逃军。”打仗不行，连演练也办不顺：道光三年（1823）冬，河南中军副将裘安邦，操练兵丁，兵丁不服，竟大哗起来。操练是外行，苛索百姓却很能耐：崇文门的驻军，简直是到了“雁过拔毛”的地步。

旻宁做了30个年头的皇帝，活了69岁，表面上也忙得不可开交，死前半年，还带病上朝，临死那天（道光三十年，1850年2月25日）上午，还装模作样地召见朝臣，但其实，他既无大志，又不听谏，政治上是一个平庸之辈。他母亲孝淑睿皇后过生日的时候，他竟挂了白胡须、穿了斑斓戏衣、手持鼗鼓，模仿着二十四孝中抚亲的老莱子，学着小孩子的样儿，跳起儿童舞，冲着太后吱哇乱唱！仅从这一点上看，旻宁不也很有点末代君主的味道么？

三、“圣朝盛事”

——张格尔叛乱的平定

道光皇帝虽说是平庸之君，但也干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平定张格尔的叛乱。

张格尔，本叫志汗吉尔，是乾隆时被镇压的叛乱头子大和卓木布那敦的第二个孙子，从小在浩罕国长大。那时，英国殖民者已经占领西亚各国（浩罕国在内），因此，张格尔自幼受到英国殖民者

的训练。英国屡欲通商，“天朝”不肯大开宗门，于是，唆使张格尔反清，妄图从新疆南部获得地盘；浩罕国王也想向东发展，得到南疆一些地方；张格尔则想为祖宗复仇，于是三方勾结很紧，蠢蠢欲动。恰好嘉庆末年，清朝派驻南疆各城的统领大臣，与土官（伯克）们横征暴敛、无恶不作，因此，南疆人民怨声载道。于是，素以“诵经祈福”活动于南疆各地人民中的张格尔，在英国、浩罕国侵略势力的支持下，利用了人民对清朝驻将统治的不满，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据那林河源发动了叛乱，攻打喀什噶尔边境。

喀什噶尔领队大臣色普征额打败了张格尔，中秋节日竟将俘虏80人全部杀光，并谎奏：是布鲁特部落勾引张格尔叛乱的。这时，嘉庆皇帝已死，道光皇帝派伊犁将军庆祥去调查，结果，发现斌静劣迹，撤了斌静，换上永芹以缓和与南疆人民的矛盾。

但张格尔及其主子们仍不死心，叛扰不断。而道光五年（1825）十月，领队大臣巴彦巴图追击张格尔未及，竟杀了布鲁特部落妇孺百余充数，布鲁特人大愤，聚而歼之，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南疆各族人民也就纷纷起来反抗清朝统治了。别有用心的张格尔闻讯，约以事成割喀什噶尔城给浩罕国，借了浩罕兵乘机杀入。

清廷命庆祥代永芹。道光六年（1826）7月，张格尔的叛军攻到喀什噶尔附近，庆祥命军士五百去偷袭，被张侦知，张避其锋而绝其后路，然后，前后夹击，一举将清军歼灭，进围喀什噶尔城。城中清军粮秣已尽，煮皮革充饥，坚持到九月，到底被张格尔攻破了城，庆祥自缢而死。张格尔在浩罕军的支持下，不久，又攻下英吉沙尔、叶尔羌以及和阗。但是，张格尔在喀什噶尔城不仅杀了守兵六千人，而且大杀黑山党（他本人属于白山党）人，又大毁官厅民房，因而，南疆人民已经开始识破了他的野心，不甚积极支持他了。他和浩罕国军，也因为分赃之事发生了矛盾，浩罕的万人大军因此撤走。而清朝派出的长龄（扬威将军）、杨遇春（陕甘总督）、武隆阿（山东巡抚，领吉林、黑龙江精兵）以及提督杨芳等

率领的22 000步、骑大军，却在道光七年（1827）3月4日从阿克苏城向他扑来了。

3月21日，清军大败张格尔于洋阿巴特沙漠。23日，张格尔在沙布都尔苇湖树林地带，凭渠列队拒战，清军步兵涉渠而进、短兵相接，张格尔军火药自轰，大乱，清军追击30里，擒斩叛军万余。24日，张格尔据守离喀什噶尔城十余里的浑河北岸，列阵20余里，部兵十余万人，鼓角齐鸣，垒、铳林立，摆开了决战的架势。时值天气阴霾，风卷尘沙，咫尺莫辨。清军统帅长龄欲撤营，杨遇春认为不可。于是，乘风沙偷渡浑河上、下游，25日晨大战河北，张格尔军大溃，张的外甥和浩罕的两员将领被擒。清军于3月27日收复喀什噶尔城，随后又收复了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张格尔西逃。

杨芳率部追击张格尔，浩罕军伏击清军于阿赖岭。清军于是纵黑山党人诓张格尔道：清军已撤，大家等着你回来。张格尔不知是计，又纠合一些人马东来。年底，杨芳击之于喀尔特盖山，张格尔仅率30骑西逃，被布鲁特部落诱擒以献。

道光十年（1830），浩罕国不仅拒不遣送张格尔的眷属，而且，派将官扶植张格尔之兄摩诃末玉素普率领逃亡人等前来捣乱，清将麻痹，因而，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被围，第二年方解。

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格尔的子弟加他汉等又发动叛乱，未几，也被平定。

道光皇帝平定这条走狗发动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等国侵略扩张的野心，保卫了国土的完整。清朝的百官，称颂这次平叛是"圣朝盛事"，未免有点夸张，但是，平定张格尔叛乱，毕竟还算是道光皇帝做了一件有益于国家的好事。

第十章　嘉庆、道光时期的经济和文化

一、“天朝”的迷梦
——“闭关自守”的影响

清朝的统治在全国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国并不比世界上先进起来的国家落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粉碎了俄国对于我国东北、北部和西北部的侵略和侵略野心，任用过一批西方传教士参加政府的科技工作，对于涉中国内政的罗马教皇和一些传教士的破坏活动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反击。乾隆五十年（1785）、嘉庆十六年（1811）清政府还先后制定了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有力地扼制了他们以传教为名进行间谍活动的企图。嘉庆末、道光初，清政府镇压了张格尔的叛乱，粉碎了英国等国殖民者侵略新疆的阴谋。在亚洲各国间，清政府虽曾与缅甸、安南等国见过兵戎，但基本上还是保持着正常、融洽的往来。

但是，这一切，竟使清朝统治者背上了一种盲目自大的包袱，加之西方殖民者在海上非法活动等种种原因，使清朝统治者逐渐采取了闭关自守的保守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了台湾，开了海禁，二十四年（1685）却只准以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即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关为对外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下令只准英法等国在广州一口贸易了。俄国人自雍正初以来一直只能在恰克图贸易，因此，嘉庆十年（1805），两

艘俄国商船南来广州，当即被驳回。

自给自足、闭塞视听，往往又导致妄自尊大、孤陋寡闻。清初修《明史》，就认为利玛窦的《万国全图》说世界上有五大洲是“荒渺莫考”；清代中叶阮元写的《天象赋》、《畴人传》以及后来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徐继畲写的《瀛寰志略》，都曾被一般官僚士子所讥笑。在闭目塞听的清朝统治者看来：世界上似乎只有一个“天朝”，只有它才是世界的中心；这个天朝万事不求人；西方国家要求贸易，是向“天朝”进贡。

因此，广州一口，外国人也不能自由贸易：最初规定只五、六月进来，九、十月出去；后来，又规定买卖只能在夏、秋两季做，并只许通过“十三行”这个政府许可的牙行进行，外商只许住在“夷馆”，不配直接跟“天朝”的官员洽商，不准坐轿，不能随便进城或出游，只许在逢八（初八、十八、二十八）之日，由通事领着逛“花地”。尤其特别的是：外国女人不许进入广州城。道光十年（1830），地方官发现三名“洋妇”潜住英商馆，便立即勒令她们回到澳门！

16世纪时，西欧殖民主义者先后来到东方。最先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用欺骗方式租借了中国的澳门。后来，荷兰人侵占了我国的台湾，康熙元年（1662）被郑成功撵走前，清朝政府虽然于顺治十二年（1655）允许荷兰来中国大陆通商，但直到后来很久仍不过认为荷兰是在向“天朝”进贡。康熙二十五年（1686），据说荷商不会写“贡表”，请清朝命官代笔，清朝官员即在表中写道：

> “外邦之丸泥尺土，乃中国之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家滴露。”

英国商船，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首次抵华，崇祯十年（1637年，清崇德二年）攻陷虎门，进入过广州。康熙二十三

年（1684），清廷允许英商建立广州商馆。康熙四十年（1701），英国商人往来于浙海、舟山、定海。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在广州建立公行，英商抗议。乾隆皇帝关闭其他三口，只开广州一口后，英商洪任辉便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跑到天津告状，被清廷押回广州，随被投入澳门附近的监狱，三年之后才被释放。

侵略野心极大的海上霸王受到“天朝”种种的限制，自然不肯罢休，西方各国也因受到同样冷遇，并嫉妒中、俄在北方的通商联系，因而也支持英国派遣使节到北京交涉。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王乔治二世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以给乾隆皇帝祝寿（82岁）为名，要求：派人驻京办商务，并在北京设商馆收贮货物发卖；在宁波（浙海）、舟山、广州、天津等地自由贸易；占用舟山附近小海岛一处，留住商人，设贮货站；减免货物税及格外征收；允许英人自由居住广州等地；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各省“开堂”传教。天朝官员将马戛尔尼乘坐的“狮子号”船，强题为“贡船”，9月8日叫他去热河行宫祝寿。9月14日，马戛尔尼穿了勋爵服装觐见乾隆皇帝，强行三跪九叩之礼[①]。不料十月初返回北京，提出要求，竟完全与一般“贡使”不同，犯干“天朝”威严，因而，被一一驳回。10月下旬，马戛尔尼等一行，在半驱逐、半欢送的情况下，被敕令离京。为了显示“天威”，朝廷在来使临行前，更下了两道敕令，其一说：

>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进方物，……具见尔国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抚有四海，……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尔国王惟当善体

① 有的书上说，马戛尔尼自己回忆只跪了一条腿。

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特此敕谕！另一道说：

……贸易之事，……皆更张定制，不便推行。……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今尔使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王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兹再明白晓谕：……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各处守土文武，……定当立时驱逐出洋，……勿谓言之不豫也！其懔遵勿忽！特此再谕！

真是天威赫赫，不可一世。

但是，嘉庆十三年（1808），英舰攻了澳门、进了广州；嘉庆十九年（1814），英舰捕捉了来华贸易的美国商船！

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印度总督阿美士德再次率领使团，在武装船舰的护送下，出使中国。八月初，阿美士德抵天津，八月中旬抵北京。"天朝"还以为远藩来贡，"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于是，详细安排了恩赏日程：9月1日，嘉庆皇帝接见；2日，赐宴"正大光明"殿；3日，再赐宴，并赐游览万寿山；5日，在太和殿前颁赏，赴礼部宴；7日，遣之行。但是，有一点是老规矩不可犯，那就是见天子必须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然而，出乎"天朝"君臣意料的：英国远非藩属，使来并非进贡，当然不肯屈尊。到了规定天子接见之日，阿美士德突然装起病来，天朝的天子宣见英国副使，不意副使也如此报病。"天朝"君臣垂见"藩臣"的幻梦，终于破灭，只好又下一道敕谕：

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

殊不知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更疯

狂地攫取海外殖民地、大搞走私活动和商品输出的时期)，还在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盘桓的中国，即将成为一块肥肉，落在西方列强的馋吻之下了。实际上，“天朝”的迷梦也没再做多久：道光十四年（1834）10月10日，英国军舰“依莫禁”号和“安东罗灭古”号，突然闯入虎门；14日，进抵黄埔。而道光十六年（1836），查理·义律当了对华商务头目后，便表面和平、暗中积极鼓动英国政府对“天朝”实施武力了！

“天朝”这具木乃伊，已经被空气接触，很快就要腐烂了！

二、改良与民主思想的遗置

——龚自珍和李汝珍的思想与遭遇

内忧外患的加深，使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注意了现实问题，寻找起挽救危机的良方。他们开始摒弃18世纪风靡一时的只重经义的汉学，重新发扬了清初学者们倡行的经世致用思想，并主张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改良和揭露。龚自珍和李汝珍就是他们的代表。


龚自珍塑像

龚自珍（1792—1841）生长在浙江仁和（杭州）的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青年时期，就亲眼见到了东南地区的贫富不均、奢侈腐化、官冗人浮、唯唯诺诺的景象，受到过一些比较进步、注重补会实际问题研究的思想家（如包世臣、刘逢禄）的影响，因此，立志有所改革。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考中了举人。第二年，28岁的他，捐资做内阁中书，写出两篇改革的时文，一篇叫《西域置行省议》，一篇叫《东南罢番舶议》，主张在新疆设立行省机构，在东南扼制西方侵略者的侵略。道光十

年（1830），他考中进士，正式在京中供职。在京期间，他经常和魏源、林则徐等交往，跟他们共同组织了“宣南诗社”，讨论匡时救国的问题，很受道光皇帝大红人穆彰阿的嫉妒，抱负不得施展，后来只好辞官归里，讲学度日。

他看到朝廷政治的腐败和外患的加深，力主变法改良。他说：“一个先人所立的法，不可能没有毛病；天下之人所反对的事，没有不垮台的。与其让给别人来变法而发展，不如自己先动手改革。”如何改法？他提出要“宗农”和“平均”。宗农，就是发展农业生产。要发展生产，就要反对坐吃山空、“不辨菽粟”。对于那些不搞农业生产的人，即使他们领有土地，也要剥夺他们的土地世袭权。他又基于当时土地兼并极端严重的情况，指出“不均”就要出大乱子，提出要按封建等级一定程度地“平均”。他说：小不均会发展到大不均，大不均就要“丧天下”。他还指出：人心思“齐”（平均）；人心是世俗之本，而世俗，是“王运”（统治阶级的统治）之本。统治者如果抓不住平均这一根本问题，那就一定要爆发战争、流行“疫疠”，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有被杀死的危险。他就这样地对统治者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龚自珍还主张禁烟（鸦片），修器械，反抗外国的侵略。

为了挽救内忧外患的时局，龚自珍主张君主不要太专权，要给下官一定的权，下面的官吏也不要毫无主见、唯唯诺诺。他还主张废除科举制度，“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他认为，只有选贤任能，才能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使地主阶级的统治重新振兴。他一贯反对朝廷任用那些没有作为的、只求一己富贵、不顾国家兴亡的庸夫俗子。早在道光五年（1825），当他34岁的时候，他就在《咏史》一诗中，痛斥了朝廷吏治的腐败和抒发了自己为国尽忠的情怀。那诗写道：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人才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①]

龚自珍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主张改革，而且，在文风上也力主讲究实际，坚决反对桐城派。清初，顾炎武等人主张文章要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但是，侯方域、魏禧、汪琬等几个散文家，在反对浮华的骈体文中，却极力学仿韩愈、欧阳修的古文形式，不注重文章的内容充实，浮泛出空洞的气息。后来，安徽桐城相继出来三个大散文家，方苞（1668—1749）、刘大櫆（1698—1780）和姚鼐（1731—1815），极力加以提倡和实行，主张文章要通经明道、继承文统（从《六经》、《论语》、《孟子》、《左传》、《史记》到韩、欧的古文）、轻视诗词、小说，讲求古文义法，还要做到"雅洁"、"雅驯"。虽然他们在反对骈体文上有功，同时，也写出过一些好文章；但是，他们主张的，形式还是太拘谨，内容也脱离实际。龚自珍反对这种文风，提倡灵活多变、便于议论、有内容的文体，也算是一个进步。龚自珍给后世留下八百多首诗词和三百多篇文章，丰富了清代先进的文化宝库。他的文章无拘无束，纵横捭阖，奇雄一时，所以有人打比方说："桐城派文如泰山的话，则龚自珍的文章，就像那华岳，不但高耸，而且奇峰峭壁、险峻莫攀！"

与龚自珍几乎同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改革，却通过小说反映了社会重大问题，主张社会民主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李汝珍（1763？—1830）。

李汝珍是河北大兴人，少年聪明而豪爽，却不喜欢那些八股文章。19岁那年，跟随哥哥到了海州（江苏东海县），向音韵学者凌廷堪学习过音韵学，朋友中也多声韵学士，因此，对音韵学颇有研究，曾写过《李氏音韵》一书。他对星象、书法、弈道等，也有

① 牢盆指盐商；狎客指亲暱得宠者；稻粱谋指为富贵；末二句歌颂了田横及其部下不趋富贵、不归刘邦、尽忠不屈的气节，抒发了自己的感情。

一定的造诣。因此，在他的名著《镜花缘》的小说中，上至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象、音韵算法，下至灯谜酒令、杂耍百戏，都有生动的描述。

《镜花缘》，他写了十几年，一共写了一百回。书中写道：武则天当了皇帝，想在冬天赏百花，花神遵命使花开，天帝于是贬谪花仙百人下凡为女。有个秀才叫唐遨，中了探花，被劾与徐敬业（曾起兵反对武则天）有关系，因而被黜。于是，唐遨便和内弟林之洋出走，吃了仙草登了仙。他的女儿小山，搭船寻父，走入异境，看得红尘碑文，返回应举，果然考中，便与同榜百女，应武则天之请，大会于宗伯府，宴欢中各显琴棋书画射等异能。后来，文芸起兵，才女和武则天被打败，唐中宗复位，但诏来年仍开女科，并命前科才女重赴弘文宴。接着，作者说："镜中全影，且待后缘。"

很明显，李汝珍是借了唐代的背景，重点地描绘了妇女的群像，歌颂了她们的才能，反对了轻视妇女的封建意识，和摧残妇女的做法（缠足、穿耳等），发出了要男女平等，同待遇、同教育、同参政的民主呼声。

李汝珍在《镜花缘》中，还通过唐遨的遨游，在人们眼前展现了另一世界：两面国里充满了欺诈，无肠国里吝啬异常，结胸国里坐吃山空，白民国里不学无术、假装斯文，而君子国和女儿国里，则到处礼让谦逊、妇女欢乐。同情与歌颂并茂，诙谐与讽刺兼存，写得尤其精彩，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勾勒出作者理想的蓝图。

龚自珍的思想没有摆脱维护封建统治的框框，且有轻视货币交易的倾向；李汝珍的作品不仅散发着考据学派的气息，生活实感少，社会意义远不如《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而且也反映出作者的乌托邦思想（小说的命名就取义于水中之月，镜里之花）。但是，他们要求改革、要求民主的呼声，在充满矛盾、日趋衰颓的嘉、道时期，对于昏聩的清朝统治者和蔽于古籍而不知世道的蠹鱼

们，到底不啻一声惊雷。然而，清朝统治者对于这两人为代表而发出的呼声，一点也未予理睬。龚自珍壮志未伸，死时不满 50 岁；李汝珍老年穷愁，死于海城。

清朝的统治，在急剧地衰落中。

三、天门洞开

——西方列强的鸦片贸易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处在急剧衰落中的清朝，和东方各国，仍旧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清初即已形成的中朝关系，始终紧密未断。使节频繁往来，贸易规模很大，文化互相交流，友谊继续加深。嘉庆十四年（1809），朝鲜国金鲁敬出使北京，长子金正喜同行，金正喜爱好中国的文学和历史，他的勤奋治学精神，受到了中国学界名流阮元等人的推重。嘉庆二十一年（1816），有个朝鲜学者叫赵寅永的，来到北京，在书店里结识了爱好金石考古学的刘喜海，把带来的朝鲜古碑拓本几十种送给他，回国后继续搜寄。赵寅永和其他朝鲜学者的帮助，使刘喜海终于编出一部《海东金石苑》的书籍，它是研究朝鲜历史和中朝关系的重要书籍之一。鸦片战争以前日本国江户幕府和清政府都闭关、锁国，但双方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大开海禁”以后不断联系以来，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一直在继续加强。康熙二十七年（1688），抵达长崎的中国人，就有 9 128 人。而从康熙初年到鸦片战争前夕，开往日本国的中国船舶，更在四千艘以上！中国的各种商品，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清朝的考证学风、文艺作品、绘画以及自然科学，都给日本学术界、文艺界、科学界很大的影响。安南国，明朝永乐皇帝曾在那里设置“交趾布政司”。宣德三年（1428），黎利受封安南国王（对内称大越皇帝）。清朝顺治皇帝平定云南，黎氏遣使劳军，康熙五年（1666），主动上缴了桂王所赐之印，被康熙皇帝封为安南

国王。但是，安南国内始终不稳，政治总是混乱不堪，到了乾隆时期，黎氏政权更加衰弱，权臣郑宗和土豪阮文惠等杀得不可开交，王族在本国住不下去，跑到广西太平府的龙州避难，国王黎维祁也化装潜伏起来。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皇帝便派孙士毅、许世亨去搭救和维护安南国王。提督许世亨领兵八千，经谅山，长驱直入河内，封黎维祁为国王并授印，土豪阮文惠逃到富春城称降。但是，安南土豪们一向狡猾异常。阮文惠后见孙士毅骄而不备，便突然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1月26日（大年初一）夜里，携炮驱象偷袭清军。乾隆皇帝闻报，急调福康安代替孙士毅。而狡猾善变的阮文惠，为了避免中国和暹罗的两面夹击，竟改名阮光平，叩关谢罪。乾隆五十五年（1790），还亲自到中国来为乾隆皇帝80诞辰祝寿。嘉庆七年（1802），长于内战的安南统治集团，又打倒阮光平；嘉庆九年（1804），阮福映被嘉庆皇帝封为安南王。清朝和越南的关系从此更稳定。清朝与其他一些东方国家，也保持着友善的关系。

然而，西方国家连连派遣贸易使团，没有引起“天朝”的重视；西方国家不断运来的洋货，也没能砸开“天朝”的大门。这对于一向以牟取暴利为最高准则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不能不说是一桩憾事。

16、17、18三个世纪，西方商人从事海外贸易，赢利通常是400%，最高时竟达2 000%。

然而，英国的商品（钟表、玻璃制品、棉毛织品、金属制品等），不受中国人的欢迎。中国农民自织的土布，比洋布既便宜又结实。17世纪中、后叶，英商三次来华全亏了本。康熙十三年（1674），英国商人来华，在澳门一共只用贱价卖了11匹布。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对华贸易，每年额差仍在二百万元左右。英商见中国缺少铝制品，改贩铝制品，还是不行。有个英商盘算：中国四亿多人，每人一套食具（刀、叉）、每家一架钢琴，该买多少！于是，运来大批刀叉、钢琴，结果赔了大本。因为中国农民连饭都吃

不饱，还哪里有钱买琴弹！

中国的生丝、丝织品、茶叶、土布、大黄，英国等西方国家却不能不买。英国从非洲弄到的白银，却大部输入中国。这种入超的局面，只在英国大批贩运鸦片之后，才改变过来。

鸦片，唐代贞元时期（800年左右）已从阿拉伯输入中国。那时叫罂粟。到宋代，苏轼及其弟子，在诗中又称为“鸡粟水”、“莺粟汤”。阿拉伯人称之为“阿芙蓉”。明代中叶后，中国才译作“鸦片”。由于它含有大量的生物碱（吗啡、可太因、那可汀），有提神、镇痛、止泻、辟瘴等作用，因此，《本草纲目》等书，把它列为药材。最初，中国人只是吞其籽、食其壳，明末，才把它的浆跟旱烟末和成丸来吸。康熙时，也当药材进口。后来，雍正皇帝才下令禁止吸食。乾隆以后，政治腐败，官僚们开始吸食纯鸦片。乾隆中叶，主要烟贩是葡萄牙人，但每年不过贩来二百箱。

英商第一次向中国输入鸦片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他们终于发现这是赚钱生意：每箱买价只需250印币，而卖价竟高达1 600印币！于是，他们便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入，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间，每年都向中国输入五千来箱。嘉庆二十二年（1817）到道光十八年（1838），短短的21年间，鸦片的输入量又增加了8倍多[①]！英商不仅从海上运来鸦片，而且从印度、锡金向西藏输入。

鸦片的大量输入，引起了严重的后果：中国由出超国变成了入超国，白银大量外流、银价急剧上涨，老百姓（尤其是农民）负担空前加重。道光三年（1823）到道光十四年（1834）间，平均每年外流白银五百万元，银价上涨一倍还多！

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都曾严令禁止输入鸦片。但是，英国政府和商人，却通过武装走私、宗教走私、贿赂清朝地方官走私，使买卖越做越大。他们盘踞广州湾中的伶仃岛、大屿山、买通吏役，

① 道光十八年（1838），共输入40 200箱。

哨官和衙门，用大“趸船”作海上仓库，用小型快速的“飞剪船”往大陆运，还组织了替他们转卖的“窑口”。衙门成了烟馆，官吏成了烟贩，伶仃岛成了毒窟！

英国的炮舰，打不开“天朝”的大门，但是，英国的鸦片烟，却传遍了“天朝”统治下的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关东各海口、山西、陕西、盛京、云南、直隶、康藏等地，“天朝”的京官、外官、幕宾、吏胥、贵戚、旗丁、太监、绿营官兵、娼妓、优伶、尼姑、和尚、道士等，都有不少人变成了面色铁青、骨瘦如柴的大烟鬼。而在广东、福建、浙江、云南、山西等地的种植，甚至使得下层人民也逐渐地成了“瘾士”。道光十五年（1835），全国就有200万人抽大烟！英国人马尔丁也不得不承认：“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服毒自杀的华人彼此竞争，向吃人神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

一大批无耻的官僚，充当了杀人的帮凶。他们身为“天朝”的大吏，却干着损“天”利己的勾当。朝廷颁布禁令，他们也发布几张官样文章，不过，他们并非心有“天朝”，而只是为了勒索英商一些贿赂，一旦贿赂到手，就帮着他们走私！嘉庆时，两广总督兼代理关务的百龄，就从保护走私中，每箱得到40元的好处。道光时，两广总督李鸿宾，设了巡船，不查烟验货，而是每月收贿银36 000两！这时，还有个水师副将，叫做韩肇庆，竟跟英商讲妥：每万箱送给他几百箱，他就用兵船代运！

朝廷里，以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许多大臣，也从鸦片走私中大捞外快。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卿许乃济竟公开奏请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品，说是这样政府可以增加大笔税收，弥补财政的困难。他的这种主张，得到了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等的积极支持，只因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朱嶟的反对，才没能实行。道光十八年（1838），鸿胪寺卿黄爵滋提出限期一年戒绝，主张严厉禁烟。但将禁烟理由讲得最透、最后使道光皇帝终于采纳了禁烟主张的却是湖广总督林则徐。不久，林则徐就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广东

禁烟。

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开始了！

四、春雷忽破伶仃穴

——林则徐与虎门销烟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人。父亲是个穷秀才，母亲从事手工劳动。林则徐自幼便知用功读书，12 岁就在府试中考了个第一名，19 岁又考上了举人。嘉庆十六年（1811）更考中了进士。他读书目的明确，就是为着振兴国家。因此，他对宋朝的李纲和岳飞、明朝的戚继光等人十分仰慕。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还专程访问了岳飞的家乡——河南省汤阴县，拜谒了岳祠，用“黄龙未饮心徒赤，白马难遮血已红”的诗句，高度赞美了岳飞的崇高精神，表达了自己强烈的爱国志向。在京供职期间，他参加了由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如龚自珍等）组成的“宣南诗社”；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省做官之时，也颇有政绩。他痛恨贪官污吏，更痛恨充当杀人凶手的英、美等国的鸦片贩子。他深知：白银外流，银价上涨，民生日艰，国势日弱，这一切，都与鸦片的输入和吸食有关。因此，道光十七年（1837）他升任湖广总督之后，便极力查禁鸦片，仅在汉阳一县便查缴了 12 000 余两。但他并不满足于一隅之得。第二年，他更向道光皇帝大声疾呼：如果不在全国范围内严禁鸦片，则几十年后，中国就将“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清朝的统治就要垮台！这一席话使道光帝从昏梦中惊醒，于是在多次召见问答之后，便派他为钦差大臣前去广州禁烟。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39 年 1 月 8 日），林则徐自北京启程南下。他在沿途向各州、县、驿站发出传牌，申明：自己并未随带官员，严禁他官假冒滋扰；自己所需轿、船、人伕，一律自

雇、自付工价，不许地方另派迎、送；自己所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不准地方讲排场、搞招待。

在轿中，林则徐反复琢磨了友人龚自珍等的禁烟建议：讲求火器、除却奸民、抵拒游说贿赂。在安徽舒城投宿时，他还宴请了曾在广东香山当过县令的田溥，打听广东的情形。林则徐一路疾行，只因在南昌碰上大雪，才停留四天。3 月 4 日，翻过梅岭进入广东的当晚，他便从南雄城外登舟，昼夜兼程，终于在三月十日抵达广州。


林则徐像

林则徐要来广州禁烟的消息和两广总督邓廷桢根据林则徐的命令查禁鸦片、处理内奸的活动，并未使英国烟贩和勾结他们的洋行商人感到震惊。他们知道：朝廷从雍正七年（1729）首次宣布禁烟以来，百余年间所以越禁越多，主要是由于查禁官员的受贿。他们因此以为：林则徐此来，同样不过需要他们多少破费一点银子就能过关。这样，3 月 18 日，当林则徐传讯行商，指斥他们“巴结夷人”之状时，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绍荣便别有用心地表示“愿以家资报效”。林则徐当即答道：“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尔！”随即命令他们转谕外国烟贩：（一）限三日内“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二）出具甘结：“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并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终始，断无中止之理。”

然而，限期已满，外国烟贩却只呈报 1 037 箱，还递上一份《外商公众决议》，妄图蒙混过关。林则徐只好下令传讯英国大烟贩颠地。22 日，林则徐又听说：美国商人准备缴烟，而颠地却从中阻挠。于是，林则徐下令逮捕颠地。英国商务监督义律闻知，一方面命令所有鸦片船开出珠江口表示抗议，另一方面则亲从澳门来

广州以战争叫嚣相威胁，并指使颠地迅速逃跑。

广州人民早就恨透了颠地一伙害人虫。如今，他们的斗争得到了钦差大臣的支持，自然是有如烈火燎原一般：他们截回了妄图逃脱的颠地，协助兵丁包围了商馆，封锁了商馆周围的濠河，还在商馆附近的房顶上站岗放哨。原来受雇在商馆里做工的中国工人，也全部撤了出来。350 名“夷人”，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林则徐又宣布：外商缴烟一箱，由他和邓廷桢等官捐赠茶叶 5 斤；缴了 1/4，允许恢复雇员；缴了 1/2，酌准水上往来；缴了 3/4，允许开舱贸易。这一切，终于使义律无可奈何，不得不在 27 日同意缴出 20 283 箱鸦片。30 日，美国领事也表示愿将 1 540 箱鸦片交出。长期以来，中国人民的禁烟斗争，终于在林则徐的率领下，取得了初步胜利。

但是，林则徐并没有轻信义律的保证，他还要亲自督缴鸦片。4 月 10 日，他和邓廷桢等一起，出靖海门乘舟亲赴虎门。第二天，他们抵达虎门的镇口；14 日，他更住进“新会一号”船，坐镇沙角海口亲自监收。

海口的天气，时晴时雨，变化无常。而泊居于沙角山下龙穴的义律和外国烟贩，也不时玩弄着拖延、欺骗的花招。为了防范义律的新阴谋，林则徐在沙角、大角二山之间的洋面，设置木排 36 只、大铁链[1] 309 丈；在横挡山与武山之间的洋面，设置木牌 44 只、大铁链 372 丈；在大虎山与小虎山的洋面，也筑起了由南海进入珠江的第三道防线。各道防线之间，还配有铁锚、棕缆 240 付，划船四只，官兵数百人。各山之上，还加固或新设了炮台，安放了许多六千斤、八千斤大铁炮和从外国买来的大铜炮。虎门海口，变成了固若金汤的南大门。狡猾的义律，几次妄图用武力摆脱被动局面，都被林则徐粉碎了。林则徐又制定了处理吸毒、贩毒、贪污徇隐以及

① 粗如碗口，一个链环重达 18 斤；铁链两头固定在山石上，中间衔接处有大铁锁，以便随时启闭。

裁赃者的章程，杜绝了外国烟贩子的防空洞和避难所，最终迫使他们只好将鸦片全部交出。到5月21日，一共收缴鸦片19 187箱又2 119麻袋，计2 376 000余斤。长三尺，宽、高各一尺半的大烟箱，堆满了虎门水师提督官署、附近民房、庙宇以及临时添盖的帐篷。一队队的士兵，日夜巡逻守护；成千上万的民工，日夜兼程地挖着销烟池。5月30日，在虎门镇口村略高之处的海滩上，两个长、宽各五十丈，底铺石板、壁银木板、前有吞吐海水的涵洞、后有灌水水沟的大池刚好竣工，林则徐也收到了朝廷同意他就地销烟的命令。

6月3日，连雨初晴，林则徐坐在虎门山腰用竹子搭成的礼台上，与邓廷桢等一起督销鸦片。下午两点钟，端坐礼台麒麟帐中的林则徐一声令下，五百来名役夫，一齐向撒入了食盐、浸泡了半天、被切成小块[①]的第一池鸦片水中，雨点般地投入了生石灰，并用长柄铁锄、木耙不断搅拌烟池，霎时浓烟滚滚、直冲云霄！山下的人群，四周的兵丁，池边的工人和监销官同时爆发的欢呼声，春雷般地震撼着伶仃洋，使昔日躲在这里毒害中国人民的外国烟贩的嚣张气焰一扫而光。这惊天动地的欢声，和着伶仃洋澎湃的涛声，组成了一曲动人心弦的交响乐。而当夕阳西下之时，第一批、170多箱鸦片，终于化为污泥浊水被冲刷到大海中去了！

虎门销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先声。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这一斗争，和与人民一道奋勇斗争的林则徐的崇高爱国精神，掀开了中华民族光荣史册新的一页。

---

① 一箱切成四块。

附录　清前期大事年表

中国纪年	公元纪年	大　　事
万历十一年	1583	努尔哈赤起兵攻打尼堪外兰。
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
万历四十四年 天命元年	1616	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后金）政权。
万历四十六年 天命三年	1618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向明朝开战，攻下抚顺城。
万历四十七年 天命四年	1619	萨尔浒之战，明军三路惨败。
天启元年 天命六年	1621	努尔哈赤攻下沈阳。
天启六年 天命十一年	1626	宁远之战，努尔哈赤受挫、死；皇太极继汗位。
天启七年 天聪元年	1627	袁崇焕取得“宁锦大捷”。
崇祯三年 天聪四年	1630	袁崇焕冤死，宁锦防线瓦解。
崇祯四年 天聪五年	1631	皇太极设六部、独受朝拜，并取得大凌河之战的胜利。
崇祯五年 天聪六年	1632	达海圈点老满文，制成新满文。
崇祯八年 天聪九年	1635	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称号而定族名为“满洲”。
崇祯九年 崇德元年	1636	皇太极称帝，改“大金”为“大清”，清朝正式建立。
崇祯十四年到十五年 崇德六年到七年	1641—1642	松山之战，洪承畴降清。

崇祯十七年 顺治元年	1644	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福临进京，圈地开始；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
弘光元年 顺治二年	1645	李自成牺牲；史可法抗清失败，福王政权灭亡；鲁王朱以海成立监国政权，唐王朱聿键称帝，建号隆武；江阴、嘉定人民抗清失败；清廷开科取士。
隆武元年 顺治三年	1646	张献忠牺牲；鲁王被俘逃脱、亡命海上；唐王被俘后绝食死；桂王朱由榔称帝，建号“永历”；郑芝龙降清。
永历元年 顺治四年	1647	夏完淳抗清失败；郑成功起兵抗清。
永历五年 顺治八年	1651	李定国等农民起义军联明抗清，李来亨等农民起义军联合组成“夔东十三家”军抗清。
永历十三年 顺治十六年	1659	桂王逃入缅甸；郑成功攻打南京。
永历十五年 顺治十八年	1661	金圣叹等哭庙；郑成功进军台湾。
康熙元年	1662	吴三桂绞杀桂王，“永历”政权灭亡；李定国病逝；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者，光复台湾后病逝。
康熙二年	1663	“《明史》案”定罪。
康熙三年	1664	郝摇旗、李来亨抗清牺牲。
康熙七年	1668	废止辽东招民开垦例，东北封禁始。
康熙十年	1671	诏再订《劝垦章程》。
康熙十二年	1673	吴三桂发动叛乱。
康熙十三年	1674	耿精忠反。
康熙十五年	1676	尚之信反。
康熙十七年	1678	吴三桂僭称皇帝，死，子吴世璠继位。
康熙十八年	1679	开博学鸿儒科。
康熙十九年	1680	尚之信被赐死，耿精忠被系待罪。
康熙二十年	1681	吴世璠仰药死，三藩之乱平；建木兰围场。

康熙二十二年	1683	统一台湾；萨布素就任黑龙江将军。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第一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圈地运动基本结束；开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处对外通商口岸。
康熙二十五年	1686	第二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
康熙二十八年	1689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
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康熙首次亲征噶尔丹，乌兰布通之战；广东“十三行”成立。
康熙三十五年	1696	康熙再次亲征噶尔丹，昭莫多之战。
康熙三十六年	1697	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噶尔丹死。
康熙四十二年	1703	开始修建热河行宫。
康熙四十八年	1709	开始修建圆明园。
康熙五十年	1711	“《南山集》案”狱起。
康熙五十一年	1712	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令。
康熙五十九年	1720	清军入藏平叛。
康熙六十年	1721	台湾朱一贵起义。
雍正元年	1723	罗卜藏丹津据青海发动叛乱。
雍正二年	1724	设青海办事大臣；实行官吏“养廉”制度。
雍正三年	1725	《古今图书集成》编成。
雍正四年	1726	大规模“改土归流”开始；查嗣庭获罪。
雍正五年	1727	设驻藏大臣；《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签订。
雍正六年	1728	《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军机房设立。
雍正七年	1729	曾静、吕留良案起。
雍正八年	1730	噶尔丹策零叛乱。
雍正十二年	1734	噶尔丹策零入觐。
乾隆七年	1742	《授时通考》《医宗金鉴》修成；试行京旗屯垦东北。
乾隆十四年	1749	首次平定大金川，莎罗奔降。
乾隆二十年	1755	胡中藻狱兴；准噶尔部头目达瓦齐叛、平。
乾隆二十一年	1756	准噶尔部头目阿睦尔撒纳叛、逃俄、翌年死。

乾隆二十二年	1757	“回部”大、小和卓木霍集占、布那敦叛；关闭浙海等口，只准广州、恰克图对外通商。“回部”叛平。
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徐扬绘成《盛世滋生图》。
乾隆二十八年	1763	曹雪芹逝世。
乾隆三十六年	1771	土尔扈特部返回祖国；金川大、小头目莎罗奔、僧格桑叛乱。
乾隆三十八年	1773	英商首次向中国贩卖鸦片。
乾隆四十一年	1776	莎罗奔再降，大、小金川平定。
乾隆四十三年	1778	徐述夔狱兴。
乾隆四十六年	1781	程明禋狱兴；苏四十三领导回族人民起义。
乾隆四十七年	1782	《四库全书》编成。
乾隆四十九年	1784	田五领导回族人民起义。
乾隆五十一年（11 月底）	1787	林爽文领导台湾人民起义。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逐廓尔喀侵略军出西藏；达赖、班禅额尔德尼开始隔年入贡朝觐；避暑山庄建成；《恰克图市约》签订。
乾隆五十八年	1793	颁布《钦定西藏章程》；英使马嘎尔尼来华，要求扩大贸易，遭到拒绝。
乾隆六十年	1795	苗族人民大起义爆发。
嘉庆元年	1796	川、陕、楚五省白莲教起义爆发。
嘉庆三年	1798	王聪儿牺牲。
嘉庆四年	1799	和珅被赐死。
嘉庆十年	1805	白莲教起义失败。
嘉庆十一年	1806	苗民起义失败。
嘉庆十三年	1808	英舰攻打澳门。
嘉庆十八年	1813	林清、李文成领导天理教众起义。
嘉庆二十一年	1816	英印度总督阿美士德在武装舰只护送下出使中国，要求扩大贸易。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新疆张格尔叛乱。
道光七年	1827	张格尔叛乱被平定。
道光十四年	1834	英舰轰入虎门、侵抵黄埔。
道光十九年	1839	林则徐抵粤禁烟，虎门销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清前期史话
作者＝夏家餕著
页数＝１９５
ＳＳ号＝１２４２３９０３
出版日期＝２００９．１０